宽松的纽带

【日】大江健三郎

自由精神，独立人格
温馨家庭，宽松纽带
父亲倾注温情，谈文论艺
母亲充满柔意，素手绘图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随笔
令你为之动容

【日】大江由佳里 插图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　　许金龙·主编

宽松的纽带

【日】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4-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松的纽带／(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4.5
ISBN 7-5442-2706-5
Ⅰ.宽... Ⅱ.①大... ②郑... Ⅲ.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149 号

KUANSONG DE NIUDAI
宽 松 的 纽 带

作　　者　(日)大江健三郎
插　　图　(日)大江由佳里
译　　者　郑民钦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汪冬梅
装帧设计　姚　荣　许　菲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06-5
定　　价　22 元

[导　　读]

温暖的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个婴儿在日本的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在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推出的系列随笔集“温暖人文”（全四卷，《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里正对我们娓娓道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与我们亲切交谈的这位作家，此时的身份与其说是文学大师，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热爱我们的人并无二致的一位普通朋友。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欢乐和苦恼；他在大学期间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思索和追求；他走上社会后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成功和挫折；当然，在他年岁更大一些后，也就是成立家庭后，也和我们的家长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孩子抚养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当然，对于大江先生来说，情况可能更特殊一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因为头盖骨缺损而导致脑组织外溢，在父母的爱心和医院的抢救下虽然存活了下来，却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智力障碍。

“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大江先生和他的妻子为这孩子起了一个寄托了美好意愿和良好祝福的名字——光，希望光能够在漫长的人生中幸福地生活。对于大江先生和他的家庭来说，如何与这个孩子共生共存便成了需要积极面对的

最大课题。同时，有关这个课题的思索和感悟也成为大江先生在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频频出现在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橄榄球赛》（1967）——该作品此前亦被译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到最近刚刚发表的系列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和《二百年的孩子》（2003）之中，使得作者的“文学观也随之发生积极意义上的转变”，从对智障孩子的关爱升华到对二十世纪人类三大悲剧（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关注，乃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期盼象征着纯洁无垢和美好未来的新人——你们的出现！因为，你们与过去相连接，更通往美好的未来。

对于渐入老境的大江先生来说，这种期盼最近越来越强烈，除了在大量的小说作品中不断引入孩子这一具有明显象征性的概念外，他还第一次以平实易懂的口语文体，专门为你们——纯洁与美好未来的象征——写下了《在自己的树下》（2001）这部自传性很强的随笔集，分别以逃学、生存，还有自杀、语言、反战以及学习方法等作为不同主题，与所有具有相同或相似苦恼的孩子进行平等和真诚的交流。

大江祖母给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叫“自己的树”，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中出来钻到刚降生的孩子里，而人死了灵魂又返回树根里。聪明的灵魂会记住自己是从哪棵树来的……但不可以说……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

年长的自己会和年幼的自己相遇……如果年幼的自己问“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年长的该何言以对？你像树一样笔直地向上生长了吗？

小时候的大江，曾问爸爸一个问题：树为什么能笔直地向上长？植物学上在森林中争取有限的阳光的答案，大江什么时候和怎样得知已经不重要了，而这个问题本身的象征寓意，无意中成了大江理解人生和锻塑人格成长的圭臬。

《康复的家庭》（1995）和其姐妹篇《宽松的纽带》（1996）是大江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长篇随笔集，作家用同样朴素的口语文体叙述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间的温情。透过这些与他的小说语言和文体截然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随着作家一同体验面对智障儿子光的苦恼，发现光的音乐天赋时的喜悦，进而从家庭内部和作家心灵深处来观看外部世界，观看大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观看形成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中所有的插图均为大江夫人由佳里所作。这些彩色画作与大江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绮丽的世界，吸引我们进入其中的美丽世界。透过这些充满挚爱之情的文字和画面，我们将为共生共存的这一家人而感动，而赞叹。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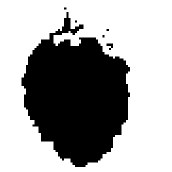
宽松的纽带

1

我时常觉得，自己对家庭的思考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小时候，住在森林覆盖的山谷村庄里，天黑以后绝不剪指甲。因为按照祖母、母亲留传下来的村俗，说是晚上剪指甲，将来肯定会远离家人，孤独死去。我从高中毕业考入大学这一段时间，在外面赁屋独居，与家人的关系虽然并不因此变得格外冷漠疏远，但时常故意在夜间剪指甲。这也许是自己决心从今以后独立生活的一种幼稚的表示。

再后来，我结婚生子。对了，我想起四十岁在墨西哥城当教师的时候，有时正剪着指甲，会突然惊觉到什么似的停下来，望着窗外的一片漆黑。因为妻子打来国际长途电话说长子的癫痫病发作了，但是我必须工作到任期届满才能回国，所以那段时期心情特别着急。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即使看见儿女们在晚上剪指甲，也不想把四国山村古老的习俗传说告诉他们。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对子女（大江光除外）离家独立生活以后自己的死亡，产生一种宽容的情绪。

 2

随着两个身体健康的孩子的成长，他们自然而然地拥有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就是说，他们开始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看着这个成长过程，我产生一种充满真实感的形象，觉得在我与儿子、妻子与女儿、女儿与儿子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宽松地联结着一条纽带。尤其是次子，他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公司职员。如果联结我们之间的纽带绷得太紧，肯定他无法忍受，我也十分疲惫。

所以，如果彼此之间有什么东西联结的话，那就像一条宽松的纽带，总是松弛着低垂下来。但是，一旦需要，一方稍稍一拉，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过去。即使不采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不通过纽带，而

是用眼睛确认对方的存在。这种方式恐怕不会产生束缚感。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同站立在悬崖峭壁之上，倘若一方就要滑落下去，另一方为了阻止他，则可以比较从容地站稳自己的脚跟……

现在我把这个以宽松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想像得十分美好。只是长子大江光有残疾，无法自立，我们夫妻只好和他一起共同生活下去——这是值得庆幸的，我真的这么想，尽管发现这种感情发自自己的私心——联结着我与光与妻子之间的纽带虽然不总是紧绷着，但也不至于松弛得垂到地上。

至少我一直愿意这么想。不过，我又一次觉得必须仔细审视我与光之间的关系。

 3

次子为了完成硕士论文，到秩父发表实验总结报告，打算住一个晚上。他从小就性格内向，有气也憋在心里，以沉默表示不满，绝不牢骚抱怨。我们一直都是让他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这一天早晨，我只好停下一早就开始的工作，亲自送光去福利院。

下了电车，沿着新建的高层公寓旁边的人行道行走的时候，光的癫痫病开始发作。根据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判断，属于中度发病。我把他扶到人行道边同样新修的长凳上，等着他

恢复平静。这时，我抬头看着身边大鸡爪槭以及更大的榉树上的黄叶。

中度发病比较难办的是恢复平静以后的大小便失禁。这一天也是如此，发作过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生这种现象。满身臭味，也不便坐出租车回家，只好带他去职业培训福利院再说。

光也是这么考虑，但是他走路还有点不稳当，我伸手正要挽住他的胳膊，被他拒绝了。但我还是想扶一把他的肩膀，光却微妙然而坚决地扭动一下后背，摆脱我的手臂。于是这样一直走到残疾人福利院，一路上我也没能扶他一把。

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早晨，夸张一点说，那气氛好似战场，尤其是老师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紧张繁忙地工作。我把情况告诉一位熟悉的男教师，让他拿来更换的内裤，带着光去厕所。如果我没有发现光大小便失禁，刚才那位男老师也应该会处理的——看来以前这种事肯定不止一次——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老师们的工作实在非常辛苦。

对于光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急忙把他带进蹲式厕所，他从小就没有使用过这种厕所，不会蹲，一副痛苦别扭的姿势，蹲着排便。我在一旁处理他的污脏的内裤，忽然想起女儿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次，光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车站的厕所里，地上净是污水，女儿从后面使劲撑住他的身体。进来解手的男士们看到女儿在敞着门的厕所里如此奋力助残的场面，都不由得感动，甚至流露出由衷敬佩的表情。如果说到女儿的性格，她平时温顺听话，但一旦认准一件事，就

变得坚决而勇敢。

我好像完成一项工作似的，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路上想起刚才他拒绝我的搀扶。这种事先前常有，大概因为他发病之后心情难受的缘故吧。不过，恐怕他不会想到自己的病原在于父亲，所以不是对我表示敌意。只是因为发病以后的不舒服，使他忘记了平时自己对父亲的关照。相反，平时他在人群中行走或者上台阶的时候，总是让我挽住他的胳膊或者搀扶他的肩膀，他十分宽容地允许父亲这样做。我被赋予这种特权。这么一想，我仿佛悟到一种令人肃然的东西。我在仙川站下车时，和我一起下车的两个女大学生在站台上故意让我听见似的大声说道："瞧那个老头，你不觉得他浑身臭烘烘的?!怪老头！"

年初，我曾到她们就读的大学，在光创作的音乐伴奏声中讲演过，幸亏当时没有人叫我"怪老头"，可是……

 4

于是，我意识到虽然光平时极力忍耐没有表示出来，但我也许一直在损害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独立性。当然，我并非对自己的这种性格毫无反省。现在也想起曾经有过思考同样问题的各种机会。

在一次有关残疾儿童的研究会——大概是我演讲自己与儿子共同生活的情况之后，与参加者举行的交流会——

上，一位在国立大学教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批评我这样过分呵护光会影响他的自立。他说：尤其你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儿子将如何生存。这是最糟糕的教育残疾儿的态度。这样的父母亲是培养孩子自立的大敌。即使你们夫妻不在了，你的儿子照样会很好地生存下去。你的小说还有这样的情节，女儿表示自己出嫁，一定要带着残疾的哥哥。这实际上是女儿决心一辈子不结婚。你们夫妇的这种态度甚至造成女儿的不幸！

看来，我过于珍惜家庭的态度使这位年轻的学者无法容忍。他继续对我展开批评：你把家庭与社会对立起来；你把所有的个体包容在家庭里，从属于双亲，这是双料的反动。他的批评充满当年“全共斗”[1]的火药味。

我在以“康复的家庭”的形式进行思考的时候，尤其注重以此支撑的自我。对于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省。如果有人反问我：你说家庭是自己的据点，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我也觉得现在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位立志当作家的人来信说：文学往往始于对家庭的否定，想一想太宰治的这句名言吧：父母亲应该比子女更重要！这么说，我不得不时常承认自己还是个孩子。

我每天和光都同样在房间里进行各自的工作，同样听着音乐，然后匆匆忙忙地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似乎为了弥补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一路上想方设法

---

① 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1968～1969年学运时成立的学生团体。——译者注

和他聊天。如此日复一日，我不知不觉地——尽管没有说出口——但一心认定，光需要我，没有我，他将无法正常生活。我还时常感觉到，光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在忍耐，给予我宽容。



宽松的纽带。回顾我六十年的生涯，除了幼儿时期，以我的性格而言，这句话最贴切地表达我的人际关系。

我从未参加任何政党，倒是以自由人的身份经常参加某个党派或几个党派联合举行的集会游行。但是这些党派从未要求我加入，我也没有申请过。我有时想，用政治术语定义的话，自己也许最接近无政府主义者。然而自己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派。

我口头上经常标榜要珍惜自己的祈祷，却不加入宗教信仰。于是有时人们会好心地——更多是批判性地——问我：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最恰当的回答是：我不愿意信教，受其束缚——但同时我还认为，入教而不受其束缚，又有什么意思呢？

与我上述强调的主张直接有关的是，我喜欢阅读宗教家的传记，尤其是方济、罗耀拉·伊纳爵最后决心接受宗教最严格的教规的约束的前后故事使我入迷。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作小说至今，所以从未正式在某处就业。即使在学生时代，我也没有参加学校的各种

团体活动——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担任文艺部杂志的编辑，那也只是一年两次集中一周时间进行工作。因为没有参加文艺部的活动，所以现在连一起编辑文艺部杂志的同学的面孔都记不起来。然而，像伊丹十三这样非常随意交往的同学倒成为一生的挚友。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没钱，却也不住学生宿舍。本来打算住，可是听学生科介绍说，宿舍是大房间，旧制一高[①] 时代的老房子，还要几个人同住。一听这些，连忙逃之夭夭……

我也意识到，也许这些使我没有积累一定的人生经验，所以至今未能真正长大成人。尤其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中期这一段时期，担心自己性格的缺陷会造成文学的缺陷。尽管现在我觉得人的缺陷本身在自己的文学整体中也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出于以上的种种考虑，我想写一些以“宽松的纽带”这个具体形象为主题的文章，文章之间的关联性也比较松弛。对我来说，我希望这些文章是我以“康复的家庭”这种方式思考与光的关系以及整个家庭的自然的展现。

---

① 旧制第一高等学校。——译者注



大师的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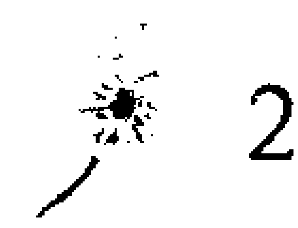
1

初秋，我去信州的松本做了一次演讲。这座城市位于盆地中心，那两天一直下雨，看不见四周山峦，甚觉遗憾，但有老朋友同行，这趟旅行令人难忘。

饭店大厅的里处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挂着纪念斋藤管弦乐演奏会的日程表。看来，优美动听的音乐会就在这儿举行。这么说，乐队指挥小泽征尔先生也应该住在这家饭店里。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也不便给他的房间打电

话，于是写一封信，请服务台转交。

那天晚上，我在演讲的时候，为了使会场气氛轻松，一开始就讲一则有关小泽征尔的幽默小故事。这个故事我想从后来送来的录音带讲起。



2

我相信，在松本，最受尊敬的我的同龄人，恐怕就是小泽征尔先生了。我们全家人都对他十分尊敬。我的妻子和孩子，尤其我的那个努力作曲的残疾儿长子光更是如此。而且小泽先生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走路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因为小泽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忙人，我又只是在家里读书写字，过着没有社交活动的生活，所以既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有请他到我家里来。不过，偶尔在街上遇见这位大指挥家，交谈几句，那实在是大喜过望。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荞麦面馆，小泽先生在东京的时候，好像几乎每天都要光顾这家面馆。我听说以后，觉得他难得清闲，不忍心再去打扰他，于是没去面馆，而妻子和儿子似乎悄悄去过面馆，希望能见上一面。

不久，他们果然如愿以偿。妻子和小泽先生交谈片刻，十分兴奋地回到家里。她表情激动，两眼发亮，我和她结婚将近三十年，很少见她这个样子。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妻子真的很激动，她说刚才在荞麦面馆见到了小泽先生，



小泽征尔先生



插在水壶形花瓶里的春天的鲜花

我们聊起今年元旦由他制作的一个大型电视节目，也请你参加了。当时通过卫星转播，小泽先生、还有你与好像是在圣彼得堡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进行交谈。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他喜欢你的小说，但更喜欢光的音乐。节目结束以后，小泽先生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又谈起此事，于是听说这位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说想请光创作一首新曲。今年九月一日是小泽先生的六十岁生日。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如果光能写一首祝贺的曲子，他就和自己的钢琴家朋友马尔塔·阿尔格里奇一起演奏庆贺生日……

怪不得妻子这么兴奋，我听了以后也很高兴。但是，站在一旁的儿子心有顾虑地说："这合适吗？"妻子说："这没什么不好的呀。"我也鼓励他说："既然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想演奏，你只管高高兴兴地作曲就是了。"儿子答应道："是的。"可过一会儿，他又说："这合适吗？"

不过，还有一个人比我们心急火燎。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那家荞麦面馆的小伙计骑着自行车急匆匆来到我家。女儿出去开门，伙计说："我找夫人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说"夫人和光吃了两份炸虾荞麦面，可是和小泽先生交谈以后，没付钱就走了。"虽说小泽先生是老主顾，"但大师没有替你们付账"。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笑）

在九月一日举行的祝贺小泽先生六十寿辰的音乐会上，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演奏的一首短曲《交谈》正是我儿子创作的新曲。

在此不久之前，小泽先生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还提到光的事情。他说，以前音乐会结束后回到家里，就一个人听音乐，总

是听梅拉·赫斯改编、迪努·利帕第演奏的巴赫《主呀，人类祈盼的福音》唱片，但最近听《大江光的音乐》CD。这位年轻的音乐家的名字虽然在美国还不为人知，但他的音乐给我以安慰和鼓励。其实，我本人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小泽先生的崇拜者。记得小泽先生大概在欧洲的贝桑松音乐会上获指挥第一名。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在如此大型的国际比赛中获此殊荣还是第一次。然后他回到日本。

他回国的时候，等待采访他的首批记者中就有我一个。我是为一家画报社写一篇报道。当时报纸刊载音乐消息的版面还不多，很少报道。我还是从法国的报纸上知道"SEIJI OZAWA(小泽征尔)"这个名字的，听说他回国，立即提出采访的要求。

那一次，小泽先生教给我一个词汇："作乐"。德语里有一个从"音乐"派生出来的动词，一般译为"演奏"。他以日语的"作乐"表现这个词语。他说，人的生存、创作音乐、让别人欣赏音乐，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我想称之为"作乐"。我在整理归纳与他的谈话内容时，有意强调这一点。此后不久，"作乐"这个词流行一时。

此事过去了三十五年，今年正月，我应邀参加小泽先生制作的电视节目，还说了一些话。正是这次的卫星转播，我第一次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交谈。节目开播之前，我在休息室里等候，小泽先生走进来，说道："大江先生，要说我现在通过音乐最深刻地思考什么，那就是祈祷。我思考的是祈祷。我在德国指挥巴赫的弥撒曲时也是感觉到祈祷，在纽约与新教徒共同演奏的时候也有同感。我在法国指挥梅西昂作品时既感受到天

主教的祈祷，也感觉到胸中温暖着日本人对佛教的祈祷。这是相互矛盾的吗？”我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我认为并不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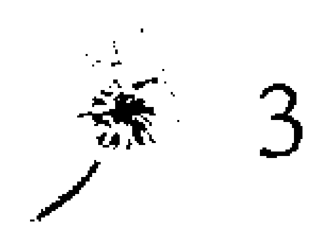
我也快六十岁了，在思考各种事情的同时，也想到创造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当然，我是用日语写作，但不想以只有日本人才能看懂的语言创作小说。即使用日语创作，如译成英语或法语，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都会说：“啊，这是我们人类的文学。”我打算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追求这种世界性的、普遍性的语言。

小泽先生说：“我也是这么想。我认为音乐就是一种普遍性语言。”我自然而然地接续道：“嗯，的确如此。你把音乐创造成普遍性的语言。我听过你在法国的圣但尼指挥马勒作品的演奏会。那时你和法国的儿童业余合唱团、从大都会歌剧团请来的美国黑人歌手、法国人的管弦乐团的合作非常成功。那一场音乐会上，音乐实际上已经成为普遍性的语言，也成为听众的语言。我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事。”

创作出音乐的普遍性语言的小泽先生在思考对祈祷的祈祷。他所思考的祈祷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也可以说是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整个世界的宗教祈祷。我说：你通过音乐表现出既具有扩展到全世界的普遍性，又具有个性的祈祷，实在难能可贵。我想，他也同意我的观点。

一想到我的同龄人里有小泽先生这样优秀的人士，我便勇气倍增。我甚至觉得，即使他没有请我的妻子和儿子吃荞麦面，那也算不了什么。(笑)

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和阿尔格里奇先生一起演奏光创作的曲子庆贺小泽先生六十岁生日的那天夜晚，我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五十年前的战争时期，我们都还是小孩。十岁的时候战争结束，满怀希望开始战后的生活。在战后五十年里，造就出小泽先生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为此对什么人表示感谢……我有机会结识这样优秀的人才，虽然各自从事不同的工作，却能够互相理解。如果这就是我的人生，那就是非常美好的人生。


3

刚才我讲到我参加小泽先生制作的电视节目，由于是在元旦，我觉得收视率不会很高，然而让我吃惊的是，有几位好朋友打来电话说看了这个节目。我到信州讲演，是和一位名叫安江良介的老朋友一起去的——我在《广岛札记》的开头部分谈到这位朋友。他说：小泽征尔和你谈到光的时候，这位大指挥家的眼睛里热泪盈眶。我不习惯于上电视，拍摄时不能仔细注意对方的面孔，所以没有发现……

我绝不认为小泽先生是一个易于伤感的人。如果是年轻时候的小泽先生，他听我介绍光如何开始作曲，如何让我和妻子吃惊，又如何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宽慰，大概不会这样激动流泪的。小泽先生已年过六十，听到我儿子的故事而热泪盈眶，应

该和我一样，是年龄使然。

我也不是说因为即将步入老年，感情变得脆弱的缘故。他毕生致力于音乐，音乐已成为他的人生习惯。他的精神、感情、灵魂——我认为这三者不是独立的——已成为一个纯粹的晶体。就是说，他整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我觉得，这位大师以高尚纯洁的情感深刻感受光的音乐及其人生，才会洋溢出激动的泪水。那天深夜，我倾听由小泽先生指挥演奏的梅西昂的交响乐光盘，也激动地流下泪水。我认为这泪水来自六十年人生的结晶，无愧于自己。



小柴狗「腊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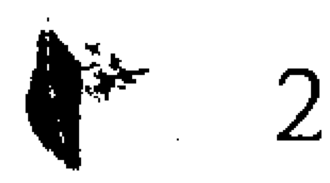
去年夏天，我和光两个人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住了十天左右。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很早就起来，在工作间外面小阳台的躺椅上看书。天亮得也稍晚一些，一群山雀随着朦胧小雨般的天色一起飞来，为了不惊动它们，我停住翻动辞典的手，看着它们。一会儿，从光居住的正房传来低声的FM音乐。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精神振奋起来，像往常一样，把药用水送到还在被窝里的光的枕边，让他说一两句对正在播放的音乐的见解，然

后愉快地准备早饭。

我一个人住在别墅的时候，虽然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在阳台上看书开始，也总是透过岳桦树、白桦树、樱树的绿叶仰望清晨透明澄净的天空，不由不发出赞叹，但由于心情郁闷，只是一动不动地埋头读书，直至一只勇敢的山雀把我脚指头弄得痒痒的小虫叼走飞去，或者到午后袭来一阵小雨，才想起吃饭。我从来没有想过与光一起住在别墅里不仅有利于我的健康，而且一点也不会影响我读书。

中午，我们总是走到原先的北轻井泽车站前面的商店街，一般都是吃一碗乡间拉面，买一些晚饭的食品回来。然后光听音乐，有时作曲，我也开始工作，直至深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只有在吃晚饭的餐桌上，我们相对而坐，才聊一会儿天，其他时间几乎都相互沉默……

夸张一点说，在预定居住别墅的时间差不多过了一半，北轻井泽大学村也开始清静起来的时候，正是"腊肉"的出现改变了我们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2

电影导演伊丹十三说，光的音乐里包含着故事。我自己也有同感，于是打算写出来。伊丹十三在导演电影的时候，我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具有各自的讲述故事的意识。然而除了具体谈论光的曲子所包含的故事，实际上难以说明。

但是，光无法用语言讲述故事。语言讲述的故事需要过去、现在、将来这些时间的变化，光做不到这一点。讲述故事的方法是让一个场景反映时间的变化，这样使自己的语言具有贴近时间的感觉、即法语所说的duree感觉。这一点光也无法做到。光以音乐自然生动地表现自我感觉，让听众产生一种共享故事的温馨的亲和感。

然而，事情总有例外，惟有光的妹妹可以使光引导出语言的故事。正如经过长期实践经验成为某个方面的能手一样，她具有引导光说出故事的本领。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问卷式引导。妹妹通过问答的方式成功地让哥哥讲述“腊肉”的故事。这张问卷至今还保留着。

问：“腊肉”吃什么？

答：腊肉。

问：“腊肉”喝什么？

答：水。

问：抚摸“腊肉”觉得很柔和吗？

答：像夏天。和马的身体一样。

问：“腊肉”叫唤吗？

答：从来不对大江叫。

请画出“腊肉”的图画。

一天傍晚，一条小柴狗姿势端正地站在北轻井泽别墅正房的阳台前面，引起正在窗前眺望树木的光的注意。我开始没有发现，但见CD的音乐播放结束后光仍然一动不动，便抬头看了一眼窗户，才发现那条小柴狗。虽然时常有狗从阳台前面走过，但这时候不是遛狗的时间。而且这条小柴狗一副悠然自得的神

情，毫无乞食的可怜样。

不过，我还是从小冰箱里取出吃剩的腊肉，示意光扔给狗。光从窗户探出身子，把一片腊肉扔过去。一般地说，当人向狗扔什么东西时，狗总是现出畏惧害怕的样子，当确认扔过来的是食物时，才叼起来跑到安全的地方享受。可是这条小柴狗看见腊肉落到自己脚边，不慌不忙地就地吃下去。接着，颇有风度地从容不迫地等待扔下来的第二片腊肉……

光一片又一片地扔下去，我在一旁一片又一片地把腊肉递给他。腊肉很快就扔完了，我叫光扔香肠。但是小柴狗只是闻了闻滚到自己漂亮的前腿跟前的香肠，不再理睬。它依然站在那儿，没有离去。于是我从罐里舀出一些晚饭的汤盛在盘子里，放在阳台边上。小狗动作熟练地从木头台阶爬上来，也还是闻了闻汤的味道，回到原来的地方。接着，我把水杯放在阳台上，这回它迅速爬上来，喝得津津有味，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于是，我和光买来大袋包装的腊肉，每天傍晚用腊肉和水款待这条小狗。它除了腊肉和水，不吃别的东西，也没有显示出对我们亲热起来的样子。只是看见光走到它身旁喂腊肉时，偶尔抚摸它的脊背。狗的身体很热，大概和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组织的旅行时抚摸过的马的身体差不多。所以光的感觉是“像夏天，和马的身体一样。”

我偶尔听见从附近的别墅传来狗吠声，大概不是这一条小柴狗。光最讨厌狗冲着自己叫，所以他对这条小狗到家里来时绝不叫唤感到骄傲般的满足，所以“‘腊肉’叫唤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从来不对大江叫。”

这条取名为“腊肉”的柴狗从此每天都来到我们的别墅。

我们回东京的前一天，与来别墅打扫卫生的妻子一起，三个人散步到位于高原菜地里的、面对浅间山的咖啡店，“腊肉”一直跟着我们。当我们来到那些已经人去楼空的别墅前面时，它都会匆匆跑进院子里，似乎察看一番前后门。它在这些人家都受到腊肉和水的款待，虽然脖子上套着项圈，但好像一直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

 3

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地离开别墅回东京去，所以没有见到“腊肉”。阳台下的盘子上比平时多放了些腊肉，光显得恋恋不舍。我想他大概想让母亲再看一眼引为骄傲的小柴狗。前一天它跟我们一起散步到咖啡店，可是当我们继续往车站方向走去时，它似乎意识到前面不是自己的地盘，立即钻进草丛里，不知去向。我们回别墅吃晚饭时，依然没有见到它的身影。

妻子认为，这么健康干净、温顺可爱的小狗，一定会有主人的，只是主人工作太忙，每天很晚才能回家，所以白天就把狗放到外面。可是，它为什么除了腊肉和水，别的什么都不吃呢？妻子说，在自己家里喂养的食物已经具有足够的营养，所以在外面一般只吃腊肉和水。妻子的这个推测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我已经熟悉了小狗的习惯，似乎觉得妻子的话也不无道理。

回到东京以后，在家里还经常提起这条光取名为

“腊肉”的小狗。女儿就此以纸面问答的方式让光讲述小狗的故事和画出小狗的图像。光画的小狗图像，除了看上去正在叫唤这一点外，其他都和原型十分相似。

今年夏天，我决定和光一起去北轻井泽别墅时，他肯定十分期盼能见到那条小狗。他的装着常用药的背包里塞了一大包母亲做的腊肉。出发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心神不定。

但是，“腊肉”没有出现。几天以后，来了一条模样相似的柴狗，尽管我怀疑恐怕不是去年那一条“腊肉”，但还是和光一起把腊肉扔给它。我一看它的吃相，觉得缺少教养，但我和光的心里似乎还是相互达成默契，就把这条狗作为今年的“腊肉”。可是，当我们试着把香肠、鱼肉卷扔过去时，它却满不在乎地大嚼起来。接着，光用肯定的语气粗声说道：

“这条狗不是‘腊肉’！”

他似乎大失所望。然而，尝到甜头的狗在灯光照耀到的窗外远处一直徘徊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一开窗户，只见那条狗正睡在阳台上，老实说，我和光都感到厌恶。我们关于小柴狗“腊肉”的故事就此结束。



4

就像喜欢小柴狗“腊肉”那样，光还特别喜欢过一只狗。可是那只狗似乎是随意信步而来。光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非积极寻求获取，他基本上不会主动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光正在作曲

我经常为此替他感到惋惜。从根本上说，他的人生处于被动状态。他从来不说自己希望得到什么，只是当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到面前时，会高兴地予以接受。而一旦这个东西离开自己而去，也没有感觉他表现出强烈的眷恋。

我回老家时，曾对居住在森林覆盖的四国山村里的母亲谈起此事，为儿子感到遗憾，不由得带着抱怨的口气。

母亲说："不过，比起那些只顾追求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人来嘛，说起来也许是有些懦弱什么的……"当母亲这样含糊其辞说话的时候，那大抵都是对我的批评。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住在这山谷村庄里，因为没有新书可读，也想不出什么有趣的游戏，就独自呆呆地站在老式商家结构的自家土屋里，看着门外灰蒙蒙尘土飞扬的道路，突然觉得有一个大发现。沿着眼前这条道路，不论往河的上游还是下游一直走去，遇海则乘坐轮船——当时还没有想到飞机——就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为什么家乡的人们——就我所闻——一辈子都不想离开这山谷，愿意终死于山林之中呢?

我极力宣扬自己的主张，母亲没有直接批评。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她只是这么说：

"家里的孩子都出去了，要是不回来，这有多凄凉啊！"

如今，我才意识到半个世纪前母亲说的话与现实的互为照应。光一直没有离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不是通过惟一的自由表现手段——音乐，让听众

和作者都积极地获得真正所需要的东西吗？与我作为他的父亲通过小说这种表现手段所获得的东西，以及在经常旅行的现实生活中所获取的东西相比较，我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光从来没有独自离开家门，一次也没有过，然而他以自己创作的音乐作为直接的媒介，把应该说是真正理解者的优秀演奏家吸引到自己身边。我想说的是，他们之间产生的共鸣合作关系显然是他积极的人生表现。



菜採子制作的玩具熊和玩具小提琴



等待熊的出现



1

我接到一封不可思议的有趣的信，因为写信人是全家的朋友，大家都兴高采烈地阅读，津津有味谈论起来。这封信本来写得一本正经，我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的有趣”，的确其中有着不可思议的地方和动机。

信是这样写的：我结婚的时候，收到你的信。因为结婚仪式要在双方的老家举行，而且由于工作关系，日程排得满满的，四处奔波，所以一直没有回信。现在又接受一项新任务，正在

中国[①]山区拍摄野生熊的生态。已经支起帐篷，做好一切准备，只等熊出来，于是利用这个时间，给你写信……

我觉得要是在那儿等熊出来，的确时间很富裕，但如果熊现在突然从帐篷后面扑上来，别说拍摄，能保命逃脱就算不错的了。所以看着这封信的开头，我和家里人想起他的模样姿态，不禁愉快地热烈谈论起来。

写信人是一位电视摄像师——电影摄影师虽然也有移动拍摄，但主要还是在固定的摄影机旁稳稳当当地工作。相比之下，电视摄像师因为使用录像带拍摄，所以敏捷而稳定的动作成为他们的职业习惯。——在他工作的时候，身边总有看似动作迟钝缓慢却对声音异常敏感的录音师，以及对器材的配备十分用心的灯光师。熊随时都有可能从森林深处或者茂密的山白竹丛中钻出来，届时他们就要配合摄像师，录好声音，保证照明……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想像的情景。

这位写信人H的电视摄制组从去年五月到初秋十分勤快地往我家里跑，其成果是拍摄了一部在NHK播放的节目《父子共鸣》。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我们家能完全消化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都觉得不可思议。这还比不上十月初去斯德哥尔摩那一阵忙碌。但是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年底，因为已经有了与摄制组合作的经验，所以全家人都能应付过来。去瑞典的时候，由于身为摄制组负责人的这位朋友以及一些老朋友同行，虽然我们全家

---

① 中国，指日本的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所在的本州西部地区。——译者注

谁也没带照相机，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录。

我们的家庭即使以一般日本市民的家庭标准来衡量，也属于封闭型。把朋友请到家里举行家庭宴会之类大概一年也就一两次吧。我和妻子也从来没有一起参加过半官方或者朋友家的宴会。我和妻子各自单独参加的宴会也很少。这尤其使外国朋友惊讶。在光出生之后，我们长期无法外出。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而且光的妹妹、弟弟看到父亲总是和残疾的哥哥一起在起居室里工作——父亲写小说，哥哥作曲——似乎也没有心情把朋友叫到家里来玩。我们一家就是过着这样平静的生活。

然而，包括制片人在内的摄制组四个人闯进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要在我们家里呆好几个小时，起初我们的心情还有些紧张。所以，刚开始拍摄的那部分录像带恐怕几乎都不能用吧？

我们很快就适应摄制组的拍摄，连坚决表示不上镜头的光的妹妹在庆祝光生日的家庭聚会上也没有拒绝摄像机。全家人都采取和摄制组合作的态度，有一天，我甚至提议拍摄我和光一起做咖喱饭的内容。这样，首先必须有去超市买东西的镜头。成城学园车站前面有一家商店，原先只是普普通通的食品店，现在已经成为高级超市，我们已经光顾了三十五年，经理早就认识。自从该店直接进口并销售法国葡萄酒以后，经理就用朋友般的语调殷勤地向我们打招呼，打算介绍葡萄酒的性能。现在每个星期还会去那家商店买三四次东西，我想上午顾客较少，于是建议这个时间拍摄我和光买东西的镜头。

然而，看似出身书香门第的年轻的制片人性格稳重从容，颇有经验，办事谨慎，他先去和商店商量，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断然拒绝。但新建不久的（其实已有数年）私营铁路系统的超市同意我们拍摄。

此外还发生一些差错、麻烦。摄制组拍摄我在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门口迎接光的场面，本来这已经得到院长的同意，而且还通过班主任获得光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的认可，但拍摄的时候，摄制组和我还是遭到一位我的印象似乎曾在政府部门任过职的家长的大声责骂。这些家长不愿意自己的残疾孩子上镜头，所以如此反应强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好道歉作罢。于是，本来想拍摄光在一天工作之后与伙伴们——愿意拍摄的人们——亲热告别的镜头终于未能如愿以偿。

在我获奖以后还发生过这样一起麻烦，那是在岩手县的某个城市举办光的音乐会，我也去讲演，纽约电视台要制作这个音乐讲演会的节目。为了拍摄旅途上的情况，摄制组在电车上拍摄一些简短的镜头。但是坐在离我们很远的坐位上的一位太太说是上厕所不方便——其实电车从上野发车后就开始拍摄，到达大宫站之前已经结束——我们在车长提出异议后，打算下车。可是这位太太抓住摄像师，大叫大嚷，气势汹汹地横加指责，那嗓门大得全车厢的人都能听见。显然她的矛头是针对我和光的。她还几次提到自己的丈夫曾经身居公职——原来如此，这位太太的先生现在是议员，好像当过什么大臣或者长官的吧，怪不得呐……

摄像师是居住在日本的法国人，看来他已经忍无可忍，回敬一句，这使得太太更加怒不可遏。我不由得佩服她具有对法语如此敏锐反应的语言能力。下车的时候，我问余怒未消的摄像师刚才对她说了什么话。这位平时温和的小个子法国人依然怒气冲冲，他告诉我，刚才说的是“J'ai dit ‘Kousso-baba’！”(法语与日语混杂的话，意为：你这个臭婆娘！——译注)

 2

在拍摄《父子共鸣》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全家对摄制组、尤其对摄像师H 产生好感，所以在他结婚的时候，我去信表示祝贺。另外，我们对制片人、录音师、灯光师各个行家也都或多或少地抱有同样的感情。下面是我写给H 的信的内容：

想起拍摄《父子共鸣》的那些日子，现在记忆犹新的是我和妻子、光在高原上驾车行驶那个场面，一边眺望着远处的大雪山，一边感受着车内其乐融融的家庭温馨，其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如果没有那次拍摄，我们就不可能享受到在北海道的广阔原野上驾车驰骋的那种爽快而悠闲的感觉。而且在我们全家人轻松高兴享受的时候，摄制组的全体成员一直在小心谨慎地注视我们。

恐怕这正使我们感受到对大自然特殊的愉悦。

那一年整个夏天——接着是初冬，没想到如此巨大的暴风雨袭击我们——我们全家接受NHK 摄制组的采访。后来从画面上看，所拍摄的都是很自然的日常生活场景。我们不打算表演，而且原本就没有表演的天分，你们要拍摄成电视记录片，其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家庭成员的性格——以光为代表——各相迥异，也不习惯别人走进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坦白地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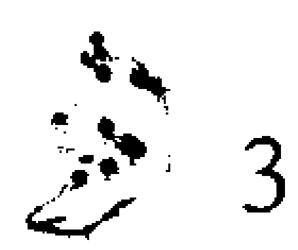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拍摄，最后甚至成为一种乐趣。这自然要感谢导演、录音师、灯光师们等的工作，但尤其是你谦虚谨慎、认真细致的精神使我们在拍摄的那些日子心情非常愉快。在庆贺光生日那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摄像机几次平稳宁静地在我们的四周转动。我在这种稳定感中真切感觉到时间的流动，这种奇异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

不仅仅是这种愉快的场面，例如我和光在参观广岛原子弹轰炸资料馆后，深感疲惫。摄像机也忠实地记录下我们内心痛苦的景象。的确，你们这些行家为我们留下了一般家庭难以想像的可贵记录，而且让我可以在世界各地谈论我与这部电视片的共同感受吧。

我以前在小说结尾部分的最后一页往往写上“Rejoyce！”，结果这个拼写错误的词汇广为人知。现在我把拼写正确的这个词汇“Rejoice！”赠送给你和新娘子。

人生之路如何走？首先要有准确的目光，还需要坚

持正确方向的态度。至于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你是个摄像师，我觉得无须对你啰唆。附上光的标记和妻子画的小花图画。



3

我一直把英年早逝的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一句话稍改为“人生体验”作为自己的主张。人在生存过程中，总是不断积累“职业体验”——这是奥康纳从她尊敬的哲学家杰克·马利坦的“艺术体验”中引发出来的思考。当一个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时，惟有“职业体验”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

我曾经写道：一个人的“人生体验”，换言之，就是这个人的个性。一说到“职业体验”，脑子里首先立刻浮现出农业、渔业或者工业等世代沿袭下来的古老职业。而且不论多么新的职业，也有人积累相应的体验，无疑成为他们独特的个性。自然这也很有意思。例如上面谈到的电视摄像师H，从事这种工作，从其作品中可以了解他的风格。由于从他的作品风格中可以看到创作的方法、作风、个性，所以我们作为被拍摄对象的全家人，在看电视台播放时享受到双重的快乐，同时对录音、灯光、制片人的作品整体构成都具有同样的感受……

要说年轻的行业，电影这个门类还绝不能说是古

老。战前，电影在日本出现不久就进入第一次高峰期——电影历史为百年，其一半50年仍为初期，光的外祖父、电影导演伊丹万作当时就活跃于影坛。他的电影独具一格，具有同时代的文学、戏剧所没有的崭新风貌。不仅新颖，而且深刻。其代表作之一《赤西蛎太》是根据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改编的，但我认为电影在揭露人性方面比原作更尖锐深沉。

伊丹万作在从事这个年轻的电影艺术中，经历过许多失败，不断总结经验，积累丰富的“艺术体验”。他在文章中通过具体事例勾勒出向抽象性智慧发展的清晰线条。因为很早以前我编辑过《伊丹万作随笔集》，所以至今印象深刻——希望该书改为袖珍本重版发行！因为它超越时空，与戈达尔（法国电影导演）的著作交相辉映，这是一本有志于电影的年轻人的必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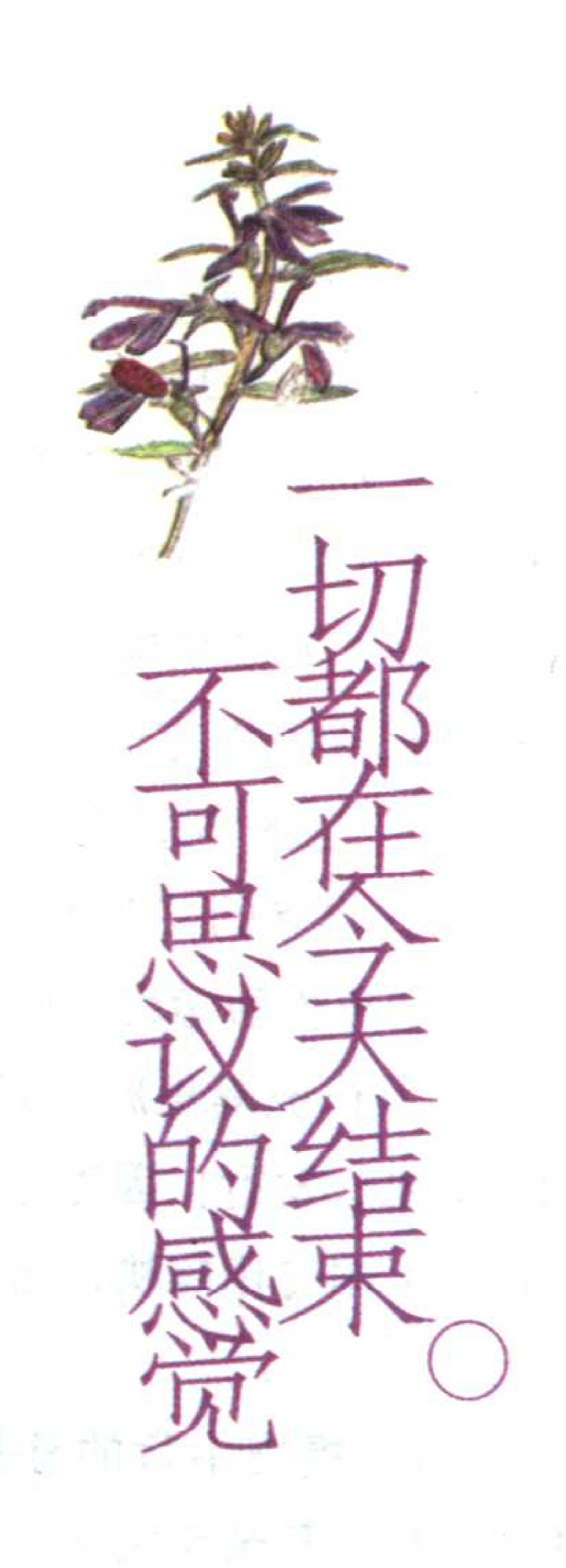
例如他对女演员的演技提出中肯的意见，表现出作者对当时女性形象的细腻观察以及亲切关怀。他在《演技指导论草案》中这样写道：

女演员紧闭嘴唇。这当然是因为她们错误地认为：无论什么场合，紧闭嘴唇，人的面部都很漂亮。

（该张嘴而不张嘴与不该张嘴而张嘴同样愚蠢。）

于是，为了撬开她们的嘴唇，我们必须准备一根撬棍。否则她们甚至敢紧闭嘴唇做出惊愕的表情。

电视摄像师在等待熊出现的时间里，倘若不仅仅给我写信，还能够把自己对这门新艺术所积累的智慧，即“人生体验”记在笔记本上，我想会成为很有意思的作品……



一切都在今天结束。不可思议的感觉

1

我们一家人都在“果园大厅”的后台。“大江光特别音乐会”即将开始。我看着电视监控器上播放的彩排场面，心想也许导演会对作曲家（即光）提醒点什么。我在这儿的任务是光和妻子的警卫兼跑腿，生活中难得一次如此清闲，有时间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

Orchard就是“果园”。我想起来，二十五年前我翻译的诗里就出现过这个词。当时我经常去冲绳，并根据实地调查和资

料写了一本《冲绳札记》。该书的扉页引用澳大利亚女诗人朱迪斯·莱特的一首诗。我有两位我国研究英国文学的权威朋友，我虽然水平业余，但还是阅读英美的诗歌小说，而且去这些国家旅行，以提高触觉的敏感性，寻找新的对象。我在后面还要说到，正如我在威尔士发现R.S.托马斯一样，我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得到这位伟大女性的诗集。

血红的绳索依然把我们紧捆在历史上，
我们怎能不发狂？

老虎哟，你彷徨于我们所有的过去和未来，
惊扰孩子的睡眠，横穿我们果园的美梦，
留下可憎的足迹。

——朱迪斯·莱特《火车》

这首诗的第一行应该是“火车由西往东行驶”。满载着军用物资和士兵的列车从澳大利亚西部边境开往东部的城市——大概在那里上船——诗人倾听着声音。这是一首与战争直接相关的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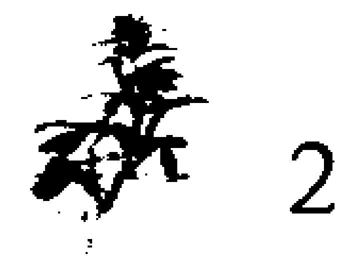
我的思绪从澳大利亚回到冲绳，思考最近媒体沸沸扬扬报道的冲绳美军基地事件。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的正确的态度的大田昌秀知事敦促日美两国政府反省冲绳美军基地现状。他不仅是我的老朋友，更是把冲绳的文化教授给我的老师。在我写作《冲绳札记》的时候，我加入了倡议冲绳非军事

化的团体。该团体的核心人物都留重人在最近一期《世界》上发表回忆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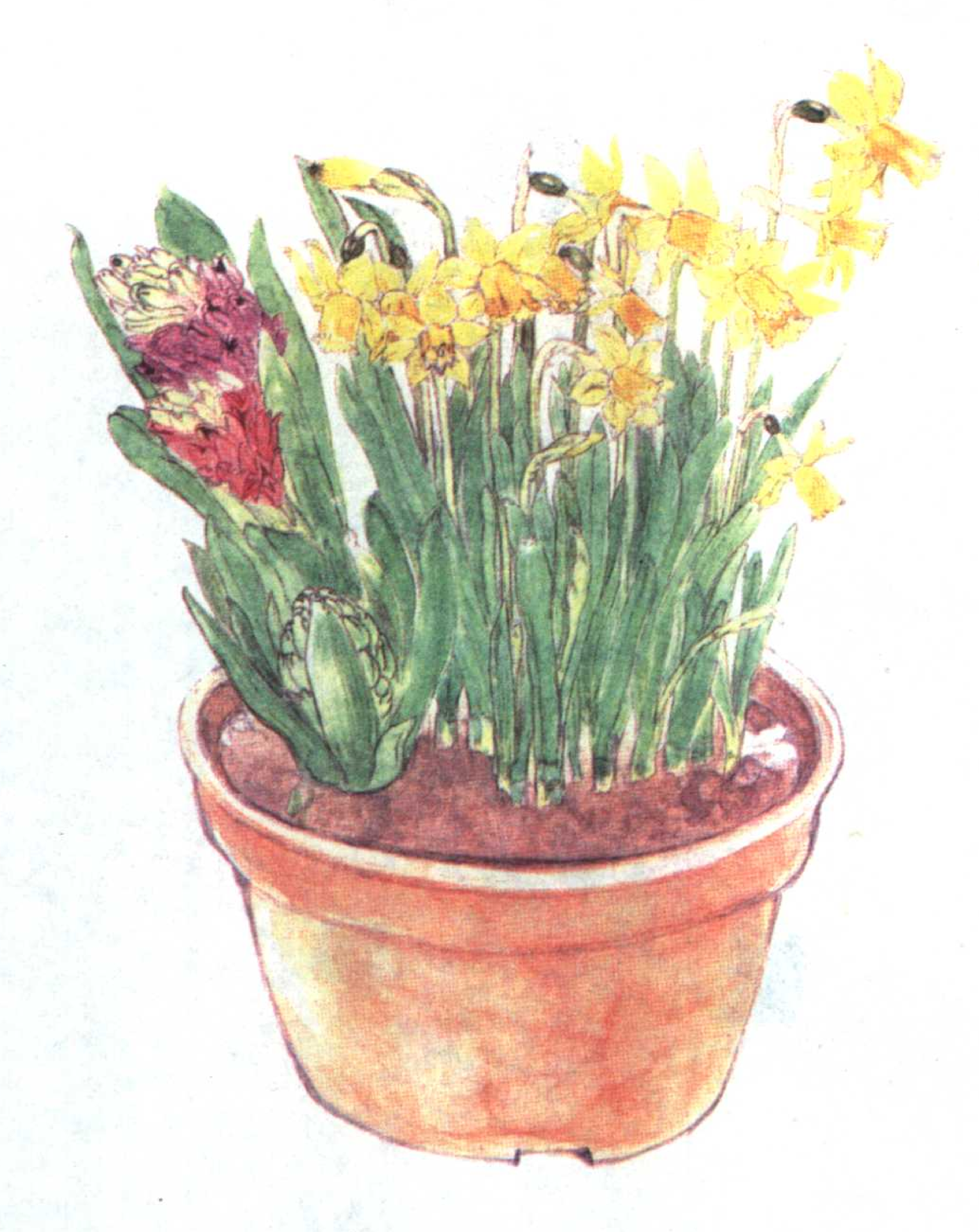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主张是这样的：国会通过冲绳非军事化宣言，要求美国在归还冲绳的条约生效后迅速撤走美军基地，同时日本政府承诺不向冲绳派遣自卫队。

正如都留重人的文章所说，该倡议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为由未被采纳。然而从冲绳的现状来看，这完全是科学的富有远见的合理的构想。但不仅批评者没有实现这个构想的想像力和行为能力，我们也没有，所以冲绳仍然不得不背负着军事基地这个沉重的包袱。

大田昌秀知事说要求修改现在的冲绳地位协定与那一起美军士兵强暴女学生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对知事来说，那一起事件并非不重要。他基于长期体验和人文原理，对生活在根据有关冲绳地位的协定而成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人民的责任和权利，提出具有远见性的主张。

 2

我只要从监控器的喇叭里听到舞台上排练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进入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美妙世界。这一年里，我和光举办过多次音乐演讲会。我打算这次音乐会结束后，至少几年内不再继续举办。为的是希望他的作曲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甚至都已经想好他的第三张CD出版时取名为《崭新的大江光》，



种着水仙花和风信子的花盆



插在竹笼里的土茯苓果



竹篓和香瓜

而我则想好好阅读斯宾诺莎的书籍，让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同时，集中精力作曲。

这样，大概将会有一段时间不会感受到音乐会后台的热烈气氛。仔细想来，自己真的很喜欢这场所和气氛。我在一旁看着、听着这些具有专门技术的人们的排练，从心底感觉到他们一丝不苟的认真。尤其是有几位第一流的演奏家参加光的作品的演奏，使我感激。在我人生的黄昏时刻，能够和这么多富有修养、经验丰富的女性认识，实出意外，备感幸福。而且，由黑柳彻子女士亲自主持这场音乐会，我实感荣幸。

此前，我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

黑柳女士：

您是我从年轻时候起为数不多的女友之一。总想致函倾诉心曲，不觉时光荏苒，却终未能执笔。

此次众多优秀音乐人——他们不仅具有深邃敏锐的音乐修养，而且富有人格魅力——举办光的作品演奏会，并请您担任综合组织运营该音乐会的主持人。于是借此机会——这实在是我懦弱性格的真实体现——给您写这封信。

我为光的《毕业》曲子配了一首诗。我一生甚少写诗，这是其中之一。不久前，在一所大学的演奏会上，我和将来成为护士的姑娘们一起倾听小泉浩演奏的这首曲子。我突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对我来说，完全是具有真切体验的新发现。

我发现我这个创作小说的作家在为数极少的诗歌里

蕴含着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重要的含义。诗是这样开头的：

一切都在今天结束，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不可思议。

这不就是我在不远的将来孤独死去时与光告别的情景吗？我从小就觉得快乐的时光转瞬即逝，而这一切的结束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养成了悠闲而匆忙的性格。我的人生是否快乐姑且不论，如果今天结束一切，我的感觉与其是恐惧悲哀，不如说是不可思议。而我把这一切告诉光的时候，大概他依然不慌不忙地回答：是的，不可思议。

辛夷花在风中摇晃
毕业了，再见。

对于这两行诗，无需任何解释。对于死的想法，是我长期阅读维利阿姆·布莱克的书籍，说得复杂一点，还有阅读唯理教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书籍所产生的直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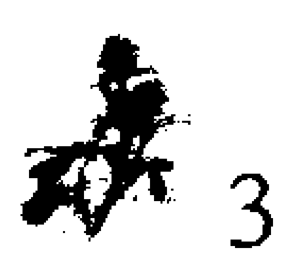
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也就从这个世界“毕业”。然而，并非一切化为乌有，就是说，并非等同于没有生过，而是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即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也不是佛教的净土，至少是我无法预知的地方，但肯定是与这世间不同的地方。

自己的灵魂存在于那个地方。不久以后，光的灵魂

也到那儿去。然而，由于我和光的肉体已经完全从这个世界分离，正如两股风在树间穿行，我们互不相识。我的诗歌的最后一节正是道出了这种感觉。

我们相逢的时候，
你能认出我吗？
我能认出你吗？

我现在能够这样怀着宁静清纯而深沉悲伤的情绪思考这些事情，完全因为受到——您也即将听到的——光的音乐的启示。我要对光以及现在共同享有这个音乐的所有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3

演奏家们在后台休息室前面的走廊上匆匆来往，显示出爽快的紧张感和从容自信。他们给我十分愉悦的感觉。意大利年轻的实力派演奏家还特意到后台见我们，我握着他有力的大手。光也用他拿手的“外语”问候道grazie！心里感到幸福。

我开始在节目单的空白处草拟音乐会结束时的答谢辞——我这个人没有草稿就讲不了话——打算听完演奏再进行修改。现将答谢辞抄录如下：

刚才光已经向各位演出者表示感谢，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但是，他没有向黑柳彻子女子致谢，这不是因为他忘记了，我想这正是他的用心所在。英语有一个词thoughtful，意思是出于深思熟虑而对他人的亲切关照。光虽然无法用语言充分思考，但他也具有这个词所表达的心意。所以，他把向黑柳女士的致谢留给了我。

前天晚上，因为第二天福利院休息，光也和我们一样，睡得很晚。我们一起观看黑柳女士在海地视察活动的电视报道。也许当时他从我的表情上感觉到什么吧。

电视里的黑柳女士刚刚从海地回国，显出从未有过的疲惫样子，蘑菇状的假发也歪斜着。她长年累月肩负着人生的辛劳、世界的沉重苦难，表情显得悲凉而威严，使我深受感动。

看到她拍摄的医院里只能等待死亡命运的孩子们的镜头，我想，如果没有音乐的拯救，光的灵魂、还有我和妻子的灵魂不也是这样赤裸裸地横卧着饱受没有希望的痛苦的折磨吗？

本来想再给黑柳女士写一封信表述自己的想法，但考虑到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接到我的两封信，大概会惊愕地以为我是不是在倾诉自己的黄昏之恋。于是改为在这里致意感谢，并委托黑柳女士把长崎基督教大学送给我的支票转交给为那些儿童设立的基金会。

当然，我也要向各位演奏家表示感谢。海老彰子、小泉浩、加藤知子、小林美惠、荻野千里、上村升、 崎史子、庄村清志，谢谢大家！ Signor Lucchesini，Grazie mille！



后期风格

1

我去美国与埃利·维泽见面，他在少年时期被关押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幸免一死，后来写出《黑夜》等真实反映大屠杀的优秀作品。那次旅行只在纽约待了 4 天，然后返回日本。

我无法在这么短时间的旅行里平心静气地消化参观名胜古迹、欣赏歌剧音乐等日程。一到饭店，有一两天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只是一味看书——没有睡上一个

小时的时候，但也没人干扰，正合适读书——大概从第三天开始工作。这次到美国，除了和埃里·维泽见面出门之外，其他时间都呆在饭店里。只是在最后一天晚上才出去和一些亲近的朋友见面。

我在窗帘紧闭的饭店房间里所看的书是埃里·维泽与法国新闻记者的对谈录，开头部分有这样一句话："Evil and Exile（罪恶与放逐）" Ellie Wiesel & Philippe de Saint-Cheron ,Nohte Dame。我在与埃里·维泽对谈的时候，一开始就引用这句话，表示自己提问的基本态度。

提问者菲利浦·德·桑·舒伦让埃里·维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说：今年早些时候，您获得德素邦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当时您在致词中谈起自己的往事。您说小时候，每次从犹太人创办的初中回家，您的母亲总是这样问您"今天向老师提出好的问题了吗？"

这次我把去纽约旅行的事只告诉一位朋友，她就是福克纳最后的恋人——当时她还是一个在瑞士留学的出身于很有教养家庭的女子，现在她是高级文艺杂志《大街》的编辑兼发行人，小有名气的简·斯坦因。今年6月和大概长期同居的医学家特鲁斯特恩·维泽——恰好与埃里·维泽同姓，但他们毫无关系——正式结婚。

这位特鲁斯特恩是我能够亲热地以教名称呼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朋友之一，我与他的认识说来有点奇缘。我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认识简·斯坦因，她立刻邀请我去她家。简·斯坦因颇有点名气，与诺曼·梅拉等众多社会名流交往，我第一次去拜访时，漫画家斯坦贝格——从

他的笔尖流淌出的漫画家自身形象是具有稳重理智风度的孤傲的知识人，我最早是在十五六岁为考试复习功课而前往松山的美国文化中心时看到他的漫画，还有我早就认识的“垮掉的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都来了。另外，后来成为亲密朋友的、以《东方主义》著称的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也来了。

大概考虑到我这个在世界文坛上近于无名的作家出席美国这种名流聚会的胆怯心理，于是当时还没有和简·斯坦因正式结婚的特鲁斯特恩担任主要与我交谈的任务。他谈吐坦率，虽然年龄不小，却依然带着具有良好修养的调皮性格，我以为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新闻记者。我的英语不行，那天晚上，偶尔听到大家似乎在谈论什么人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但难以继承美籍日本人女教授的工作等话题……

一年以后，突然接到特鲁斯特恩的电话，说他现在东京，明天下午有空，想和我见面。我心想他大概来东京采访，钱快花光了。于是告诉他，光的第一张CD要在明天录音，如果能在录音快结束的时候过来，可以参加晚餐会。特鲁斯特恩回答说，这样的话，想看看录音的全过程。他让我去饭店接他。

第二天录音的时候，特鲁斯特恩独自坐在监控室的最前面，认真倾听长笛和钢琴的演奏，仿佛坠入宁静的沉思，而且称赞光具有作曲家的独创性，成为第一个评论光的作品的外国人。录音结束以后的晚餐会上，他和漂亮的女钢琴演奏家海老彰子热烈交谈，表现出高雅而殷勤的态度，让我意外。不久，他对我说应该把光的CD介绍到国外去。这自然是大好事，但当时

CD的制作者、光的母亲和我以及演奏家们都根本没想到光的CD会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而获得金唱片奖。制片人告诉我只要卖出2000张，就不会亏本。我为筹备这一笔钱，接受了NHK的《文学再入门》电视讲座的要求……

然而，如果光的CD在美国发行，就需要一位著名人士的推荐。话说到这个程度，特鲁斯特恩一本正经地自我推荐道：“那就由我来。我是198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获得者，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这样，我与他的交往更加亲密。当这位特鲁斯特恩·尼尔斯·维泽和简·斯坦因结婚的时候，我们全家制作一本书向他们表示祝贺。我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回忆战败之日的小小说，并刊载当时全家的照片。简·斯坦因说她很喜欢这篇小说。于是我把这则报道的剪报、小说译成英文前的日文原稿、光的乐谱原稿以及妻子描绘的一张水彩画制作成一本书，然后请我的老朋友、我国最著名的书籍设计师 折久美子女士进行装帧设计。结果这本书制作得十分精美漂亮，四角用皮革包裹，封面是用美丽的波纹纸。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装在皮箱里飞往纽约。



住进纽约的饭店的那一天，我躺在被窝里，打起精神给

简·斯坦因家去电话。简·斯坦因不在家，我让带西班牙语口音的女佣转告。下午，简·斯坦因来电话，主要是欢迎之类的寒暄话。紧接着，接到简·斯坦因通知后的爱德华·赛义德也打来电话，听到他爽朗有力的声音，我感到很高兴。我这么一说，对方回答说：嗓门还很大，但身体不怎么好。

敬重这位学者的人们早就满怀忧虑地议论，爱德华·赛义德先生正在和白血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我们不是医生，对此无能为力，但还是经常互通信息，听到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消息，从心底感到高兴。我和他同年，我曾经把他比喻为武打片大明星耶洛尔·福林的理智型人物——声音也一模一样。想像这位身材剽悍的美男子工作时的样子，实在令人心情愉快。在《东方主义》出版数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我认为这是他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而且，通过我和他共同的朋友三好正夫的介绍，我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阿巴因分校进行过研究班的讲义。他把在该校教授音乐主题的讲义编纂成书，献给不仅教他钢琴，而且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母亲。

今年（1995 年）春天，这位赛义德先生来到日本。我国大学和政府部门按照接待国际著名学者或作家的惯例——尽管谁都知道他患有这样难治的疾病——还是给他安排令人吃惊的紧张日程。他不得不表示拒绝，推掉所有准备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的对谈安排，只选择我和他对谈。

对谈的内容发表在《世界》（1995年8月号）上，我们谈

论的话题是“后期风格”。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就是典型的例子，还可以回想一下许多作家晚期的创作状况。正如艺术家在大量创作的初期具有蓬勃朝气的风格一样，在他们的晚年也有独特的“后期风格”。艺术家通过这些风格不是可以讲述自己人生积累的生死观以及对下一代人的期望吗？

对于我的见解，赛义德发表这样的观点：“关于后期风格的思考提出了两个问题，刚才大江先生都有所涉及。一个是死亡率（人总有一死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就是说，临近死亡、预感到死亡时所意识的问题。对您来说，也许儿子的出生就面对过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您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干预自己的生，自己必须直面什么终极性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对于贝多芬等艺术家来说，则是衰老的问题，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您所说的‘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感觉也是其中一种。

“另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也非常重要，它牵涉到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就是艺术家能否不隶属于一个时代？无意识地相信我们具有时代精神，那么就认为自己是当代人，但后期风格则提出能否超越时代的问题……

“您的情况，我不能代言，我还是说一说自己的病吧。当意识到生的终结逐渐逼近时，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病。这大概也是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与现今的时代对立的缘故吧。自己虽然也表现出许多对立，但归根结底，大概可以说这是巴勒斯坦人的缘故吧……

“我根本不认为会发现一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哲学或世界观，所以想适应对一切都意识到不相和谐的后期风格。”

我与赛义德的对谈十分愉快，但如果光从上面抄录的一部分内容来看，也许难有这种感觉。还是让我回忆那次在新宿的饭店里团聚的融洽气氛，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谈话的内容吧。

首先，赛义德并不认为“后期风格”如老者谈吐般具有调和社会与人生的平稳温和的感觉。他举在音乐方面与自己相似也是半个行家的德国哲学家阿道诺为例，认为即使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曲，也经常包含着阴暗紧张的要素。他在人生的终点，决心以自己真正的声音——逆时代潮流地——明确表现自我。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整个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有的人考虑与其圆滑地融和传统，服从社会权威，不如索性自己成为权威，获得艺术院恩赐奖什么的，以博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但他的人生与这种活法完全迥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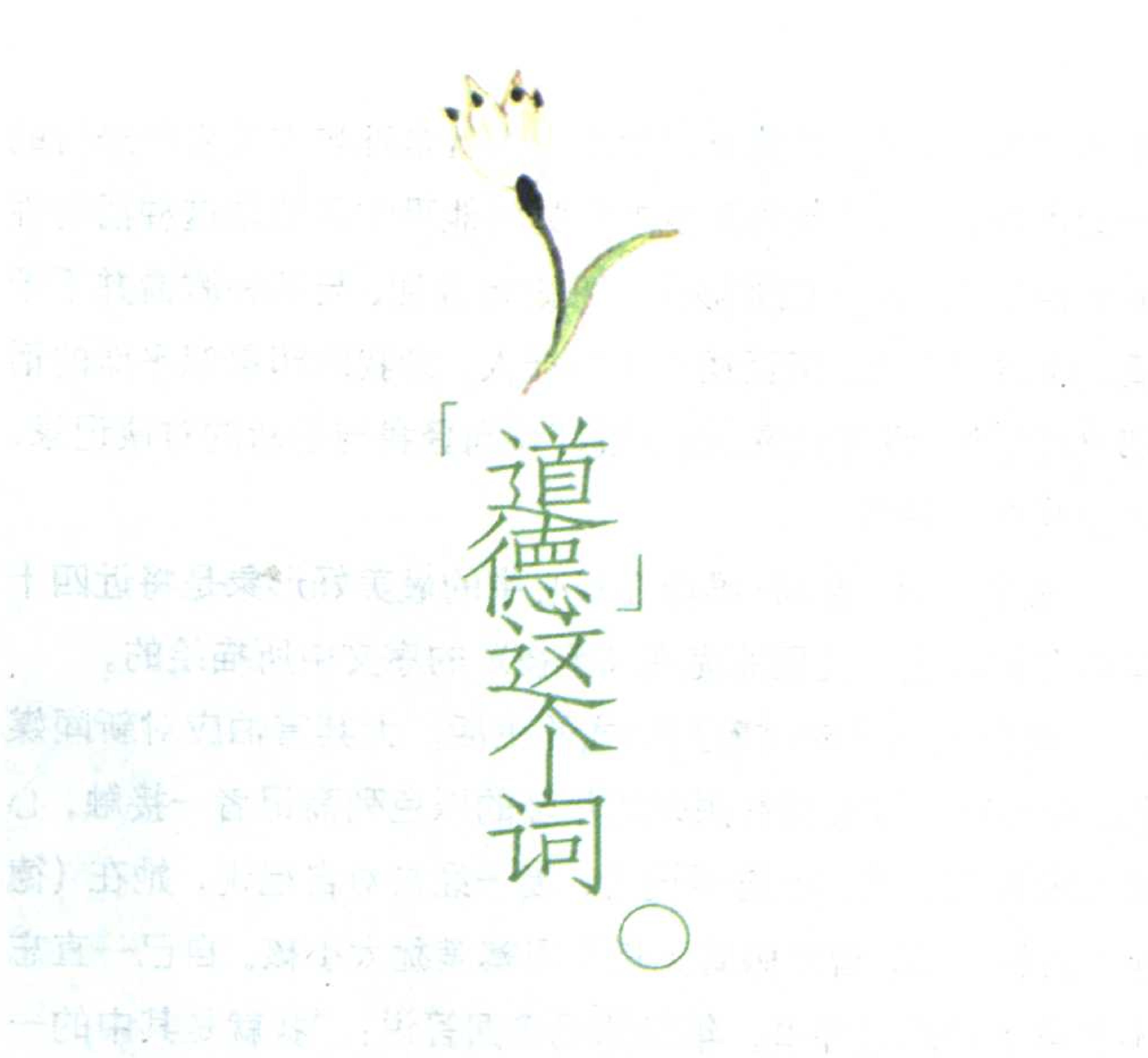
确定“后期风格”的生活方式就是与企图同化自己的许多力量对立而生存。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的祖国受到重重包围，甚至无法存在下去。他要像人一样地生活，就必须与周围的一切对立，甚至与同胞的妥协式的模式相对立。

赛义德认为，由于自己与这个世界不断对立，对方为了强迫他屈服，才故意让他得这种疾病。因此，与疾病进行斗争，顽强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发出与社会极不和谐的声响的自己独特的音乐，逆世界和时代的潮流而轰鸣。

3

从简·斯坦因居住的豪华公寓可以俯视赫德森河，在她的住所里，我们和赛义德夫妇等少数几个人共进晚餐。赛义德依然是餐桌上最健谈的人，但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体不佳。我把自己书上写给他的长长的献辞念给他听，他激动地站起来，走过来和我握手。以朋友之间的握手而言，他的握手软弱无力得简直无法相信。告辞的时候，他久久握住我的手，依然那么虚弱，然后说："我在战斗，在战斗！"我回国以后，收到的第一份传真是简·斯坦因发来的。她说赛义德为了恢复健康，决心开始游泳。在吃晚饭的时候，赛义德也像谈论暑假活动计划的中学生那样开朗愉快，他说通过游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人。而哥伦比亚大学特地在每天早晨划出一定的时间，把游泳池提供给他。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我相信爱德华·赛义德一定会战胜疾病，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完成他"后期风格"的优秀作品。听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而且即将完稿。这部回忆录无论在智慧上艺术上，还是作为现代史的一个传奇，肯定都会让人兴趣无穷。我之所以满怀希望，因为纽约最优秀的医生们为挽救爱德华·赛义德这位杰出学者的生命正在共同奋斗。特鲁斯特恩·维泽也是最可信任的朋友，他通过自己的朋友向医学界做工作。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力量都会向赛义德这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1

埃利·维泽的财团事务所位于横穿纽约市中心的美国林阴大街上，我们的对谈就在他的事务所里进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出生于匈牙利，身材却如法国人般短小，举止优雅，富有魅力，而且精力充沛。一头金发如母狮一样的夫人总在他身旁，不停地插话，向他进言，而且忙碌地进进出出，联系事务。

埃利·维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为了不让人类重演这历史悲剧，他决心采取行动，一直勇敢地开展各种活动。尽管

免不了毁誉褒贬，但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理想主义者所进行的活动本身，总是从他的激情中感觉到他恐怕只能是这种活动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能够深思熟虑地说话，与那种激情并不矛盾。他滔滔不绝，但话语并不得罪人，给我的印象似乎他的话都已经听过，没有新意，而报纸打算刊登我与他新的对谈记录，这让我有点着急。

长期以来，埃利·维泽在我心中的最美好形象是将近四十年前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黑夜》的序文中所描绘的。

莫里亚克平时过着封闭式的生活，尤其害怕应对新闻媒体，但与特拉维夫报社派来的年轻的以色列裔记者一接触，心情立刻开朗起来。他告诉记者，妻子经常对自己说，她在（德国）占领时期，曾亲眼看见货车里塞满犹太小孩。自己一直忘不了妻子说的这件事。年轻的记者回答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所能做的，只是流着眼泪拥抱他。

我与埃利·维泽对谈的开头部分，现将报纸刊登的内容抄录如下：

维泽：大江先生，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您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具有道德性的意义。在我看来，作家的作用必须具有道德性。我翻阅您的书，每一页中都会感觉到您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父亲，正在不懈地追求道德。

大江：谢谢。我也把"道德"这个词理解为"人生的意义"。



睡猫



院子里的紫斑风铃草、瞿麦、
虎尾草、大蓟、山丹、绶草。

我在对谈中为什么对“道德”如此重新定义呢？其实这一段是我在审阅记者归纳对谈内容的文章时，考虑到日本读者的情况，添加上去的。当然，也因为我一直对“道德”、“道德的”之类的日语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他说：“您从不喝酒，除了夫人之外，对其他女人没有什么兴趣，真是个道德家呀。”对于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我现在是这把年纪，而且老实说，我承认自己年轻时候就毫无成为唐璜的天分，但尽管如此，我大概还是想慌忙予以否定：“不，不是这样的！”尤其我总是在文学作品中试图塑造摆脱世俗的道德规范获得自由的人物形象。

维泽是一位优秀的法语语言大家，这大概得益于他长期担任教师的训练。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但他的英语发音非常漂亮。听他流畅准确的英语，我想起英语里的articulation这个词。我在撰写这一个系列的随笔时，在《黄昏的读书》这几篇里将引用诗人R.S.托马斯答记者问的一句话。于是在笔记本上抄录原文“We must remain articulate to the end”，并译成日文：“……我们必须明确阐述思想，直至最后。”就是说，我对articulate、articulation这个词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我现在正努力回忆维泽当时所说的英语，这儿译成“道德”、“道德的”的词汇原文，大概他使用的是形容词moral。我觉得日本人不经常使用名词morals，但经常使用moral和morality。我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使用“道德”的外来语，主要是想与根据汉语里具有儒家意识的“道德”进行的思考区别开来。

我也打算重译 moral、morality 这个词，所以理解为“深刻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态度”。

2

写了以上这些文字，恐怕难免被人讥为满嘴道德气，但我认为做人最基本的是认真。坦率地说，我与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以后，才坚信这一点。

这几年尤其明显，光正在失去孩提时代那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性格。他的身体状况长期不好，成年以后，似乎更流露出忧郁沉闷的心态。

别墅的抽屉里不经意地保存着一盒孩子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录音带，当光听到录音带的声音后，显得那么兴奋，一直主动和我们谈话。这使我感到惊讶。那个时候，光和弟弟、妹妹玩耍“马拉松”游戏，他们在北轻井泽树林的平缓山坡上跑上跑下，而且速度还相当快。这一切，如今恍若梦中的记忆，时间无情地流逝，无法挽留……

光在活泼开朗的孩提时期就具有诚实认真的性格。就我这个父亲而言，一想到要开什么玩笑，就不管不顾地戏谑一番，无法自我控制。好像从小就是如此，所以上国民学校——战时的小学——的时候，成为校长的眼中钉，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

记得有这样的事，校长叉开双腿坐在椅子上，让学生在他

面前站成一排，然后每次叫两三个学生出列，左手按住学生的右边脸颊，右手握拳狠揍左脸。

有一天，我们照例在校长面前站成一排。校长叫我的名字，但是我的脑子正在开小差——这也是我从小的毛病，可以说几乎是顽症——没有应声而出。我觉得校长的脸上掠过一丝疑惑的表情，而我终于免于挨揍。起先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后来我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仔细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校长不应体罚学生，但这样子逃避体罚，就会变得没有出息。于是从此当我也和其他年幼的牺牲者一起在校长面前排成一列的时候，总是聚精会神，生怕听不到校长叫唤自己名字。我虽然憎恨、甚至轻蔑校长——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轻蔑大人——但我并非害怕耍滑头更加惹怒校长，而是因为恪守自己的结论。

也许可以说，我小时候虽然喜欢戏谑开玩笑，但也是一个认真诚实的人。

3

光的认真的性格表现得更加直率，他在进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之前，心理状态极坏的时候，曾经在走廊的狭窄的地方，把弟弟的脑袋使劲按在墙上，但从来没有打过弟弟。不过，他从残疾儿童学校高级班毕业的时候

开始，一家人围坐桌旁聊天，只要谁一开玩笑——这多半是我——他就用手掌拍打桌子，表示不高兴。

对滑稽很感兴趣，这也是光幼时就有的性格，现在依然如此。例如，光和妹妹都很喜欢滑稽歌曲的歌手嘉门达夫的ＣＤ——歌曲采取问答的方式，一个人问：贝多芬在吗？那就是你吧？另一个人用《命运》开头部分的曲调回答：不——是——我。接着说：就是你！这样反复形式演唱——而且他还喜欢看电视娱乐节目的滑稽逗乐内容。

但是，从旁看来，光所接受的正是演员建立在态度认真的基础上的滑稽表演。例如光非常喜欢ＮＨＫ的《日本人的提问》节目中矢崎滋先生——光也是这样礼貌而亲切地称呼——那种故作迟钝发傻的幽默，还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根据这个节目编写的书籍。

和光交谈的时候，往往顺着他的思路进行，但如果我开玩笑地把他的想法推翻，会引起他的不快，在晚餐桌上使劲敲打，震得盘子里的菜几乎要掉出来。

于是，开玩笑的人——就是我——会垂头丧气，而光也郁郁不乐。一会儿，总是他的妹妹或者母亲出来打圆场。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新的习惯，而且并非一两天的事，已有相当的时日。有一次，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老师在家长联系本上写道：光在午饭时与同学发生争执，但两人很快和好，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不必担心。我和妻子看过以后，进行各种猜测，打算询问本人。但结果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一直挂在心

里。大概这种小事也像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那样吧。

光与外界——当然最多的还是和家人——之间的心理差距是如何产生、扩大的呢？光的确喜欢引人发笑的东西，无论是逗笑的语言还是逗笑的思维——当然是单纯的，尤其当自己使用这样的语言或思维引起亲人发笑时，他也会从心底发出愉快的笑声。

但是，如果他是听者，从一开始就没有领会对方是在开玩笑，一旦发现自己一本正经听的话变成玩笑时，会气得使劲拍桌子。由于我平时喜欢开玩笑，因此在家里往往都是我惹得光发火，结果只好沮丧地自我反省：哎呀，做人最基本的是认真……

4

现在回到埃利·维泽的言论上来，他说："在我看来，作家的作用必须具有道德性。我翻阅您的书，每一页中都会感觉到您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父亲，正在不懈地追求道德。"

我回答说：我也把"道德"这个词理解为"人生的意义"。

作为小说的读者，如果作者站在"道德"的立场对我说教，我会顿时兴趣索然。所以我从小就回避这类小说。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厌恶儿童文学，不敢触摸，大概这是最大的原因。我的孩提时代正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偶尔拿到一本新出版的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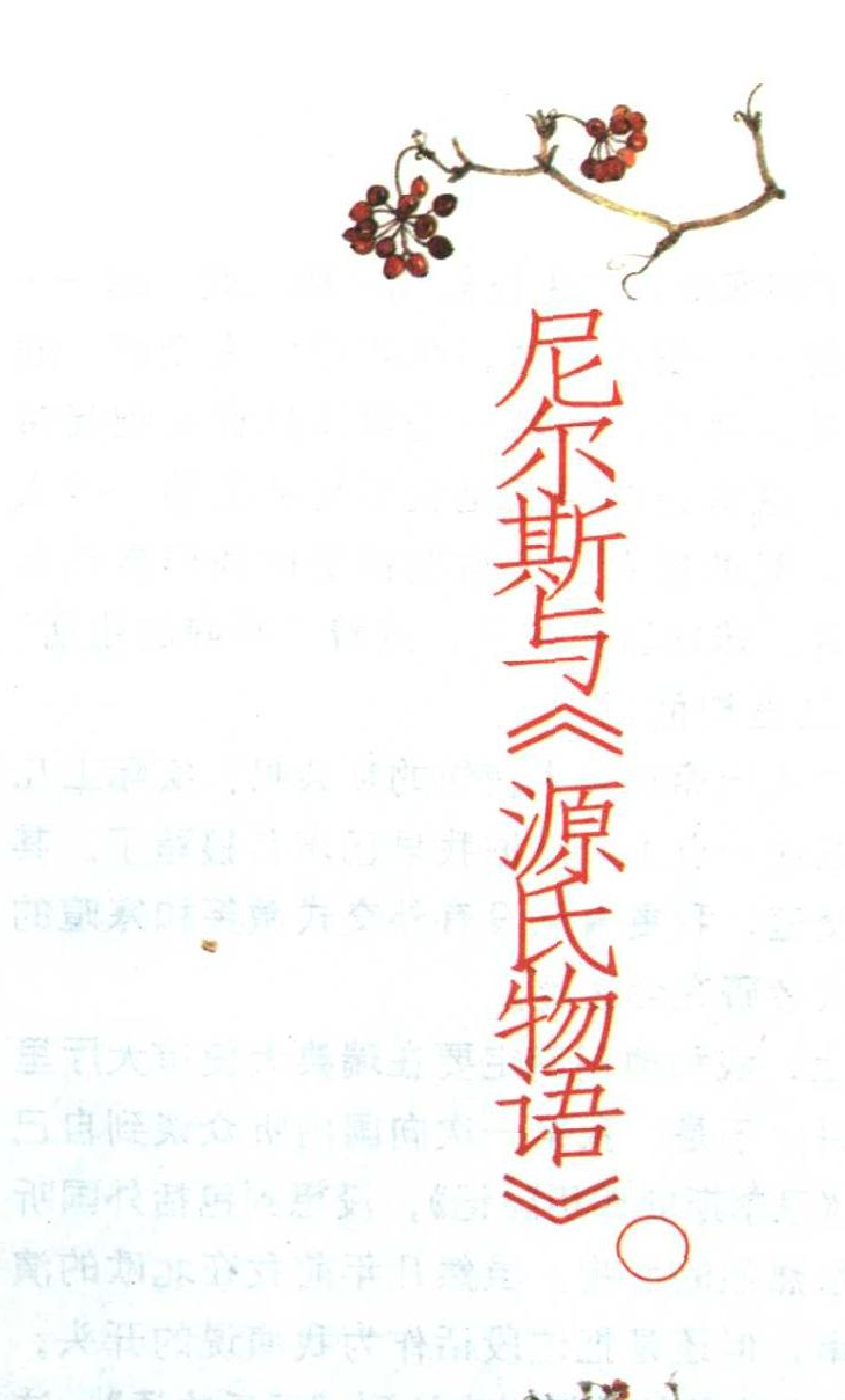
上面刊载的童话、儿童小说充满臭气熏天的“道德”味，对于幼小的心灵实在有害无益。现在想起来，那种“道德”是要把上面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灌输到每个家庭里，并坚决贯彻执行。我是最底层的“小国民”，仰望上去，上面有父母亲（尤其是父亲）、国民学校的校长，最上面就是天皇陛下！这就是从上而下灌输的理论。

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亲不是这种纵向轴心型理论的信奉者。父亲为人谨慎，少言寡语。当时他从事加工造纸原料三桠（黄瑞香）的工作，有一天，一个伙计和他商量仓库管理的事，那个人顺便说了一则“黄段子”，父亲一听，大吃一惊，也十分恼火。想起来，我和光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连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我少年时期过后已经消失，但光的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少年时期的痕迹。甚至可以说，他保持着儿童时代的闪光个性。

我的父亲没有以“道德”的标准要求孩子，也由于过早去世的缘故，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一个超国家主义精神制度在最底层的象征。父亲死后，母亲找来给我看的也都是《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哈克贝利历险记》这样与战时日本的“道德”相距颇远的书。

显然，我是在尼尔斯、哈克贝利所追求的“人生意义”——这与一般的“道德”迥然不同——中感受到魅力而成长起来的。这形成我在青年时代开始创作小说的文学观基础。在上述个人的回忆以及感想的基础上，我把刚才自己说的那句话稍作修改，变成这样一句话：

文学最基本的是认真。



尼尔斯与《源氏物语》

1

去年获奖以后，不是没有人提出要为我举行庆祝会，可是我没有勇气接受。因为当我数到到会的朋友差不多十个的时候，其他的就记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瑞典驻日本大使馆为我举行宴会，其规模正合我意。妻子和光都高兴地出席了。不久，一个年轻的作家写了一篇文章，胡说什么因为我和妻子经常出席瑞典大使馆的宴会，才获得今年的文学奖。然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去过瑞典大使馆。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

说过，有残疾孩子的家庭，如果没有比一般家庭优越——而且要优越得多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夫妻俩一起出门参加招待会的。另外，还有一些媒体批评我把光带到斯德哥尔摩去。这真正的原因是我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放在东京，当然，光的旅费、食宿费都是由我们自己负担。光与他的弟弟、妹妹留守东京，过着“平静的生活”的设想，原本不过虚构而已。

那么，我一个人出席许多大使馆的宴会吗？实际上几乎没有。但是，在这一点上，恐怕我早已声名狼藉了。其实，与外国人打交道，我更喜欢没有外交式微笑和寒暄的场所，例如会议或者研究会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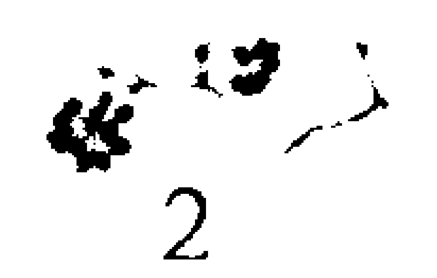
在那次宴会上，我和他们商定要在瑞典大使馆大厅里举办一次小型演讲。于是，我第一次向国内听众谈到自己从小就喜欢阅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没想到包括外国听众在内，引起大家热烈的反响。虽然几年前我在北欧的演讲中就谈到这件事，但还是把这段话作为我演说的开头。

另外，我在瑞典大使馆的演讲中谈到《源氏物语》，这似乎让女作家、女记者们颇感意外。我经常在小说里引用当时正在阅读的书籍，例如但丁、布莱克、叶芝的作品。因为我在日语写作的文章里加入洋文，会直观地感觉到文体多样化的有趣效果。

至于日本古典文学，虽然并不想过多引用，但也不是完全无缘。当然，我与美国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的年轻研究家以及法国的同样年轻的翻译家交谈的时候，经常为自己对日本古典文学的修养的浅薄感到羞愧。渡边一夫先生的随笔也只写他所专门研究的法国文学——偶尔也写关于式亭三马的随笔——然而从他翻译拉伯雷《巨

人传》所使用的文体和语汇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位对日本各个时期的古典文学都深有涉猎的读书家。

我阅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不多，也很浮浅，但正如前面所说，我的演讲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将当天演讲的内容梗概抄录如下。这也是因为一年以后，我从衣橱里拿出深蓝色的冬天西服时，才发现去年在忙得不可开交之际草就的演讲提纲还放在口袋里。


2

首先感谢马古纳斯·巴列吉斯大使和瑞典文学协会给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

我从小就喜欢看《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两年前，我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行时，在瑞典西部的港口城市约特波里谈到这件事，结果听众中的两个提问者之间起了争执。这两个人都在大学工作。出身于瑞典北部的那位学者认为，拉格洛芙的这部作品是瑞典独特的文学，怎么会让东方岛国的一个小孩子如此狂热呢？他不明白，他表示怀疑。问道：先生，您说这些，不是为了奉承我们吧？

拉格洛芙是应人之约，作为小学校给学生教授瑞典地理的课外补充教材而创作这部作品的，所以故事里出现很多小地名。我自然非常理解认为这部书是为瑞典读者而创作的态度。

另一位出身南方的学者，看来性格比较开放，他反驳北方学者的观点，认为该书的故事极具普遍性。他说：

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想让瑞典读者独占这部作品。演讲结束后，大家会餐，喝着白葡萄酒，愉快地交谈。这两位性格、观点迥然相异的学者站在我身边，谈笑风生，十分高兴。说不定这两位学者为了给讲演会制造热烈的气氛，故意演出的一场戏吧。

那么，在战争时期的日本，而且是在森林覆盖的四国山村，我为什么会喜欢《尼尔斯骑鹅历险记》这本书呢？不知道母亲用什么方式——也许是用一些大米到松山的书店暗地里交换的吧，当时要给孩子弄一本书竟这么难——得到这本书，送给我。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她对书籍具有特殊的敏感。后来也是她给我弄到岩波书店出版的《哈克贝利历险记》。这两部书对我的文学影响使我终生受益。

那个时代，无书可读，所以我反复阅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从头到尾都能背下来。之所以迷恋得爱不释手，大概因为幼小无力的孩子与比自己有力或者又有力气、又能够在天空飞翔的大雁朋友之间所建立的带有些许性的感觉的深厚友谊吸引我的缘故。我自己还记得为这本书的痴迷感到有点心虚惭愧，可见当时的确有一种性的感觉。

战争结束后几年，我进入松山市的高中，在那里的美国文化中心图书馆里发现英译本的《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我便在一直精心保存的日译本的书页下面贴上纸，对照英译本，把日译本没有译出来的瑞典地理名称一一抄上去。这也形成我这一生自学外语的独特的基本方法。

去年我去法国旅行时，在奥尔塞美术馆的小卖店买了一本法译本的《尼尔斯骑鹅历险记》。这是一本精致的version Intégrale （全译本）。我阅读以后，有一个新发现，法

国似乎在1990年才出版全译本，而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有全译本。我想，这是日本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吧。

这一两个星期，许多电视台都在播放与诺贝尔奖有关的节目，其中一个内容是说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获奖者都要“玩跳马（日语原文为‘跳蛙’）游戏”。我碰见那些看过这个节目、身居要职却与文学无关的人物，大概因为没有共同的话题——都要问我：您也跳马了吗？

这种时候，我就想起《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中出现“青蛙”一词的段落。我现在手头上只有法译本，这一段在作品的前面部分，描写家鼠与沟鼠在格里米城的战斗。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小时候看的书上，译成“白老鼠与黑老鼠的战斗”。我觉得还是法译本的好。

在这座城里筑巢的鹳鸟埃尔曼尼克站在家鼠一边，它向与尼尔斯一起旅行的大雁求救。于是双方举行会谈，不知道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还是这种鸟的天性，只见鹳鸟突然把尼尔斯叼起来，抛到二米高的空中，然后再接住，而且连抛七次。

大雁见状，都惊叫起来。从大雁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里，可以知道它们已经把尼尔斯视为自己的朋友。

“Que faite–vous Monsieur Ermenrich? Ce n' est pas une grenouille. C' est un homme, Monsieur Ermenrich！”

意思就是说：“你干什么？埃尔曼尼克。他不是青蛙，他是人。埃尔曼尼克！”如果斯德哥尔摩的那些热情洋溢的学生要我“跳马”，我就打算引用这句话，表示恕不从命。Je ne suis pas une grenouille……

现在，我来谈谈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源氏物语》。我没有资格作为一个研究家来谈论《源氏物语》。如果与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川端康成先生相比，更是如此。但是，《源氏物语》原著我也读过两遍。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还是学生，为的是向一位年轻的姑娘显示我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于是我们谈论《源氏物语》，加深感情。这位姑娘现在已经和我共同生活了将近四十年，实在可喜可贺。

第二次通读《源氏物语》，正好是在七年前。有一次，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与《源氏物语》之间似乎有一些共同点，后来觉得自己必须搞清楚。因为自己的想法过于笼统，向专家请教，恐怕也无济于事，也不能依靠《古语辞典》来解决，于是在每天去游泳的往返电车里，从头开始通读《源氏物语》。

我终于有所发现，在《虚幻》这一卷，作品中的主人公源氏五十二岁。那一年恰好我也是这个年龄，当时还觉得有点奇怪。该卷描写源氏在紫夫人去世之后一年里的哀伤生活，他想在梦中与紫夫人相见，未能如愿。源氏仰望天空浮云，咏歌悲叹。大概也是现在这个季节，昨天晚上的月亮也很美呀。“高天飞大雁，比翼令人羡。梦幻太空渺，何处觅游魂？”

与我国的近代文学不同，《源氏物语》的文学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可以运用现代西欧文学理论进行分析的地方很多。据研究家说，这首和歌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典故。这样说来，梦幻并非单纯的虚幻，而是擅长仙术的具体的人。大雁也被视为阴间的使者。源氏请求骑着大雁飞往阴间的梦幻道士，探听梦中都无法相逢的夫人的灵魂去



身穿尼尔斯服装的瑞典莫尔巴卡的少年

（大江菜採子画）



冲绳酒瓶里的插花

向何方。骑在大雁背上那个小小的人就是道士，他从天空飞去。这与《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故事情节不是一模一样吗？

最后，我想谈一谈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文学奖获得者的演讲，今年定在十二月七日。如果按欧洲当地时间计算，这一天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日子。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

我对于这一天的回忆，也与《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有关——在战争爆发这一天的个人体验的回忆，我已有文章发表，打算在斯德哥尔摩市内的小剧场举行的朗诵会上朗诵——现在我想说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年以后的思考，那时候我反复阅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还是刚才所说的格里米城战斗的部分，沟鼠军乘许多家鼠出去参加舞会，城里空虚之际，发动偷袭。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但觉得这样做很不好。

于是，我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在一天工作劳累之后总是独自喝闷酒的父亲。我说：对方还闷在鼓里，就发动战争，攻击珍珠港，这与沟鼠军队一样，是不对的吧？

父亲一直盯着我，沉默片刻，然后回答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正确的。"我听起来简直就像谜一样猜不透，接着，他告诫我："你刚才说的话，不许到外面说。"此后不到一个月，父亲突然去世。他寡言少语，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亚洲各国没有忘记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日本人也大体知道这一点。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补偿。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包括荷兰、英国等有人被送进我国的俘虏集中营的这些国家在内，整个欧洲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把此事铭刻在心，前往斯德哥尔摩演讲。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这一年里，至少有两本写我的书使我感觉到“谩骂毁谤”这个词的贴切。获奖以后，收到林家瘤平的贺电，我在回信中引用他父亲的一句著名的俏皮话，稍作修改：“对不起，这个诺贝尔奖让我得到了。现在可了不得了！”不过，当时还没有“可了不得了”的实际感觉。

我读到那些不符事实的臆测甚至歪曲事实的诸多文章，也总是火冒三丈。但是，一想到反驳，耳边就响起一个熟悉的声

音：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亲耳听到渡边一夫先生说这句话，好像他的随笔也谈及此事。有一个人，战前是左翼运动的勇猛斗士，但战时转向——国家权力强迫转向——后来靠翻译法国文学维持生计。渡边先生对这位“一高”[①]时代的朋友不惜倾力支援。但是，这个人很有商业才华，战时以军需物资买卖起家，战后急速发展，成为我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实业家。

战后，这位实业家以各种方式向渡边先生表示感谢。这自然可以传为佳话。一次，实业家请先生到一家豪华的“料亭”[②]用餐。我不知道料亭是否都有这种规矩，正是炎热盛夏，那时候还没有空调，于是把先生带到屋外的浴室里。一起泡过热澡，实业家站起来，腹部下面那个东西仿佛炫耀般挺在先生的鼻子前面。先生不由得大喝一声：你这是要干什么！

幸亏我从来没有和这样的豪杰——或者冒充豪杰的人物——打过交道，也没有和别人或者独自一人在料亭里洗过澡。试想想，要是古怪的朋友对自己这样做，一般人恐怕要么扑哧一笑要么说一句“对不起”赶紧避开目光吧。如果是健壮的年轻人，或者是搞体育的人，一时兴起，也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比试一番也说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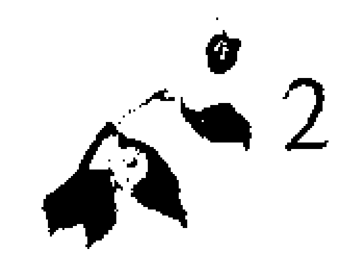
要是碰上性格比先生更加火暴的我，也许会抄起浴

① 一高，日本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的简称。——译者注
② 料亭，高级日本菜的简称。——译者注

室里的小木桶，舀一桶冷水，劈头盖脸地泼过去。然而，先生大声斥责他“你这是要干什么！”先生这样的反应完全体现他的性格。既然没有发生“要干什么”，对方恐怕也是满脸羞愧吧。他们洗完澡后的晚餐又是什么样的气氛呢？

我自己也被先生用法语斥责过，意思和“你这是要干什么！”差不多。我曾经和现在工作极其出色的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一起办过杂志，叫做《冲绳经验》。渡边先生每一期都为我们设计封面。但是我在一期杂志里引用了一位冲绳人写的批判天皇制的文章。立刻收到先生用法语写的一封信，他口气激烈地谴责我在政治问题上的轻率态度。我理解先生的苦心。其中有一段话让我震惊：“以文笔为业者不能利用外行人的投稿之类的文章。否则，任何卑鄙无耻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而自己的双手却是干干净净！”我从对自己诬蔑中伤的书里找出实际例子，回想着先生的表情和声音。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另外，我还感觉受到这样的冷嘲——尽管在口气上与“你这是要干什么！”有着微妙的差别。其中一件事我写在《平静的生活》里，但场景略作改动。这部小说

拍成电影以后，读者又有所增加。对书中写的一些事情，一位老朋友医生提出与我理解的含义不同的解释。我想就此事谈谈我的想法。

《平静的生活》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不久以前，一位医生请父亲和我去吃饭。我们记错了约定的时间，结果迟到一个小时，这是我们的过错。但是，主人方面一位看似实习医生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大肆攻击。他说："一到自己的病房，就看见很多婴儿，他们来到世上就是悲惨，却又不能杀死他们。"父亲曾在文章中表明这是影射哥哥。他的话显然是对父亲的攻击……我也对默不作声的父亲感到恼火。

其实，我在和日本康复医学的权威学者对谈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件事。那是我无法忘记的体验。因为他的话给我直截了当的感觉：您养育着残疾的孩子，你这是要干什么！那个年轻的医生也对那些身患重病的孩子尽力治疗，他一定是在工作劳累之后，才吐出那样的感想。虽然如此，难道那个医生就一辈子给这样的孩子治病吗……

我的那个医生朋友说：侮辱你和光的那个年轻的医生凭借自己的高学历，曾经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工作过，也是在那样的病房，但是认为他会一辈子从事这个工作，恐怕还没有证据吧？他大概会离开"来到世上就是悲惨，却又不能杀死他们的婴儿"病房，到哪个大学的医学系当教授吧？



3

我从小就觉得大人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可理解的地方。有这么一件事，我在许多文章都谈到，我在森林覆盖的山谷小村里出生成长，村子中央有一条通往大桥的道路，路旁住着一户人家。这家主人干着租船把牛运往大阪的行当。这些牛都要被偷宰食用，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粮食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使不是私宰，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

船很小，往往超载。有一天深夜，风高浪大，船只失踪了。他的年轻妻子前来借钱，准备明天一大早前去寻找丈夫，气氛异常紧张。为了帮助这位不幸的妻子，左邻右舍的妇女们聚集起来，大家伸出真诚的援助之手。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

当这个开始绝望、却又抱着一丝希望的女人搭乘运木材的卡车出发以后，母亲回到家里，心情沮丧地坐着，一动不动。我便把心中的疑问告诉她。

母亲对我的任何问题，从来没有立即回答过。但她绝不是不予理睬。只是默默地——有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有时凝视自己正在干活的手指头——听我把问题说清楚。只是在我问话说到半截不再往下说时，她会责备我：为什么要问这种鸡毛蒜皮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一想？

于是，只要自己有不明白的地方，总是站在母亲身边问她。昨天半夜，大风骤起，森林呼啸。小船上装着几头惊慌不安的牛就出海去，结果失去行踪。不仅我，村子的人们也都担心，会不会是翻船了？既然已经没有希望，为什么还要借钱租

船，出海寻找呢？出发的时候，那个大婶说："要是能找到尸体也就满足了。"有必要仅仅为了找到尸体，就借那么多钱吗？为了还债，将来还要辛辛苦苦地干活。还不如和孩子们一起在家里等警察来通知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办法吗？村子里那些考虑周全、受人尊敬的人们为什么不向这可怜的大婶建议呢？

如果用现在浮现在我脑子里的话来表达，当时虽然我还是小孩子，其实想对那大婶说：你这是要干什么！

母亲听我讲完以后，这样回答我："他干的活实在愚蠢。不过，要不干那活，干别的活也许活不下去。说不定他觉得还能干下去，其实不过是空想。现在和几头牛一起可怜地翻到大海里，他的老婆不能不去找吧。借的这些债，以后和孩子们拼命干活，大概还得了吧。你为什么要责怪她呢？"

我对母亲的回答不满意，她甚至带着斥责我的口气，我心里很不高兴。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母亲瞥了我一眼，然后对我不理不睬，似乎坠入沉思。

根据人生经验的智慧，对刚才还认为错误的事情，也能理解这是惟一的选择。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此类事情也几次表示理解……



于是，"你这是要干什么！"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就具有双重含义。一种含义是：公开表示自己明确决断的这句话，

出自渡边先生之口，就具体存在于我的心中。另一种含义是：通过与光的长期共同生活，认识到理智的价值判断在生存的积累中未必占优势。那么，将残疾孩子作为家庭的核心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对这句话，自己现在可以采取明确的拒绝的态度。

光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已经将超越家庭的情感传递给社会，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世界。这自然使我们家庭喜悦。但是，我以及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因此认为——我已多次表示过——我们与光的共同生活一切满意。

光的身体状态基本上是健康的——虽然常有轻度发病，每次发病，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充满新鲜的紧张。光每星期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五天，而且从中感受到乐趣。他这样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全家带来充实感。光喜欢作曲，即使并非如此——他喜欢听音乐，有人怀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与家庭的生活基础早已崩溃——我们不是成功地把光置于家庭的核心，使他健康成长了吗？实际上，我们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极少把光作为以作曲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人来对待。

我们意识到光是给家庭带来愉快活跃的重要成员，并非因为他是作曲者的缘故，而是从——如昨天发生的——这样的小事中认识到他的存在。昨天吃过饭后，光的母亲和光的妹妹坐在桌旁好像在聊年轻的女性如何自立的问题。女儿说，独立生活，就需要公寓的一间房子，而房子实在太贵。自己以前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工资大

部分都存起来了，但是拿这些钱都买不了一间哪怕是报纸广告上宣传的廉价公寓……

女儿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流露出心中的郁闷——以她的性格而言，极少这样坦言——妻子也只是面带忧郁地听着。这时，光走到挂在大门旁的纸箱前——纸箱里放有一些硬币，都是出门买东西找回的零钱，顺手扔进纸箱里，以作为支付各种费用时的零钱——把里面五十日元和一百日元的硬币全部拿出来，放到妹妹面前的桌子上，彬彬有礼地问道：

“这些够吗？”

我多次说过，我从小就喜欢想像。小时候那一次由于对邻居把牛运往关西私宰而失踪的事件表示不理解，遭到母亲的责备，当天晚上我一直无法入睡，胡思乱想。那个大婶把孩子扔在家里，带着从左邻右舍借来的钱——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境大概不会宽裕，但好像母亲还是资助了——租船出海寻找丈夫。幸亏前一天夜刮起的大风很快平息下来，她终于找到自己的丈夫，船长以及船上的牛也都平安无事……

那一天，我受到母亲的教导以后，认识到即使人和牛都已翻船落水，无法寻找，那位大婶的做法也是对的，甚至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





十一月中旬，我和妻子以及光去京都。因为在丸善举办《康复的家庭》画展，主办方说能否在画展期间过来举行这本书的签名会，我们也好久没去京都了，于是一家人出门旅行。一大早，我们乘坐小田急线电车到达新宿的时候，光的病轻度发作。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带他上厕所。我让妻子看着行

① 国际艾美奖，EMMY AWARDA，美国电视艺术科学协会奖。——译者注

李，自己带着光走进厕所，但没有空位。于是我们进入换乘的电车剪票口，到JR线的大厕所去。因为坐式厕所都已有人占用，实在等不及，我只好和光一起进入蹲式厕所，帮他解手……

我们这样折腾一番以后，终于在东京站坐上了“光”号新干线。没想到在车里遇见建筑师原广司先生，实在令人高兴。在我家乡的中学修建新校舍时，我曾请这位多年尊敬的朋友帮忙设计。每次回乡看到那漂亮的校舍建设的过程，成为我的《燃烧的绿树》中教堂建筑的原型——同时还引用了原先生的论文。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每次见面，原先生总是以略显羞涩的轻松语调谈论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独特思想。他计算过现在世界人口与陆地面积的比例——他非常喜欢数学，当然这是基本的计算，却如幻象绘画般美丽。而且为人稳重，他的一位同事的夫人说，每当他心情忧郁的时候，总是阅读新的数学书。我想说这一点与自己看算术书很相似，但毕竟在水平上不可同日而语。按照他的“一人都市”的构想，把全部人口平均分布在整个世界的陆地上，就日本而言，平均每隔六十米就有一个人，相当于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

我对他的话时而黯然，时而大笑，心里觉得很充实。而且他还带我参观正在建设的京都新车站工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建设这么现代的建筑物，引起社会的争议，这位建筑师恐怕不得不经常忧郁地阅读数学书吧。就在一个月以前，我还看过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写的全盘否定

的文章。虽然漏洞百出，错误明显，却没见建筑界有人站出来反驳。然而，这座车站竣工以后，应该说是京都给二十一世纪增添了最宝贵的财富。

举行签名会时，开始光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在一旁休息，后半场他也参加，在我身边回答大家的问题。听过他的ＣＤ的人们热情地鼓励他，使我们一家十分高兴。后来，曾经邀请我们去萨尔茨堡旅行的Ｋ夫妇请我们品尝京都菜——我对京都菜一无所知，只记得在谷崎润一郎等文豪的文章里，对其用料、烹调方法有所记述。京都菜肴本来是很好吃的，但话兴一浓，也如往常那样，不记得究竟都吃了些什么。

我获奖后，大阪的Ｒ饭店曾经邀请我前去住宿——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前年和我一起在意大利获奖的老朋友谢马斯·希尼，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时间已隔很久，妻子打电话询问招待券是否还有效。对方表示热烈欢迎，提供套间——光要不和我同屋，要不和妻子在另外的房间睡——我选择了后者，独自看书到天亮……

这天晚上，一到电视播放新闻的时间，我就用遥控器打开电视，这样终于没有睡成，也就一直阅读希尼的诗集。当地时间应该是前一天的深夜，授予优秀电视作品的国际艾美奖在纽约发布。因为我的多年老朋友、《父子共鸣——大江健三郎与光的三十年》的制片主任、ＮＨＫ的山登义明正在纽约参加颁奖会。

但是到卫星电视的最后新闻节目里还是没有艾美奖的报道——其实在我们吃京都菜的时候，已经在７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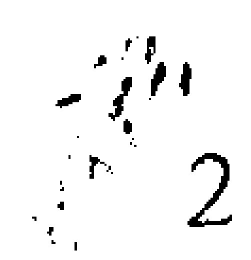
新闻中播过。我只好睡下，脑子里却浮现出因劳累病倒后刚刚恢复健康的山登那一张略显羞涩的清癯脸庞——那时他身穿一件小晚礼服，那还是ＮＨＫ 的道具服装！第二天一大早，我从套间走廊的大门下取起塞进来的报纸，果然发现刊登了一封光的信。

获得纽约的文美奖，非常高兴。登在什么报纸上，都一样，信的内容。我的作品，今年就要结束了。但是不论哪里的大厅、舞台，都可以上台。当然，无论什么人的现代音乐，都很好听。我打算从明年起，不举办音乐会。不在自己的家以外举办。除音乐会外，我想在忘年会上演奏。不过，在晚上举行。也请您参加。

这是发给长笛吹奏家小泉浩的传真。传真发出去以后，我才看到原稿，从中发现光的心灵的新动向，因此在这里稍作解释。今年举办的光的作品演奏会很多，每次家里人都要陪他出去，而且当观众要求再演奏一次时，光都要上台致谢。这就是光在传真中所说的“不论哪里的大厅、舞台，都可以上台”，但多次反复以后，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心的疲惫。于是经过再三商量，我和妻子决定光的作品演奏会在今年告一段落，明年起光集中精力，一边在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一边作曲。

光表示同意，但似乎有点遗憾，情绪也有所消沉。于是妹妹叫几个朋友在家里演奏，去年的忘年会就演奏过。另外，小泉从去年开始连续吹奏我国现代作曲家创作的、

几乎被世人遗忘的长笛曲子。光向这位最尊敬的演奏家倾诉自己的心思，也包含着对他的赞赏。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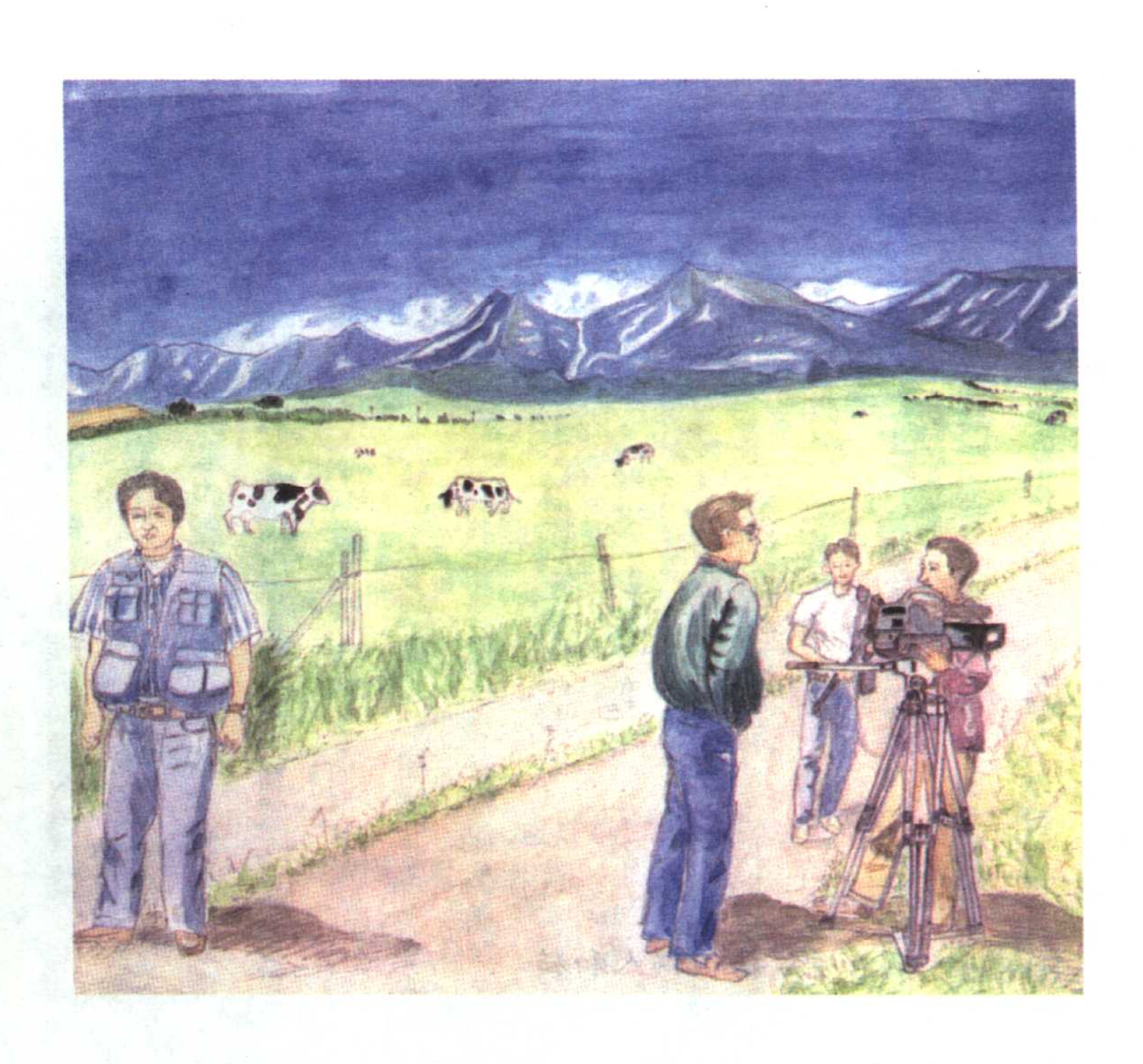
我还想引用山登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他用英语发言，听说事先请住在纽约的一位歌剧演员纠正他的英语发音和语调，发言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

在我制作的节目里，有一个大江健三郎先生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镜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说过自己已经写完了最后一部小说。就是这部小说。他在原稿的结尾写下“Rejoice”，然后放下笔。当时他把这个词的拼写错写成“Rejoyce”。大概是因为情绪过于兴奋，喜悦与大作家的名气在他的脑子里融合在一起的缘故吧。

这一次他知道我要到这里来，对我说：“请你告诉美国的知识界，我也懂得Rejoice的正确拼写了。”

仪式结束以后，我将给在日本的大江先生和他的儿子打电话，想对他们说：Rejoice，my friends!

《父子共鸣》是怎么拍摄的？产生什么样的反响？在国内还没有看到有关的评论，但在中国的电视节上获得了金熊猫奖。我在《康复的家庭》一书中已谈到这一点。另外，在这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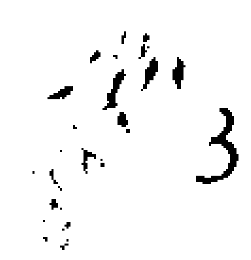
NHK 在北海道拍摄电视记录片《父子共鸣》外景



法国偶人和猫

组成的摄制组中，H 摄像师与M 制片人一起十分辛苦地工作。我在祝贺他结婚的信函中也有所涉及。

我与山登是有难同当的关系，在拍摄《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时候，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销毁核武器的工厂一起被警卫扣留，在汉城机场差一点一起被立即遣送回国。今年夏天，他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住院。我赶到湘南医院去探望，只见他得到母亲的精心照料，躺在病床上，但似乎满腹牢骚，脸冲着墙，对我的问话爱答不理的样子。他大概天生干活的命！回来的电车里，我读着斯宾诺莎的书，一边在书上画着红道。一位母亲陪着她美丽的女儿坐在对面，少女嘴里不停地唠叨着，似乎在诉说心中的忧虑。她的脸颊上有一处碰伤。母亲一边照护她，一边看着像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平静的生活》。这本书的读者并不多，在她们下车的时候，我向她表明自己是该书的作者，表示感谢。母亲说：这个孩子也是残疾，每天都要这样接送。不久以后，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登出这位母亲写的小文章，谈到这天和我的邂逅。我去探望山登——他已经超越电视制片人的身份，如同亲人一样注视着光的成长——的那一天发生的一起小事，成为我美好的记忆。那个美丽的少女脸上的伤口已经痊愈了吧……



国内评论界如何反应姑且不论，《父子共鸣》以出乎意料的高质量电视片获得众多观众的青睐。曾在岩波书店一起编辑《渡边一夫随笔集》的我的尊敬的前辈清水彻——在从王子经东京大学开往丸善的电车里，我曾向这位当年是研究室助理的清水彻请教过名列书籍排行榜的一本书的原文，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看到其中的一个镜头，对夫人——她也认识渡边一夫先生——说道：跟先生一模一样。听到这样的反应，我很高兴。

渡边一夫先生晚年依然英姿飒爽，我在外表上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样”。清水彻看到的那个镜头，就是前面所说的山登在发言中提到我在完成《燃烧的绿树》初稿的那一天，我胡子拉杂，不想就这么上镜头，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妻子说：“没关系。一会儿再刮，一对照更显得干净清爽。”我显出未必如此的表情说：“就你还这么想呀。”

为纪念获得艾美奖，电视台重播这部片子。我在观看的时候，想起一件事。上中学的时候，我未来的理想是成为物理学家，也就为自己设计一个理想性的外表姿态。我之所以想搞物理学——不久以后，我在东京大学的考场，面对物理考题，完全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因为受到两个影响：一个是学校老师整天灌输我们“日本人战败是由于没有科学”的观点，另一个是汤川秀树博士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但是，按照汤川博士那样的白皙型无法描绘自己未来的容貌，于是把自己归入漫画里那种衣冠不整、疯疯癫癫的老科学家那一类……

由于获得艾美奖，《父子共鸣》英文版录像本年内一直在纽约市电视·广播博物馆内公开放映。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部片子不仅讲述光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故事，同时也是讲述日本人对广岛体验的故事。今年是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五十周年，本来预定在纽约史密生博物馆举办的原子弹轰炸展览被取消了，但经过市民和学生的努力，还是在美国举办了几场小规模的广岛、长崎展。我们的电视片能成为其中的一项内容，我作为参与者感到高兴。

这部电视片也和山登拍摄《世界还记得广岛吗》一样，在广岛的外景拍摄上花费最多的时间。整部片子拍摄的时间就很长，用了大量的录像带。

有一个场面虽然没有用上，但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尽管年老以后，对遥远的昔日的景象要比最近的记忆更加鲜明——就是到坐落在远离广岛的田园美丽风光中、重藤文夫博士出生的住宅拜访其夫人的情景。

我们坐在土门拳拍摄的重藤文夫先生的照片下面，光显得特别老实。夫人有声有色讲述先生的事情。我充分理解在农村生活中具有指导地位的财主豪宅和周围的风土习俗，以及世世代代培育形成的人的素质是如何造就出那杰出的医学家，并感到骄傲。夫人回忆起先生的往事，说话生动幽默，栩栩如生。我和妻子以及光坐在她面前，儿子自然屏息凝神，我们也受到极大的教育。即使家长不在世间，他的精神通过宽松的纽带依然在家庭里完全继承下来。这是情感教育。这条纽带十分宽松，丝毫不会束缚人，手持纽带两端的人互相尊重敬爱对方，但不必说出口，让时间宁静地流淌……这才是真正的家庭。



黄昏的读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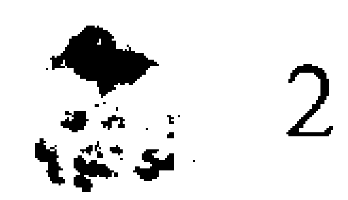
1

我想给硕士课程已经结束、即将去企业研究所工作的你写信，或者想给因健康原因即将辞去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你写信。要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会立刻开始乱写一气，或者寻找机会，等待对方出来，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希望他什么、祈愿些什么。至于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根本就没有考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觉得对方和自己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共同生活的时代，所以很天真地相信，只要自己说的是真实的想法，也就是别人的心里话。

然而现在，虽然还没有自虐地变成老年人的车轱辘话——我想，你们也不会说："那儿的问题可能成为你的重病。"——每当自己要对年轻的朋友说点什么的时候，总先要聚精会神默不作声地深思熟虑一番。把要说的话先在心里过一遍，具体地想像一下对方会有什么反应。这虽然也是我审视出现不能一笑了之的事态的迹象的时机，但已经想好的一番话往往咽在肚里，终于没有说出口。

于是，我怀着亲切而甚至又含带些微的恐惧和悲伤的情绪，想起我的终身的老师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而当时他面对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然而，那个时候，我至少还可以读到老师写的东西。因此，我现在不准备直接给你和你们谈话或写信，而是打算以客观的方式写一些备忘录式的文章。

我想写的是我对最近所看的书——主要是斯宾诺莎著作以及研究这位十七世纪的哲学家的一些入门和专业的书籍，但这里所说的并非此类书籍——的几点感想。而且把关于对这本书的备忘录称为"黄昏的读书"，就是在人生黄昏时刻的读书感想。因为这也可以让我回想起喜欢使用这种语言词汇的老师……

 2

首先我要谈一谈R.S.托马斯的诗。因为我在威尔士

读到这位老诗人的诗集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偶然，虽然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只要认为某本书、某个作者对自己的确非常重要，往往会在偶然的机会，如同命运的安排一样必然地与其相会。这难道不是读书常见的现象吗?

今年（1995 年）四月，我到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我想起高中的时候，因为与加拿大的多伦多的发音容易混淆，英语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到亚特兰大时，后面接上佐治亚，这样就不会出错。今天我飞往亚特兰大，而我的英语发音和 40 多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

亚特兰大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城市，又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从高层饭店的窗户俯视四周，广袤的平原上树木蓊郁，如同茂密的森林。该市为明年（1996 年）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准备，今年举办“文化奥林匹克运动”，请卡特前总统主持，健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数也应邀前来参加，我也是因此而来。由 ABC 的节目主持人迪特·克蓬主持学术研讨会。

活动结束以后，我去纽约。那儿我有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名叫简·斯坦因，年轻时与福克纳亲密交往，并选其前期的采访记录出版。她的丈夫是一九八一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获得者特鲁斯特恩·维泽。光灌制第一张 CD 的那一天，特鲁斯特恩恰好在东京，也特地前往录音现场。之后举行的晚宴上，可以说是当今美国文坛最智慧型的女文学家苏珊·桑塔格问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种“露脸”的活动?

我的确觉得亚特兰大那场学术研讨会开得不错，便

如实回答。参加会议的作家、诗人将二十世纪地球人的痛苦体验化作各自的精神创伤，使我真切感受到我们原来是如此生活过来的。法国的克洛德·西蒙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考验的知识分子。帕斯后来成为墨西哥的外交官，在担任驻印度大使期间，墨西哥城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在特罗卡迪尔洛广场发生游行学生与警察冲突导致学生大量伤亡事件，帕斯愤而抗议辞职。从我个人与他的交往来说，二十年前，我在墨西哥城过着孤独单调的生活，他把我叫到自己的住所，给予我热情的鼓励。我对墨西哥的了解也正是始于当时阅读的帕斯的《孤独的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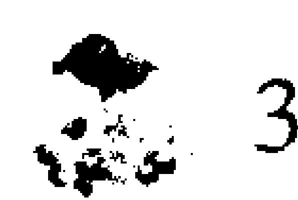
波兰流亡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冷战时代饱尝东欧的苦难，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我也曾在该校工作过。从前苏联流亡美国的约瑟布罗茨基也亲身经受诸多苦难。在西方国家最早高度评价他的诗歌，并以美丽的诗句赞颂这位世界语言市民的是德里克·沃尔科特。他是经受着美国资本主义惊涛骇浪袭击的加勒比海地区的代表性民众诗人。另外，托尼·莫里森是描写美国南方黑人生活和情思的作家。

沃尔·索因卡以诗歌和戏曲深刻敏锐地表现尼日利亚民众的神话传统和殖民时代以及独立以后困难的政治状态，现在也过着流亡生活，却仍然顽强不屈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只要看一看参加亚特兰大学术研讨会这些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们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典型地承受着二十世纪人类的创伤、并将其表现出来的文学家。我的这种想法能

否为这位女作家所理解呢？

在这些外国同行的眼里，我肯定也承受着独自的心灵创伤。我生活在亚洲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与欧美交战时期度过自己的少年时光，战败后，在外国的占领时代，萌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念头……而且，这些优秀的作家、诗人同行都已经知道，我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学作品都是以与残疾孩子共同生活作为基础的。我的生活绝对无法从核武器时代的广岛不断发出的光亮中获得自由，但我绝不会认为无法被理解。

 3

亚特兰大的活动结束以后，因为《感化院的孩子们》——这是我获得芥川奖以前的初期作品——英译本出版的关系，到纽约、华盛顿、哈佛大学所在地坎布里奇市等进行讲演、公开对谈，接受许多媒体的采访。每次采访总要询问对刚刚在美国发行的光的CD的看法。对于儿子的音乐创作问题，我总是格外热情地回答。后来他们寄来的报道文章也总是强调这一点。

接着，我去英国，同样也是为出版做宣传。我在伦敦的大学和书店里做着与在美国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次出版的《感化院的孩子们》以及即将出版的《广岛札记》都是一位名叫玛丽恩·博雅芝的女士经营的小书店率先在英国出版的。我的小说英译本在英国几乎无人问

津时期，这位玛丽恩女士就一直坚持翻译出版。她生于美国，已是老年人，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谋生，现在她英国式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地道。她的丈夫是出生于坎布里奇市的诗人，当过编辑，具有文武双全的广博知识。这老两口虽然总是吵个没完，但玛丽恩说，他的老伴阿萨年轻的时候不论在哪一家出版社工作，知识都比上司渊博，结果因此没能上去，算不上成功的编辑。这位阿萨精通正统派爵士乐，和他一聊起来，我回到年轻时候对爱德华·埃林顿的热情，还发现许多三十年代的唱片音乐都数码录制在CD上，打算回国后重新“发烧”……

我们三个人乘坐火车，观赏沿途恬静优美的暮春景色。目的地是西南部的威尔士，参加文学节。火车经过加的夫——我只知道这是该地区的产业城市，然后抵达斯旺西。威尔士的诗人，我就知道迪兰·托马斯的名字。我到这位诗人的出生地来，是为了寻找关于研究他的书籍。经过长途旅行，我觉得身体疲惫，老实说，这句话只是激励自己完成最后日程的借口。

我们在斯旺西站下车，车站的地名标记使用英语和威尔士语两种语言，然后驱车往北穿越半岛的颈部，在休养地的饭店安顿下来——青灰色的大海对面就是我长期阅读、喜爱的诗人叶芝的故乡爱尔兰，十分向往却至今尚未去过——斯旺西市比我想像得要大得多。我们一到文学节会场，知道当地的文学家们先要为他们尊敬的老诗人举行内部纪念会。

在这种靠近边境、同时具有独特文化的地方，当地的文学家们往往具有略微扭曲的自信和家乡情结。从别具一格的开会演说中，我

知道他们纪念的诗人名叫R.S.托马斯。这位R.S.托马斯比斯旺西出生的迪兰· 托马斯大一岁，生于一九一三年，依然健在，住在威尔士。

这个纪念会结束后，会场就转移到大礼堂。在那里由我和玛丽恩进行对话式的讲演。她没有抽时间和我仔细商量这种互相讲演的具体细节，我心里挂念着讲演的事，所以在会场只记得R.S.托马斯这个名字。不过，主办方安排给我们开车的青年司机是一个R.S.托马斯迷，他已经准备好两本平装本诗集送给我。

晚上，我躺在简易床上，窗户对着大海，外面岩石巍峨耸立，难以入眠，便开始翻阅收入这位诗人后期——其实他还健在——作品的诗集。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心灵的震动，发现这才是自己寻找好久的诗人。而且我知道，这个偶然性会成为改变自己人生的起点，自己已经开始一次重要的接触。于是，我终于坐起来，一直读到拂晓，灰白的天色显现出荒凉的草原和伫立着黢黑大岩石的海角。自己的小说在国外翻译出版，不会有很好的销售效果——实际上，在伦敦、斯旺西举行的签名售书都没有什么顾客，现在跑到威尔士搞促销，心里一直觉得别扭。可是，诗集使我把刚才还是自嘲般的沉闷心情忘得一干二净，居然如此实用！

托马斯的诗歌语言易懂、结构朴实，但分行、标点等独具一格，绝非随意组合。虽然我是第一次读他的诗，而且读得入迷，但同时我也立刻明白，他的诗具有难以读透的本质性的难度。

正因为如此，我坚信只要努力克服困难，就可以理解它的深度，于是逐渐入迷，终于起床，在窗户和没用的电视机之间狭窄的空间来回走动，甚至感觉到脸颊炽热发红。这部诗集使我感觉到坐立不安的兴奋激动。

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发出感叹："也许已经来不及了！"



蔷薇的读书「二」

1

是这么回事：自己打算阅读这个诗人的全部作品以及寻找到手的有关研究他的所有书籍。但是，最近正开始阅读在纽约、伦敦搜寻购买到的有关斯宾诺莎的入门书和带有专门研究的书籍。那么，我的人生是否还留给我阅读这位刚刚结识的诗人全部作品的足够时间呢？这个念头似乎威胁着我。

这个念头直接来自对六十岁这个岁数的自我意识。最直接的标志是，我从托马斯的诗集中发现他在这个年

龄创作的作品，非常喜欢。我从这首诗里发现“outgrow”、“活着”这样的单词，一下子激起我的情绪。因为这是我年轻时候在奥登的诗歌里读到的词汇，十分喜欢——还以“把我们的疯狂活着的道路告诉我”作为自己作品的题目。

下面我要谈论R.S.托马斯，先翻译一首他的作品，让读者体会他的诗歌感觉。这是题为《老者》的诗：

六十岁还
活着　这拥有
语言的寓言。为抹去人名而准备的笔
没有这样的生命之书。审判的
日子　未来对我们
在这里接受陪审的判决
毫无兴趣。难道有
没有语言的判决吗？
主
是祈祷的方式。停止
说话吧　那样只有沉默。他拥有
传递自己的媒体吗？

银河意味着什么？
正如星星向地球的
荒凉地带、城镇转播一样
但那是冰冷的信息。中心

有一个没准儿的地方。
应该成为　没有尽头的
和平的东西的　核心里
存在着的动摇。
一个男人的影子
落在历经数百万年的岩石上，
从黑暗的游泳池也涌上
喝水的念头，但干渴已经消失。

还有一首诗《不存在》是这样写的：

那是巨大的不存在
如同存在，并不
期待回答　就逼问我。
那是我进入的房间

有人刚从那儿出去
迎接还没到的人的
门口。我把自己落伍的语言现代化

然而他已经不在此处，
与先前一样。遗传基因和微分
没有呼唤他出来的力量，
与希伯来人在祭坛上焚的香一样。

我的方程式无能为力，如同
我的话。我具有
什么请求的手段呢？
他不在　我的
全部存在的空虚，
除了他也许并不厌恶的真空。

2

一位名叫维利阿姆．V．迪威斯的学者编辑的《令人惊奇的单纯》一书里，收入许多有关R．S．托马斯的随笔。我发现有一篇像是诗人本人写的自传，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我认为神秘家要求直接和主接触是有根据的。但是，主让我感觉到，他甚至选择通过自然的世界或者宇宙作为媒介显现自己。于是，我承认这样的情况：因为我选择对被创造物的爱，所以即使自己没有到达人在世间可能到达的最高状态，我也必定满足于“我就是这种诗人”这个事实。

虽然我居住在威尔士远离世俗的美丽地方，但和平几乎每天都遭到在头顶上训练的喷气机的破坏。

这些使我想起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令人担忧的和



在维也纳购买的木刻圣母子像



莱採子播种栽培的高山草莓

平。而且一旦爆发战争，恐怕难免发展成恐怖的核灾难。这是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的事实。这并不仅仅为我自己的生命而恐惧。我也和别人一样，谁都有儿孙。如果发生最可怕的事情，生命中一切最美好纯洁的东西都将化为灰烬。

我退出诗坛以后，整个半岛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出现开展核裁军运动的团体支部。我立刻参加这个运动，作为郡的代表，成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R.S.托马斯这位老者就是这样思考自己认为最正确的诗精神，开展这样的活动。我对他的整个精神怀着亲切的敬意。

诗集是托马斯即将进入晚年时一个转折点的标志。第一首诗是《那个时候》。《令人惊奇的单纯》一书里收有托尼·布朗写的有关这首诗的论文。其中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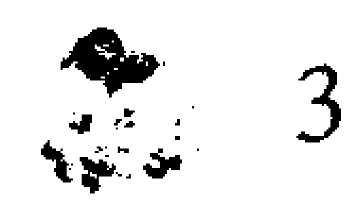
核战争的威胁，尤其一些政治领导人相信以核战争可以战胜别人的愚蠢主张使托马斯——这位和平主义者在四十年代就已经高声呐喊——不仅以笔，而且登上讲坛向广大民众大声疾呼，掀起反对核武器的运动。面对机器时代的终极威胁以及对阿巴夸格的毁灭，他指出："大地在冒烟，没有鸟儿的歌声。"

这里的"阿巴夸格"（Abercuawg）是托马斯描绘的一个虚构的村子的名字，是他理想中的古老美好的威尔士最典型的环境。他说过去"那个时候"曾经有过，或

许将来还会出现一次。他还有一首以这也许出现的“一次”为题的诗。在译出这首诗之前，我先把布朗在论文中说托马斯喜欢引用的平达的两句诗译出来。这两句诗描绘出与核战争造成的“大地在冒烟，没有鸟儿的歌声”截然不同的美丽世界：“人是影子的梦。然而，当主的睿智来临时，灿烂的光芒充满人们的心胸，一个美好的时代就要诞生。”以下是《一次》的译文：

主凝视着空间，我出现，
一边对所见过的一切揉眼睛。
大地在冒烟，没有鸟儿的歌声。
海边的沙滩没有足迹，
灼热的大海，没有生物。
主在说话。我藏在山的背后。
仿佛再一次出生
我走进微凉的露水里，
一边努力回忆那火的说教，
花草互相纠缠的合唱让我吃惊，
我在褐色的树皮上　看见
许多追求诞生的生命　那饥饿的脸的形状
沉默地张嘴对我说话。我继续往前走，
一边注视自己的影子，明确地
向着光。在早晨的晚些时候
你　从我的身体深处　对着我
起身站起。我牵着你的手，

一边回忆你，一起
成为那白昼与黑夜的同盟者，
我们向前进　为了与那“机器”对抗。



3

我还想翻译托马斯的另一首诗《否定的方式》。这首诗在论文集《令人惊奇的单纯》中涉及最多。我读了一篇论述托马斯创作手法的论文，从该诗第一行使用的对话方式可以看出作者的诗歌构思。这种以via negativa（否定之路）确认主的手法成为托马斯后半期诗歌的低音基调。另外，诗中的“期望主的侧腹的温暖”的部分可以与《约翰福音》中的如下部分相对应：

十二门徒之一的绰号为“双胞胎”的托马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于是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主了。”

托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用我的手指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否则我绝不相信。”

……耶稣对托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着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不相信，你要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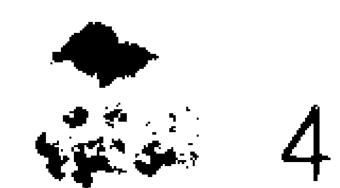
托马回答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没看见而相信

的人是幸运的。”

这位与耶稣的弟子的名字结缘的R.S.托马斯似乎经常把自己与《约翰福音》中的托马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另外，纳格·哈马迪资料的发现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我国学者荒井献研究的《托马的福音书》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诺斯替教派的资料。这个托马、称为“双胞胎犹大”的托马就是这部福音书的作者托马。

为什么这样不行？！别的我没想过：
主是伟大的不存在，
在我们的人生里　　以及我们内心空虚的沉默，
还有我们寻觅的场所，
无望到达或者发现。
他保持着我们知识中的空隙，
以及星星之间的黑暗。他是
我们追赶的回声，
他刚刚留下的足迹。
我们把手伸进他的侧腹，
希望那是暖和的地方。我们凝视
人们、场所，如同他曾经凝视的那样，
但没有接触他的反照。

 4

根据对这首诗的注解，托马斯试图使用否定的方式来肯定主。他并不是说没有主，相反，他确信主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主的回声和足迹都是主刚刚发出声音，刚刚出现过的标志。

R.S.托马斯在接受对他深入研究的涅特·托马斯和约翰·巴尼的采访时，就核战争危险问题作了如下阐述：

……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表明自己的思想。我想，它强大的声音可以包含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到贝克特的所有强音。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毁灭的问题，不论这是对人类自傲的惩罚，还是人类自身欲望和蛮横造成的结果。然而，即使在最后时刻，让我们重温塞南古的那句名言："人也许最终是要灭亡的，剩下的也许仅仅是虚无。但是，不是在抵抗中灭亡吗？那么，就将其视为不对吧。"即使是在地球这颗行星的末日，我仍然喜欢一边眺望遥远的宇宙，一边用母语思考、谈论爱与美的人类。

上面引用塞南古的这段话的日语译文是渡边一夫翻译的。托马斯在采访时引用这段话的法语译文，大概当时没有直接引自原文，而是凭记忆——欧美的作家、诗人在引用别人文字时，似乎经常不严格引用原文——所

以有些遗漏。我在此处引用渡边一夫的译文补齐。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读到渡边一夫的一篇引用这段文字的随笔，在我十八九岁的少年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塞南古的这句名言一直铭刻在心。与同样是渡边一夫的出色翻译或者引用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诗人、作家的名言一样，成为我语言宝库中的精华。

现在，我人生黄昏时刻的读书时，手捧着在遥远的威尔士旅行时得到的诗集，然而，强烈震撼我这个进入老年的人的心灵的，依然是在书籍里发现塞南古的这句名言。当我重读这句名言，发现自己与四十多年前开始阅读渡边一夫文章的时候，几乎没有变化……

后来，我真正认识了渡边一夫。现在，我通过诗集等认识了R．S．托马斯，发现渡边一夫和威尔士的诗人通过塞南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打算就像年轻时候阅读渡边一夫的文章那样，努力阅读R．S．托马斯，并且为此做好了准备。我想对年轻朋友们说：现在我切实感受到读书连续性的不可思议，以及人生——这不也是某种连续性吗？——的不可思议。



黄昏的读书「三」

1

我在上面提到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尔·索因卡。二十年前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至今还非常清晰。那是《东西方文化在文学里的遭遇》的学术讨论会，艾伦·金斯伯格也去了。他以我说的——那还是写作《同一个时代的游戏》时的构思——森林覆盖的四国山村的传说为素材，写了几首诗。我也根据在夏威夷的体验，以温特为模特儿，创

作出一部《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的短篇小说集。我初期集中创作短篇，后来一直写长篇，这回又重新创作短篇，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

索因卡以其响亮清爽的英语和富有魅力的形象——他身穿祖国的民族服装——在学术研讨会上大放异彩。从报到的时候开始，他的言行就显得与众不同，备受大家的关注。我们都住在夏威夷大学里，房子四周印度菩提树绿叶葳蕤。索因卡是位给人部落酋长接班人印象的英俊青年——我将在后面介绍他的戏剧创作。剧中的主人公曾在伦敦学医，但绝不屈服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比父亲更彻底地坚持部落的传统文化。这个富有魅力的主人公正是索因卡的写照——开口就是宣传革命运动，如同争取独立运动的勇猛斗士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提供给我们的房间简直就像监狱，无法住宿。让主办方给他一个人安排住在饭店里。现在想起来，他心里时刻都在担心自己一旦回国就要入狱，当时的那些话也许正是真实情绪的反映……

在亚特兰大的学术研讨会上，索因卡首先向主办国的代表卡特前总统猛烈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向对现在才被迫同意自己出国的尼日利亚政府采取友好态度的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显示出年轻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性格。但是，索因卡并非是一个脾气古怪、难以接近的人物。有一本记述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情况的书，其中谈到，这位非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大饭店——我和妻子也住过——的酒吧里，兴致上来，

参加年轻人的爵士乐演奏，使大家十分开心。

现在回到读书的话题上来。索因卡同意参加今年年底举行的读卖新闻论坛，我作为主办国的作家与他合作。主办单位派人去伦敦和他商量各种复杂的准备事项——他在英国流亡，没有尼日利亚政府颁发的护照，只能持着英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来日本——回日本时，带来他送给我的创作于1975年的戏剧《死与国王的骑士》。它深深吸引了我，我从中看到这位天才的工作。

我想按照顺序叙述该剧的故事情节，但还是先说结尾。在壮烈激昂的悲剧结束以后，市场女人们的领头人亚拉嘉向在场的人发出呼吁："忘记死者吧，也忘记生者吧。你们的心只向着尚未出生的来者！"

(她在新娘的陪同下退场。挽歌加大音量，女人们继续摇晃身体。灯光渐弱，熄灭，一片黑暗。)

索因卡的《序言》是他长期饱尝人生艰辛发出的警告。

本剧所描写的对抗极其形而上学。它以耶列辛这个人和约尔巴族的心灵世界为媒介，包含着把生者、死者、尚未出生的来者这一切连接起来的神秘通道，即变迁。

正因为他长期承受着人生的痛苦体验，所以才不得不说这些话。

这个体裁的主体群的危险就在于一旦被创造性地使用，就会被贴上"文化冲突"这个简单的标签。这种经

常性的误用自不待言，异国文化与本地传统在后者的实际土地上以前提的方式实现着在所有任意状况下的积极的等质。

作者在《序言》中说，该剧的原型是一九四六年在尼日利亚的约尔巴族故都奥约发生的一起事件。但是，由于剧情的需要，作者把故事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在作品里，年轻人被驱赶上战场将成为主题，所以能够理解作者改换时间的意图。战时，大概为鼓舞驻非洲的英国军人的士气，英国王子到非洲的某国访问。恰好当时该国约尔巴族国王去世，国人为引导国王的灵魂进入黄泉之门，正准备为被挑选出来的骑士举行殉死仪式。

戏剧的序幕是一座城市市场的场景，被挑选出来的骑士耶列辛正接受女人们的热烈欢呼。这些“赞颂者”紧紧跟随着耶列辛。耶列辛正全心全意地等待着殉死时刻的来临，这个阶段，他的精神会立刻轻而易举进入神灵附体般的痴醉状态。女人们对他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时为了神圣的仪式的需要，他还要接受新娘。随着仪式的进行，在女人们世俗的赞美声里，耶列辛成为世上罕见的富有才干、精力充沛的知名人物，整个气氛迅速浓烈火热。

耶列辛在半是痴醉的状态下向女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与鸟兽以及先祖的神灵的交欢。为了激励耶列辛，这些“赞颂者”起着灵媒的作用，代替那个已经死去但尚未与马匹与爱犬一起踏进黄泉之门、还需要骑士耶列辛引导的国王的灵魂发出声音。这种充满神秘气氛的祝词与市场杂乱纷扰的现实被强烈

生动地戏剧化。这个场景反映了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丰富思想性，索因卡打算在日本朗诵这一场的台词。

殖民地行政长官皮尔金举办假面舞会欢迎王子的来访，他戴着约尔巴族神圣的祖灵面具出场，使那些当地的仆人大惊失色。但是，也是为了实行殖民地的文化政策，这个长官在几年前把耶列辛的长子奥尔德送到英国学习医学。

当奥尔德获知国王去世、父亲将要殉死的消息后，他作为长子，必须负责埋葬父亲遗体的仪式，所以急忙赶回国内。而回国时又恰好顺便搭乘王子访问非洲的轮船抵达奥约港。

行政长官皮尔金听说要进行古老的殉死方式，便开始悄悄干预破坏。他采取鲁莽的方法，动用行政力量把耶列辛诱骗出来，然后关入监狱。这样，耶列辛引导国王亡灵进入黄泉之门以维持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生死秩序的仪式就完全被破坏。

奥尔德回到国内，皮尔金夫妇本以为他在英国学习医学期间已经被现代思想所改造，但是一听他说话，发现自己的期望完全落空。奥尔德责问这位白人行政长官的妻子：为什么要阻挠自己的父亲去殉死？但是，奥尔德还不知道父亲在行政长官的劝说下已经改变初衷，放弃履行这个神圣的义务，而且为了不被当地人抢回，关在监狱里被保护起来。就是说，他还以为父亲现在依然准备担任为国王亡灵充当引导的任务。

我怎么才能让您理解呢？我的父亲正受到真正的保护（这并非您所说的市民受到政府具有权利的那种保护）。如果没有从内心可以接受的最深切的保护，谁也无法完成他今天晚上将要实行的任务。他具有心灵的和平，

他具有民众赋予的荣誉和尊敬，您难道能够提供什么以取而代之吗？如果你们的王子在这次旅行中——在这次为展示殖民地旗帜的旅行中——不愿意接受冒着生命危险的机会，那您对王子会怎么想呢？

在欢迎王子的假面舞会上，一边是王子的热情跳舞，一边是如此剑拔弩张的谈话。奥尔德问道：“在这战事激烈的时候，你们怎么做出这样的咄咄怪事呢？而且还竟然把我们的习惯叫做野蛮！”行政长官的妻子回答说：“这是英国式的心理疗法，为了在思想混乱中保持精神的健康。”

“要是别的人，大概把这叫做颓废吧。但是，我对它毫无兴趣。你们白色人种知道如何生存下去。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通过一切逻辑性法则，通过白人的所有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消灭，通过对所有时代的所谓民族文明的消灭，从而让他们回到原始主义的状态。这个原始主义只存在于你们对我们思考时的想像力里，但我早就对此进行过全面的思考，然后长期加以认识。你们最大的技术就是如何生存的技术。但是，你们至少也应该具有允许别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的善良之心。”

“自杀的仪式难道就是你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吗？”

“这比大量自杀还要坏吗？皮尔金夫人，他们这些将军把年轻人送往战场这种行为，这应该叫做什么呢？”

但是，这个时候，奥尔德的父亲耶列辛已经被行政



玻璃杯里的风信子插花



蛙形名片盘上的三色紫罗兰、北极花的插花



墨西哥鸟形调料盒

长官说服——具有充分的现代思考意识的奥尔德在思想动摇的瞬间认为这种干预的偶发事件也是神秘仪式的一部分本质——耶列辛任凭别人带着自己离开殉死的地方。奥尔德赶到现场，但为时已晚。他了解事情真相以后，决定代替父亲殉死。他的尸体用本为耶列辛准备的裹尸布包裹着，在“赞颂者”的女人们、族长般的女人以及礼仪的新娘的护送下，抬到父亲面前。于是父亲在牢狱里自尽。接着，全剧在“忘记死者吧，也忘记生者吧。你们的心只向着尚未出生的来者！”的台词中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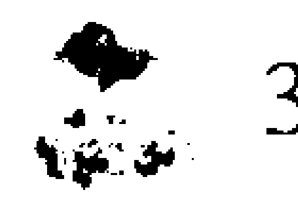
2



由于受到儿子的批评，耶列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行政长官放他出狱，重新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富有责任心的儿子会替自己完成殉死的使命。当行政长官断然拒绝他的要求时，耶列辛发出这样悲痛的告白：

在你们的教堂里，信徒低头轻声对着火焰喃喃自语，通过燃烧的蜡烛把自己的心声传递给上帝。难道我没有觉得这是令人恐惧的景象吗？世间听不见他的声音。我的话也不是说给别人听，甚至都不是说给抬行李——就是裹尸布和耶列辛的尸体——的那些人听。那只能是我悄声低语的话。父亲在我的耳旁低声说过，我在长子的耳旁低声诉说。我不能对着风和开放的夜空叫喊。

索因卡作品洋溢的这种丰富神秘的呼唤力量使我入迷。耶列辛还在全心全意地准备着殉死仪式的时候，他的身心处于痴醉状态下，那些通过自由自在地表现非洲风土和鸟兽形象的语言表达自己在阴阳两个世界之间自由来往的心灵景象的独白，也具有很大的魅力。我不能不相信在他们的世界里存在着独特的文化。我知道，这是不应该被其他异质文化抛弃、吞并的文化，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是在日本四国的山村里长大，所以感觉到索因卡所表现的约尔巴族的神秘世界具有普遍性。就是说，如果深深地挖掘自己的根，就应该会发现文化的共通性。

 3

阅读R.S.托马斯的诗歌和对谈录，重新看到我通过渡边一夫的译文而铭记在心的塞南古的名言，而当我联想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冥想死亡的时候，不由得感叹不已，如同小时候在老旧的住宅后院探头窥视水井时额头感觉到从水面袭上来一股阴森冰冷的凉气的记忆……

我从索因卡的戏剧里也感觉到完全相同的东西的诱惑。因为他以沉默的声音直截了当地讲述着从父亲接受过来再传授给儿子、世代传授下去的神秘思想，托马斯也努力要把自己孤独的思想传给下一代。我将继续倾听他们的声音，这肯定是我今后的黄昏读书的方向……





1

今年秋天，在名古屋召开过德国和日本知识分子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也发了几次言。其中一次与其说是阐述自己的意见，不如说是向德国的政治家提问，询问德国政府对法国刚刚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其威力相当于轰炸广岛的7 倍——有何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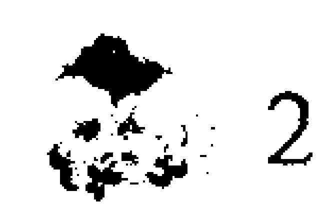
我向与我同一个小组的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根舍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强行推行

自己的核军事防卫规划，这次核试验就是显示自己军事力量的典型表现。苏联解体以后，虽然俄国还保存有大量核武器，但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俄国会对法国进行核军事打击。可是法国仍然坚持需要核威慑力，提出要把德国置于自己“核保护伞”底下的新方针。德国政府也发表了表示赞成意愿的声明。我对此表示反对，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

根舍仍然坚持需要保持核威慑力量的主张。同时，虽然不是明确表示，但我从他的回答中理解到，无疑他对法国的核军备体制与德国政府的新关系表现出支持的倾向。研讨会结束后，根舍走过来，对我说：“你我意见分歧，不过这才是学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并且态度宽容地和我握手……

我之所以向根舍提出这个问题，与当年夏天同样在名古屋召开和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讨论会上我所学到、想到的问题有关。魏茨泽克说：“欧洲不再以分散的各国，而是以欧洲共同体的统一意志推动世界的发展。”我说：“我希望欧洲的统一意志能够制止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之一法国的核政策。”

根舍的意见与我的希望背道而驰，显示出欧洲共同体支持法国核试验的政治战略意图。

 2

在名古屋召开的那次学术研讨会规模很大，德国方

面的参加者有政治家、学者等，日本方面的参加者有现大藏大臣，还有我这样的小说家。德国方面的小说家是一位富有魅力——不过，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只是具有成熟的理智的女性综合魅力——的女作家。她把自己代表作的英译本和法译本送给我。我对照阅读以后，很受感动。把两种文字的译本对照阅读，是我以别国文字阅读自己不懂的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时的习惯。比如阅读德语小说的英译本时，碰到不能清楚理解细微部分的时候，就对照法译本，往往这样就能明确理解其含义。

我经常劝年轻人，如果能够在大学里取得第二外语的学分，千万不要放弃。有的大学生说自己将来不想成为语言学家，所以只要必修的一门外语过关就行了。我尤其想对有这种想法的大学生说：正因为将来不想成为语言学家，才更有必要掌握两门以上阅读能力的外语。有的人大学毕业走进社会以后，出于工作需要，或者由于读书的乐趣——有的到一定的年龄以后觉得出于修身养性的需要而读书——会自觉地一直阅读外语书。那时，如果将外语译本与原文对照阅读，其效果无异于请一位家庭教师。

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德国女作家名叫莫妮卡·马隆。生于一九四一年，是前东德内务大臣卡尔·马隆的养女，从事文字活动后流亡联邦德国，主要作品都在联邦德国发表。仅仅从这寥寥数语的简历中，她的人生所经历的苦难不是历历在目吗？

她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我们从中可

以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她的人生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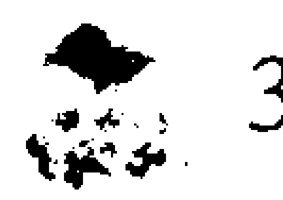
在纳粹主义被推翻的时候，我才四岁。后来，我们的父辈长期拒绝回顾过去的恐怖年代。

联邦德国建立二十多年以后，孩子长大成人，质问父母亲："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宽恕过去？"

前东德放弃了纳粹主义的"继承权"。由于新的统治者没有让国民与旧的独裁政权对抗，导致国民对新的独裁感觉迟钝。

纳粹主义对德国、对世界犯下了罪行。为了赎罪，一千七百万德国人不得不在另一个独裁政权下生活了四十年。

我的母亲是生于德国的波兰人，祖父是犹太人。为了不让自己被强制遣送去波兰，母亲在五十多年前就与德国政府进行过殊死斗争。可是后来她忘记了这件事。发现了当年的信函并回忆此事时，她只是无奈地说自己"忘记了"。

 3

《寂静街6号》(英译名为Silent Close No.6" Readers International) 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女性前去参加一位前政府高官贝伦鲍姆的葬礼，她前不久还一直为这位老人工作。在葬礼进行的过程中，她回忆起自己与高官的交往。前东德许多退休的高级官员都居住在这条街上，作品描写街上洋溢着独特的奇妙的宁静

气氛，这就足以显示这位作家的实力。因为显示小说创作实力的一个主要标志是能否营造作品世界的浓郁氛围——我想这不是气氛，应该称为方法。

贝伦鲍姆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东德对大学行政具有很大的权力。他家里的女佣至今还称他为“少校同志”。这位贝伦鲍姆想写自传，采取口述的方式，雇离婚后独居的女性罗莎·泼考斯基为他笔录。小说采取这个女性自述的手法。

罗莎虽然已经离婚，但有时还和前夫一起在酒馆里喝酒聊天。小说故事的结尾大概是这样的：当她知道酒馆里的一个老年朋友曾经被贝伦鲍姆赶出大学时，重新追究当年的责任，结果导致贝伦鲍姆之死。

罗莎的生活态度总体上显得忧郁沉闷，但也透着一种奇妙的幽默感。她对莫扎特歌剧的德语译本——尤其《好色鬼》——大为不满，好像计划自己从意大利语重译——认为宣叙调的重译尤为必要。

晚上，一个人在独居的房间里喝着葡萄酒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想像房间里六张一套的椅子上——这是邻居收到的西德朋友的礼物，她又从邻居那里便宜买来的——坐着五个黑色的幽灵。就是说，自己坐在第六张椅子上，而且与桌子上花瓶里的大波斯菊聊天。由于名词具有性别，她在称呼人称时也很注意，称大波斯菊为男性，称克斯梅亚则为女性。在她醉晕的脑子里，各种思绪蜂涌而至，忽而人变成动物再变成植物，忽而植物变成动物再变成人，如此轮回，变化无穷。

于是，她问大波斯菊：你原先是人吗？还是你将要变成

人？“干杯，亲爱的小姐。你知道什么事情，但是你不能说话，这实在遗憾。我虽然能够说话，可是什么也不知道。”

罗莎正在记录贝伦鲍姆口述内容的时候，一个名叫维克塔·泽茨曼的作家前来拜访。他想创作六十年代柏林的大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是当时他才十四岁——二十四年前发生的事件对他的创作十分重要，可是——记忆模糊。于是来向贝伦鲍姆请教当时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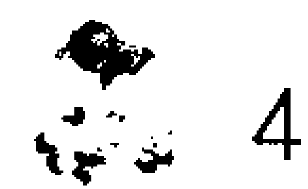
贝伦鲍姆说："在我们修建反法西斯城墙的值得纪念的一九六一年八月之前，每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总是一边俯视着菩提树下街，一边浮想起这样的形象：年轻的共和国国民的鲜血经过勃兰登堡门流进敌人的身体里……"

泽茨曼对贝伦鲍姆这一番充满骄傲的话语感到震撼，他看着罗莎。罗莎以为他是向与他想法相同的自己求救。于是，代替恪守客人之道不敢提出异议的泽茨曼对贝伦鲍姆冷嘲热讽地问道："这么说，您是以自己的鲜血修建城墙的 。为了打击他们，大家的身体都要开一个口吗？"

贝伦鲍姆从容不迫地微笑着反击："是的。我也要和你的意见进行斗争。"

但是，泽茨曼对这个年老的前权势者表现出追随屈从的态度："我也相信那个决定（即修建城墙）是必要的。"

"我把笔扔进葡萄花纹的迈森瓷器筒里，大声叫起来。"

 4

我在名古屋的学术研讨会上，因为给予我比其他同事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得以把莫妮卡·马隆小说的魅力介绍给日本听众。会后在喝咖啡的时候，马隆走到我身旁，很认真地说道："您刚才讲述的战后五十年和日本人的部分，我非常明白。但是您讲述我的小说，也许由于翻译的原因，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面有愧色，马隆对我微笑一下。我似乎重新感觉她的小说所具有的不可轻视的幽默。《纽约时报》对我刚才介绍她的小说评价为具有优秀"文体和尖锐的幽默"的特点……

莫妮卡·马隆的小说令我感动之处首先在于描写前东德战后历经苦难而生存下来的一个知识女性的人生。她具有从一定的距离正视自己人生残酷性的意志力。她对那些比自己的环境更加残酷现实的牺牲者深表同情，也为他们发出内心的呐喊。

上述所说的《朝日新闻》上登刊的莫妮卡·马隆发言的后半部分是这样的：

谁也不能禁止对牺牲者的无辜的忘却。但是，没有牺牲的人不能忘却。

因为胆小而成为共犯的人，或者仅仅是缺乏勇气的人，对罪恶视而不见的人，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流合污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忘却。

想忘记自己的羞耻和屈辱。在经受肉体无法忍受的

痛苦的时候，肉体在调整好痛苦之前神志不清。忘却也许与这种神志昏迷相同。

东西德统一以后，为了重建前东德，从西部源源不断地送来金钱和技术，东部的人们在感觉幸福的同时也感到屈辱。

难以背负罪恶深重的过去而生存，起因于难以保持自负心与自我批判意识之间微妙的平衡。要面对自己的过去，需要自负。要提高自负，需要考虑自我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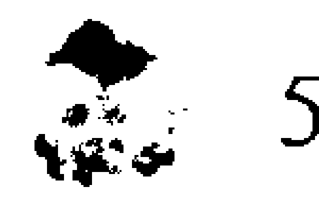
显然，这位德国女作家在关键的地方具有坚强的理性。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罗莎也会给人沉着稳重、从容不迫的印象吧。莫妮卡·马隆虽然经历过充满苦难的人生体验，却没有表现出受害者的那种可怜相，相反，显示着以独自的方式重新安排伤痕累累的人生的坚强意志。

于是，我想到我国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女作家们。她们的作品具有新鲜感和鲜明的个性风格。这大概与年轻时候的莫妮卡·马隆一样吧。我国的女作家虽然缺乏马隆那样的尖锐严峻，却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幽默感。吉本芭娜娜尤为显著。

但是，我国的年轻女作家们在充分发挥自己出色的观察力的同时，其根底是否也在关注同样有着苦涩辛酸的这个时代呢？她们是否在这个基础上，以坦率积极的态度努力摸索对明天的思考呢？

我国也有像佐多稻子这样在人生观、时代观方面经过千锤百炼的女作家，比莫妮卡·马隆毫不逊色。我希望日本的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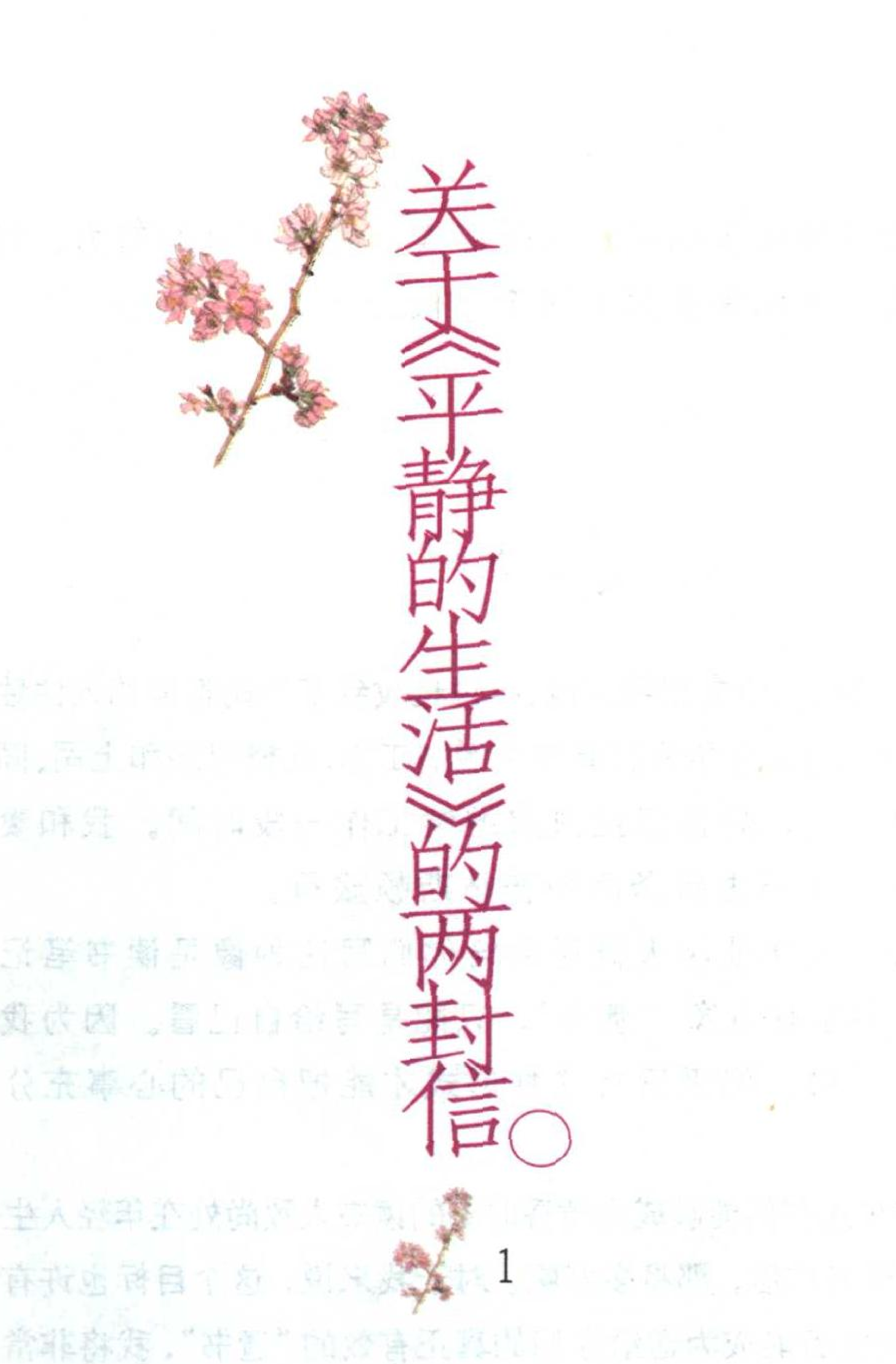
女作家都像佐多稻子、马隆那样，经过认真的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这个时代。

 5

你的硕士论文已经完成，听说也收到了公司寄来的入住独身宿舍的通知；你原先打算辞去图书工作，大概已经和上司、同事商量过吧，好像已经决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我和妻子、光不久将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旅行。

我从大洋彼岸大概还会给你们写这种像是读书笔记的信。甚至有点像“遗书”，只能是写给自己看。因为我这样的性格，似乎只有这种形式才能把自己的心事充分告诉你们。

如果这些信能够成为黄昏时刻的读书人致尚处在年轻人生时期的读者的信，那将多好啊。对于我来说，这个目标也许有点远，但倘若能成为送给你们的真正有效的“遗书”，我将非常高兴……



关于《平静的生活》的两封信

1

（小玛——作者致读者）

《平静的生活》可以说是一部长篇小说，文章结构由静静流淌的时间这个纵向轴与父母亲出国期间在家照顾残疾哥哥的留守家庭这个横向轴组成。其实我在写第一章《平静的生活》时，只想写一篇结构整饬的短篇。

可是发表以后，《平静的生活》的叙述人阿玛以女儿的视角、口气继续讲述下去，结果写成一部由六章构成的小说。

在写作这部书的一年多时间里，现在看一看我写在日历上的日程安排，发现我也和作品里的父亲一样，经常出国，不在家。

前年，因为获得欧罗巴利亚奖，在布鲁塞尔进行获奖讲演。机票由对方提供，便顺便去莫斯科，参加辛吉斯·艾特玛托夫担任主编的《外国文学》杂志——小说里也谈到此事——举办的会议。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讨论会，接着在美国、韩国拍摄《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电视记录片。年底在法兰克福书市主持日德学术研讨会，与君特·格拉斯进行公开讨论。

我开始小说家生活以后，大概每隔三年，都要集中阅读某种主题的书籍。这并非我主动选择某个诗人、某个哲学家、某个历史学家或者某些文学理论书籍阅读，略为夸张地说，是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当不得不面对困难的时候，只好钻进书堆里，拼命阅读，寻找如何战胜困难而生存下去的手段。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叶芝，所以小说的开头部分随处可见叶芝的痕迹。

作品里的小说家 K 想阅读布莱克，就去伯克利分校向著名的专家学者请教。这个情节其实与我前些日子的实际情况大体一样。那个时期，先是阅读布莱克，接着是但丁，再阅读叶芝——如果把各阶段的读书对象和我分别作为三角形的顶点，那么另一个定点往往就是布莱克。

作品中出现的塞利努是法国小说家，我从在法国文学科学习时代就一直大量阅读他的书。当时我已经开始研究萨特，并有初步成果，因为塞利努是萨特的论敌，为

慎重研究起见，我买了几本他的书。从此开始阅读塞利努，后来我认为作为小说家，他胜过萨特。而且他的身心遭受痛苦的巨创而毫不气馁沮丧——努力吧，孩子们！——的人格也深深吸引着我，于是逐渐直接反映到我的小说里。

现在重读《平静的生活》这部小说，发现许多情节就是再现我的实际生活。在看的过程中，好几次突然想起这情节的的确确就是生活中的事情。例如作品中的伊约（实际中的光）创作《肋骨》曲子的情景……

不过，这部小说比其他以光为模特儿的作品在本质上更具有虚构性。具体地说，例如在我的家庭里，我本人相当于作品中的小说家K，但在伯克利分校的生活情况、处理危机的方法等都不相同，而且在关键的地方还有我坦率的自我表白。

《平静的生活》之所以成为这样一部特殊的作品，直接原因是因为设计出叙述人阿玛这个年轻的姑娘。根据我相当长时间的小说创作经验，我认为小说的秘密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叙述。如何表现思想、塑造人物、描写事件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叙述这部小说。决定并贯彻讲述方式是创作小说之前和修改时的最辛苦劳累之处。我现在之所以想至少几年不写小说，最大的原因就是觉得迫切需要对自己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反思。我以前的小说叙述方式恐怕将自己对生存本身的理解变得肤浅轻飘吧？或许打算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前，如果不建立自己真正的小说叙述方式就死不瞑目吗？

话说得如此严重，其实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我打算继续慢慢阅读斯宾诺莎的文章——他的文章基本上与



院子里的虾背兰和羊齿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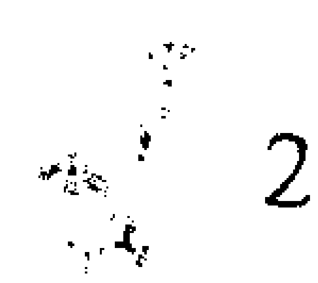


5 岁的由佳里和 8 岁的哥哥伊丹十三在祖师谷大藏

叙述方式截然相反，这位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把想像力的作用放在很低的位置上——也是出于这种重新开始的考虑。

刚才说到这部小说的现实模特儿的问题，如果伊约与现实的光极为相像，那么他的妹妹阿玛这个叙述人是否就是我现实家庭里的光的妹妹呢？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明确表示：阿玛这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我发现在创作时可以不必先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先确定小说的叙述人——准确地说，确定一种叙述方式，叙述手法——写出短篇《平静的生活》，然后再以叙述手法展开小说世界，最后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塑造出这个叙述人以后，我继续阅读叶芝，终于发现了我正在执笔的“最后一部小说”《燃烧的绿树》中两性人阿佐这个叙述人及其叙述方式。



2

（伊丹——原作者致观众）

《平静的生活》由伊丹十三先生拍成电影，我非常高兴。16岁时，我转到松山高中读书，与伊丹成为朋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的人生中很有可能与他进行事业上的合作。

但是，这并不是说电影《平静的生活》与原著小说一模一样。伊丹几次修改剧本，妻子每次都十分认真阅

读，发表意见——她对这个哥哥也是坦率直言——她把第三稿拿给我看，此后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伊丹以他的叙述方式构成电影故事。我深切知道，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叙述方式。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阅读伊丹的剧本，往往会真切感受到他的叙述方式，深受感动。我不知道电影创作是否也使用小说的“叙述手法”这个词语。但是读他的剧本以及修改的方式，我发现他逐渐运用这种电影的叙述方式、叙述手法，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小说上的“文体”。于是，我觉得能够观看影像在银幕上展开的故事，那实在令人兴奋。

剧本的开头表现直接取自小说《平静的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人”这个重要主题。要是直接引用原著，在我的小说里是以这样方式出场的。电影中的人物团藤夫人的原型、音乐老师重藤夫人对与残疾的哥哥伊约一起留守家里的阿玛说这样一番话。

要说我的感觉，我生来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居然活到现在，以后还要这样再活一些日子，然后微不足道地死去……

我的思想非常普通，无论多么细微的事情，从来不对自己搞特殊化。只要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会活得很自在，然后自己尽力而为就是了。所谓尽力而为，其实不过是重藤教给我的，在女儿寒冷疲惫的时候，把围巾送给她罢了。

我一辈子都是微不足道的人，我必须做好这个思想

准备……伊约，对不起，我又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我觉得自己在临死之际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到原点。从非常接近原点的地方走向原点。至于想到什么死后的灵魂啊、永恒的生命啊，那不就是把自己特殊化的感觉吗？例如和虫子相比……

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的主题在剧本的最后部分有所缩小，但在拍摄的过程中也许又会扩大。即使不再扩大，我想在伊丹导演的指导下，团藤夫人和阿玛的表演也会充分表现出微不足道的人的决心。

因为在尚未最后决定是否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的时候，我和伊丹商量此事，当时他对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的主题显示出与我相同的感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话总是深思熟虑——我从他的父亲伊丹万作遗世的随笔中感觉到伊丹的性格与其父相似——他说微不足道的人这个主题很好。说明这是他读过好几遍我的小说《平静的生活》后得出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他已经开始构思电影《平静的生活》。

不过，仔细想起来，伊丹对微不足道的人这种构思感兴趣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吗？我在少年时代第一次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实在与众不同。他相貌英俊，身穿母亲特地为他定做的深蓝色呢绒短大衣——按规定在高中校内不许穿这种衣服。他对刚刚翻译过来的卡夫卡的《审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阅读加里玛尔出版社出版的兰波诗集，他非常喜欢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而

且对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体育教师绝不畏惧屈服。不言而喻，他是第一个把日本电影推到理智型高度的导演。

伊丹后来也制作电影，名声远播世界——我在纽约、巴黎与知识界谈话时，提到JUZOU YTAMI，无须解释，皆知其名；我在斯德哥尔摩聆听过国王、王后对《蒲公英》的感想。而现在，他却对微不足道的人的构思如此感兴趣。

这大概是他在人生中经常通过严厉的批判磨炼自我吧。他的电影具有独自的方法论，以此在日本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风格，但在具体的导演上，与其说依靠理论，不如说是敏锐的观察力。实际上，伊丹对人、事物、风景等一切都细心观察，然后经过认真深入的思考，作出自己明确坚实的判断。现在，这位艺术家的目光集中在微不足道的人的人生观上，并且在心里形成具体的形式。我觉得，在此基础上，他对我的作品会产生共鸣。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老友能够如此理解我，使我深感喜悦的不是很多。

伊丹打算在电影《平静的生活》里使用光的音乐。伊丹的母亲家族里有人精通音乐，他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的妹妹、即我的妻子从父亲家族中继承了绘画的才华。就是说，不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司马辽太郎曾称伊丹为“异人”。现在“异人”指的是外国人，其实原意是“与众不同的人”。伊丹对“微不足道的人”的人格进行认真思考以后，将其视为人应该具备的根本道德。我想，这才是电影《平静的生活》核心所在。



我已经搏斗了。

1

电影《平静的生活》完成以后，我们应邀去观看样片，夜里很晚才回来，便和独自看家的女儿聊起来。我们全家都是这部电影里的人物的原型，女儿在电影里起着核心作用，这反而使她从策划阶段开始就绝不参与自己的意见——有时候我征求她的意见：伊丹是这么说的，你认为怎么样？——虽说要去大学的图书馆上班，但是她还是没去观看样片。光则对妹妹谈起自己的发现：“那

个叫阿玛的，就是因为脑袋瓜像球那么圆吧。”

电影里的妹妹名叫阿玛，家里的妹妹叫阿薰，所以光大概一开始就觉得奇怪。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光听了电影里的人物对话，也开始明白。回到家里，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妹妹，一边说明，一边高兴地看着真的像球一样圆的妹妹的脑袋……

女儿从小学到高中阶段，我和她的关系好像有点疙瘩，就我的感觉而言，其原因大概是这样的：我的小说往往描写家庭，我在演讲中也经常涉及家庭，演讲的记录刊载在报刊上。女儿的老师看过以后，对女儿发表自己的感想。然而，也许我的表达方式或者老师的理解以及表述方式与家里人、尤其与女儿的原话有所出入。有时老师对女儿说：“你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吧？”可是女儿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她一回到家里，就非常认真地向我提出抗议。老实说，我也不赞同老师这种起哄式的做法。

这样的事发生多次以后，我在小说、随笔中不再涉及女儿的言行。她在大学里参加助残志愿者活动，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她说自己为那些残疾儿童的言行深受感动。尽管这些感人的小故事和话语超越了小说家的想像力，可是我在文章中也绝不引用。因为当她感觉到父亲对自己谈的事情感兴趣时，就不由自主地戛然停住，沉默不语。

“这是朋友的隐私！”

我打算在小说里把女儿与她的兄弟光的关系作为原型，就此和她交换过看法，并根据她的实际感想，在小说《平静的生

活》中从叙述人阿玛的角度写下这样一段话：

父亲作为一个作家，一天到晚在书房或者起居室的沙发上阅读布莱克的书籍。几年以后，他将从预言诗中获得的形象与哥哥成长时期发生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写出系列短篇小说。把我和阿太都作为人物塑造的素材。于是我对弟弟说："即使是出于好心，可是只根据自己单方面的感觉，就把我们写进去，实在不情愿。现在我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情况，倒没什么。可是以后我认识的新朋友，人家对我都会有偏见的。想起来就叫人心烦。"没想到阿太冷静地回答说：

"到时候你就说那是小说，不就行了吗？"

如果有人询问孩子们对我的小说里的模特儿有何想法，我作为作者和父亲，希望她们能作出上述回答。

2

光喜欢看小说中自己似乎被布莱克唤醒出场的情节。也许有人怀疑光这个残疾人是否具有阅读成年人小说的能力？说得详细一些，他把小说中出现的自己的话语称为"我的台词"，十分喜欢阅读这些部分。在《新人哟，醒来吧》之前，我在小说中把以光为模特儿的人物

——例如伊约——的话语全部用黑体字印刷，这样光比较容易从书中找到自己说话的那些地方。

他喜欢文字，如同喜欢音乐一样，而且看得十分认真仔细。虽然看得几乎都是刊登有FM节目表的杂志和CD盒上的说明，却看得一丝不苟。一旦发现错别字，立刻告诉母亲。尤其是外国演奏家的名字，要是发现错得可笑，会显得兴致勃勃的样子告诉母亲。有一次，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妻子想听CD，发现其中夹有光写的卡片。这是一张刻有电影《平静的生活》曲子的原版CD，但其中柴可夫斯基的曲名印刷有误，把《悲怆》误印为《非怆》。光在卡片上写道："这是第六交响曲。本来想写《悲怆》，但是没有写'心'。"

其实，我和妻子曾异想天开地议论过，要是哪一家CD或者FM杂志编辑部能够雇光当校对，那该多好。

光通过阅读文字可以理解小说的这个部分是描写自己的，那么他如何理解电影演员表演以自己为模特儿的人物时的演技呢？从伊丹决定把《平静的生活》搬上银幕开始，我就开始对此极感兴趣。

3

电影开拍几周以后，伊丹邀请我们去摄影棚观看拍摄现场。妻子、光和我兴趣盎然地应邀前往。在一间又

高又大的仓库里，已经布置好模仿我们家的场景。在透过起居室看见餐厅的位置上架设着摄影机，场景外侧架起一座台子，上面放着椅子。伊丹坐在导演的椅子上，一边看录像机画面，一边不断地对演员发出简单的指示。我们并排坐在导演斜后面观看拍摄现场。

伊丹虽是我的多年老友，但这是我第一次看他当导演拍摄电影的实况，觉得新鲜有趣。在一个场景里，演员的动作和台词的声调，以及摄影机的位置和照明都在不停地修正。我明显感觉到每次修正都获得表现的准确性和鲜明性。

以我长期从事的文字工作比喻的话，犹如对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加以修改补充的过程。写文章的时候，如果对表现暧昧、未能成形的地方感觉不满，就要重写。于是文章意思逐渐明确的同时，形象也随之鲜明起来。而当一个情节确定下来的时候，这时才感觉到自己真正确切地把握了这个情节的意义，而原先实在是不甚了了……

伊丹在拍摄结束以后的剪辑过程中，大概也要付出创作者的巨大精神劳动。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这可能与初稿完成以后对情节结构的修改差不多。作家经常要对小说中的细小情节重写，这一点大概是与难以重拍的电影的不同之处。但是，伊丹现在正拍摄着鲜明而确切的镜头。正如我现在还一直继续阅读的研究十七世纪哲学的英语书籍中经常出现的clear and distinct 这个词语本身所显示的那样：与众不同地明了确切……

我从自己小说创作的角度理解伊丹导演在创作过程中的精神——因为它是包括心灵、感性、理性，甚至运

动神经的一个总体——劳动，深受感动。大约有一个小时吧，坐在我身边一直探着身子观看的光勇敢地伸手摸了一下伊丹的胳膊。伊丹回过头，目光温柔地看着他。光指着正趴在起居室的地毯上作曲的扮演伊约的年轻演员，又划圈指着整个场景，说：

“这就是我啊！”

光能够理解这些场景的含义，首先大概是因为扮演伊约的演员渡部笃郎的出色表演吧。渡部肯定自己去过护理学校之类的地方，细心观察弱智儿童以及弱智年轻人的实际状态，所以他——也是伊丹导演——塑造的伊约形象实际上是要比光更加活泼的残疾人类型。但是这个形象依然显示明显的光的痕迹，这是这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演员的一个闪亮的个性，他的目光充满天真纯洁的巨大力量。光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观看、倾听渡部与其他男女演员在共同营造的家庭氛围中进行三四十分钟的一个场面的演出。

我虽然也在观看拍摄，倾听台词，但由于自己也和伊丹一样，从小形成的性格，总是有点心不在焉，脑子翻腾着各种事情。我们的左边是院子，树木繁茂。从房间内拍摄另外镜头时，可以看见正面的餐厅外阳光照耀着的树木，再往前就是穹窿布景，摄影师和伊丹导演细致调整拍摄角度。同样，为了保证起居室窗外的院子的真实性，也许要树木。这些树木有的是现栽的，有的是盆栽。有的相当大的树木，上部枝叶都被砍掉，只剩下主干。从树皮上看，我觉得是鸡爪槭。这棵树曾经绿叶葳蕤，曾经红叶映秋，也应该算是鸡爪槭中的巨树，在这个电影

制片厂拍摄历史片时，大概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我还想到这样的事——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这些日子阅读的书籍，突然想到我已经在几篇文章里论及的诗人R.S.托马斯在他的谈话中使用的articulate这个词“分节化”的词源在拉丁语里是artus，就是“关节”、“明确区分”的意思。结构主义被引进我国，盛行一时的时候，学者们经常使用“脱臼”这个词，强调主动切断逻辑联系或者颠倒的作用。如果用be put out of joint口语化地表现“脱臼”，与拉丁语·英语辞典里的artus的joint语义立刻联系在一起。伊丹导演现在的工作就是首先让演员们的想法“脱臼”，然后为了重新组成一个镜头而“分节化”，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一个明确的“整体”……

光坐在脑子正浮想联翩的父亲身边，发现把眼前的表演拍摄进胶片的过程——其实大概他想说的是整个过程，但意识到自己缺乏足够的表现语言，便用手划圈指着四周——说出自己的理解：

“这就是我啊！”

后来伊丹说，光的这句话是他导演这部电影期间最令人高兴的体验，同时还指出——我在前面已经写过——光的音乐都具有讲述一个故事的特性。这与我通过伊丹的电影所了解的光的音乐特性直接相通。

除了电影中阿玛的原型、我的女儿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以及电影中阿太的原型、我的次子由于忙着硕士毕业论文的实验很晚回家没去之外，我们一家人都看了

《平静的生活》的样片放映。电影的故事情节顺利发展——伊约练习游泳，终于能够游二十五米。由于渡部精湛的表演，这个镜头十分感人——但担任游泳教练的青年的复杂性格与阿玛的“伦理”性格——上面已略有涉及，并非单纯的“道德性”的性格——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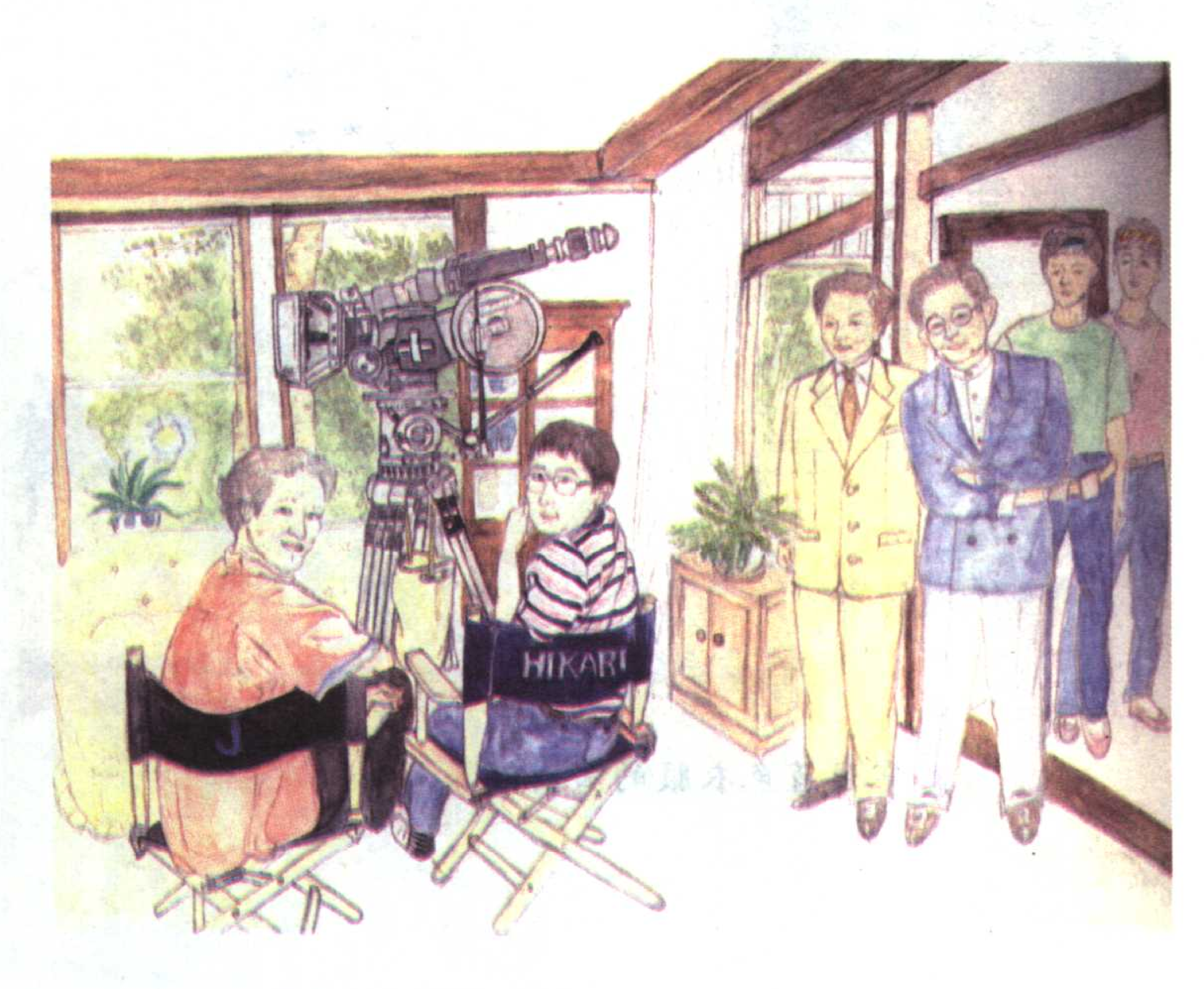
看到游泳教练对阿玛的性暴力侵犯——我的感觉，未必真想如此——伊约紧紧抱住教练。在阿玛恢复平静状态以后的协助下，伊约制服了教练。接着，伊约和阿玛逃出公寓，两人在大雨滂沱中跪在院子里，相拥对泣。光的曲子《毕业》的旋律使这个场面更具有强烈的感情效果。他在观看这个镜头时似乎特别专注认真。

这个场面出现的事情过去几天以后，伊约和往常一样悠闲地作曲，阿玛舒服自在地呆在一旁，电影在这种真正“平静的生活”景象中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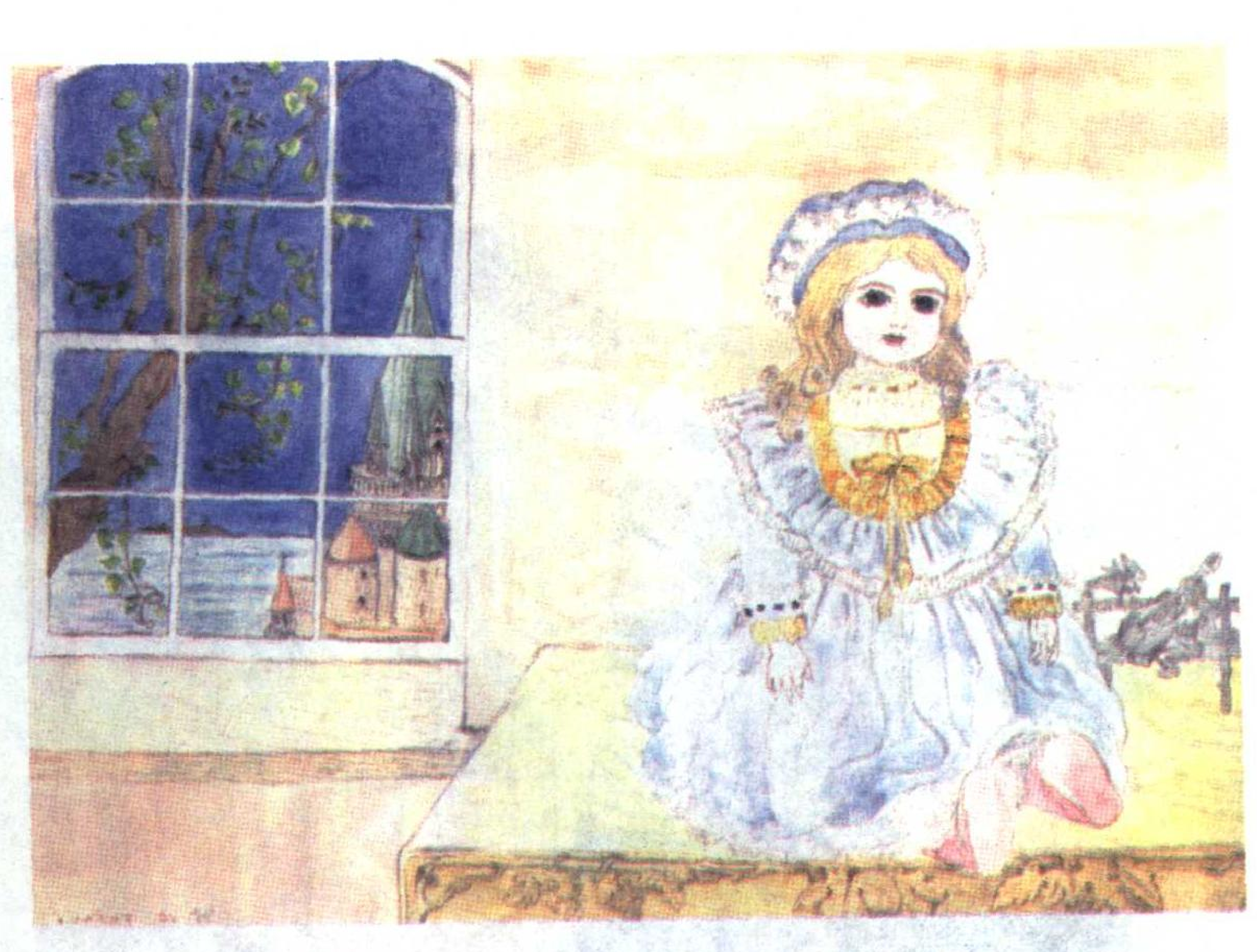
看过电影，我和妻子好几天都在议论感想，但光一直显得事不关己的样子。有一天，他来到我身旁，显然带着某种意图。身体状态正常的话，只有星期六或星期日他才从早晨就待在家里。

光对着贴在起居室房门上的《平静的生活》的电影海报仔细瞧了一阵——我与平时一样，坐在扶手椅上工作——这是光想向我讲述对这部电影的感想的准备动作。产生电影高潮的事件，光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已经搏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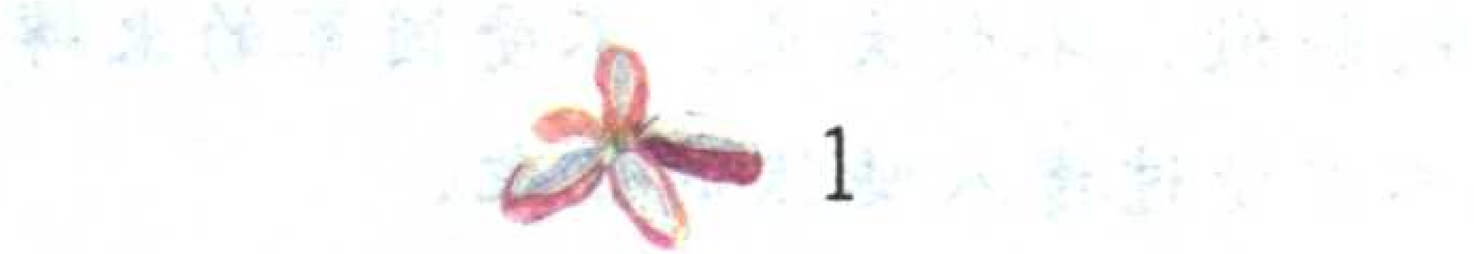
伊丹十三和光在拍摄电影《宁静的生活》



穿浅蓝色衣服的法国偶人



Upstanding



1

根据我现在读书时使用的英日辞典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直立的、挺立的、伫立的、高洁的、正直的。

我喜欢这个英语形容词。W．B．叶芝在《塔堡》的第3节使用这个词语，我十分喜欢，从年轻时开始翻译过好几遍——尽管没有机会发表。这首诗表现诗人老年时的思想，却不知何故，吸引着我二十多岁时年轻的心灵。只要阅读叶芝诗歌，谁都看过A．N．杰法兹的注解——

此前，神户的一位英国文学研究家对我的《燃烧的绿树》的题目提出异议，并且把这本书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作为“资料”寄给我。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不过，除了我的朋友、优秀的学者予以和气的应对外，行家对我这样外行的读者如此板着面孔的指责，大凡还是客气的——叶芝生于1865年，他写在这首诗最后一节草稿上日期是1925年。就是说，诗人写作这首诗的年龄与我现在的年龄一样，这更使我感慨良深。

我写遗书的时候，
选择正直的人们。
溯流而上，
来到喷涌的水源。拂晓
在滴水的岩石旁，抛下钓丝。
我大声说道：他们继承我的骄傲。
人的骄傲，不受大义、不受国家的束缚
也不曾受过遭人唾沫的奴隶，
以及把唾沫吐在别人身上的暴君的束缚。

迄今为止，我也译过相当多的外国诗，却没有考虑出版一部公开发行的译诗集——妻子说我在二十年代初期曾送给她一本非卖品的译诗集，也许她还保存着——因为总有一行诗句或者一个词语的译法未能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包括上面这一节在内，我大概还要修改《塔堡》的译诗。这也是自学者的一种乐趣。

2

我起先把Upstanding译为“正直的”，清楚地记得写在文章里。我是在将近凌晨时分写的这篇文章，这是为第二天举行的一柳慧的夫人的葬礼准备的悼词。下面先抄录这篇文章。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我听说一柳纯子女士得了难治之症，曾送给她一本很大的岁时记，里面有很多彩色的植物照片。我想，即使她不能侧身躺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看，花三十分钟就可以翻阅一遍。

您非常勇敢顽强地与病魔进行斗争，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即使在患病的时候。我经常收到您的来信，还收到您亲手制作的美丽的小册子。

我从中了解到，您怀念上小学的时候闻到的野上弥生子女士出生的臼杵町酱油酿造家煮大豆的味道，您没有忘记少女的战时体验，在夜间从避难的山麓眺望遭受空袭火光冲天的城市。

您还给我的残疾儿子写信。我和妻子从报上看到您去世的消息时，沉浸在惊愕和悲哀之中，我的儿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我和妻子说话，他几乎无法以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在当天写了一首《Mrs. I 安魂曲》。其中有一处写着“诗”字。这个部分是在钢琴的乐曲声中，朗诵您的来信中儿子认为是“诗”的一段文字。

我在法兰克福聆听过一柳慧先生的作品《道路》。这部作品是日本传统音乐与欧洲现代音乐相结合的现代音乐最优秀的成果。它所表现的德国人饱受战火的苦难创伤是镌刻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

纯粹的音乐技法与生存于现代世界的体验含义形成作品构思的基础。作曲家不断追求作品创作的生活肯定非常紧张。然而，一柳慧先生能够长期如此，无疑最重要的是得到您的鼓励和支持。

因为您在来信中对我的作品、还有我的儿子的作品一直予以积极的支持，所以我完全可以想像您对一柳慧先生的支持。从您的来信中，我始终感觉到您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正直的伦理性。这与今天社会的发展、世界的未来结合在一起。我们从一柳慧先生的音乐里感受到这种您的心灵的反应，或者与您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回音。

您的一生如此美丽。安息吧！

 3

阅读自己的文章——尤其时隔一段时间后的阅读——可以获得最恰当地进行自我批评的切入口。拍摄电视记录片时的表现，或者电视对谈的记录，都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看到，虽然并非毫无思想准备，但还是经常对自己有新的发现。

其中之一是自己的身体姿势很不好——就是说，自己的身体不是upstanding。我从小就不喜欢理发，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借口，能不去就不去，而且也不喜欢穿新衣服，家里偶尔给自己买一件西服或者衬衫，也不马上穿在身上，因此受到母亲的斥责。就是说，我对修饰打扮毫无兴趣，也许是害怕。现在我也没有自己去商店挑选衣服，一切都是妻子包办。穿着这样的衣服接受采访拍照，一看寄来的照片，觉得从胸部到腹部这一块样子难看。我穿的衬衫、外衣都不是定做的，自然是现成的产品，于是怀疑做工是否有问题。不过，自己去成衣铺量体裁衣定做，太费时间，相比之下，买现成的衣服，虽然不太合身，还是能凑合过去，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的。我在穿衣问题上，就是以这个“理论”对付了几十年。

但是，两三年前的一天深夜，我突然发现自己在电视里的形象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早晨起来，见光穿着睡衣正在听ＦＭ。因为我的体型与他相似，便让他穿上我的衬衫和外衣，坐在椅子上。我仔细端详一阵，觉得他的胸部到腹部这部分很平坦流畅。

女儿坐在餐桌旁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我对她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照片或者电视里的形象——演讲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更是一目了然——从胸部到腹部的衣服总是显得很窝囊。我原先认为这是你母亲挑选衣服有问题，但是自己又不好对她直说，所以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才明白其实并不是我的体型有问题，而是我的姿势不对！”女儿听我这么一说，赶紧告诉母亲，她们忍着

笑的表情里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就是说，我深刻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姿势并非upstanding。

而且，还从电视里发现我在精神方面进行自我批判的地方。《父子共鸣》中有这样的镜头：我的手举在胸前，对没有出现在画面里的M制片人说："光出生的时候，我虽然意识到自己惊惶失措地想逃避这个具有残疾迹象的孩子，但讨厌自己缺乏坦率正直的感觉。"因为摄制组已经在我家里拍摄了好几个月，我与他们相处十分融洽，于是把自己——记得没有写在文章里——的真实思想告诉他们：当时自己的心态、人生态度并非upstanding。

还有一次，不久前我在电视栏目《彻子的房间》里与黑柳彻子女士对谈，面对这位幽默风趣、认真机智、游刃有余的主持人，我谈到自己年轻时阴暗不安的性格，认为虽然年轻时脑子里充斥着绝望感，但实际上经过与光出生以后的困难——即产生绝望感的根源——进行一番手忙脚乱的奋斗，逐渐变得坚强起来。我一边说，脑子里习惯性地一边闪现几个相对应的词汇，其中之一、核心的一个词汇就是upstanding这个英语形容词。

 4

同样是英语形容词的decent，我也经常使用。而且我觉得

在这两个词汇之间已经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

decent这个词，大概既指心灵的高尚，也指给予别人优秀品格的印象，还有对别人显示的宽容态度，以及与别人在一起时恰到好处的融洽感。

这样的人首先应该给人upstanding的感觉，从表面看也是属于那种正直、稳重的类型的人，自我感觉也应该如此。他在社会里的人生态度高尚纯洁，他对亲人邻居正直方正。因为它无须虚伪卑微。能够与decent而upstanding的人成为朋友——回顾我的人生，十分幸运地能结交这样的几位朋友——这是何等宝贵的财富呀！

就我的家庭成员而言，在我看来，我的妻子是upstanding的人。她从小就独立支撑着这样的家庭：在战后艰难时期里顽强奋斗的、已经去世的值得骄傲的艺术家父亲，天真甚至有点古怪的性格的母亲，还有同样怪僻而才华横溢的哥哥。

另外两个孩子——正如我在《平静的生活》里所写的那样——他们只希望像“微不足道的人”那样普普通通地生活，但通过与哥哥的共同生活学到许多东西。光的妹妹从小就表现出照顾残疾哥哥的决心，后来又极其厌恶因媒体而颇为有名的父亲被学校的老师、同学议论，大概由于这些痛苦的体验而产生的智慧，养成她独立的性格。我认为这大概也属于upstanding范畴吧。光的弟弟早就摆脱其父亲的影响，进入理科领域，与我在学问上毫无关系。他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虽然与残疾的哥哥的关系不像姐姐那么密切，却一直十分关心，而且包括生活上的关照，毫无怨言。

然而，最让我不可思议，却又从心底觉得自然而然的是：光从明显显露出智力障碍的幼年时期到现在成为职业培训福利院一员的青年时期，他总是upstanding的人。



5

最后，我再翻译与W.B.叶芝生活的爱尔兰隔着海峡相望的，而且同样表现凯尔特人初期文化的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的一首诗《观海》。

灰色的海水，如同
人门进去祈祷的
广阔领域。每天
数年　我的眼睛
在上面歇息
我是在等待什么吗？
没有任何东西
除了无休止的波涛
那毫无意义的翻腾。
啊，然而，稀罕的鸟
真正稀罕的鸟。飞来
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有时是没人的时候。
你必须凝视着，直至眼睛磨破

让别人磨破膝盖。
我成为岩石的隐士，
与风与雾同住。每天
空虚过于美丽
被空虚掩埋的不存在
如同现存。没有被人说过
我的心绝对单独
在永恒的绝世之后
注视来自我祈祷的大海

虽然R.S.托马斯不可能不信上帝，但想到他在海边的岩石上一直等待着不在此处的上帝，从年龄来说，也许他的姿势未必十分潇洒，但是从精神上说，从人的整体上说，他的确是一位 upstanding 的老者。



愉悦的进餐



1

我喜欢阅读记录艺术家、作家日常生活的日记或者回忆录以及根据这些资料撰写的评传，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我打算花几年时间集中阅读某个专门主题的书籍，可是到出售这些新书的外文书店去的时候，只要一发现并非这个主题的别的书，我也忍不住要买。摆在起居室的书架上，打算在工作安排或业余学习中腾出一周左右的空闲时间再仔细阅读——大概在一年里可以做到。

现在，英国作家马尔卡姆·劳利的大部头评传以及同样厚厚的书信集，连同它们豪华美丽的装帧，正从书架上不停地诱惑着我。我年轻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在我的几部小说——例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里也有所反映。

这些书籍的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就是他们的交友关系。可是就我而言，虽然也曾经在旅次和正在养病的爱德华·赛义德聊天消遣，但是在这十几年里，哪怕只是三个小时，我不是从来都不曾没事与尊敬的好友一起纯粹为了叙谈闲聊而相约聚餐吗？正因为如此，偶尔与朋友见面，就觉得格外高兴。写小说这一行，好在有座谈会或者文学奖评选会，可以继续思考，不时地也能和朋友谈论最近出版的新书。但是，因为谈话过于集中精力，结果坐到宴会席上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还有参加二次喝酒会的事我还从来没有过。当然，二三十岁的时候，跟随文坛前辈去酒馆，议论风生，争长论短，也曾经借酒闹过几次，有了这些教训，后来自我控制不在宴席上继续谈论座谈会或者评选会的事……

另外我还想说，我也和别人一样，喜欢阅读那些介绍稀奇食物、美味佳肴的书籍，但自己从来没有仅仅为了品尝美食名菜而特地去那些著名的西餐馆、日餐馆甚至去外地旅行。只有一次，有一年年底，与一位以精通美食和葡萄酒而著称的前辈作家以及出版社的头头一起去京都吃饭。那天晚上，住宿饭店，我在房间里切实感受到在浪费自己宝贵的光阴——我这个人的性格，想问

题就是这样小题大作——带来的书看完以后，就阅读摆放在房间里的《圣经》英日对照版，一直到天亮。后来我再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旅行邀请，大概对于同行者来说，我实在是一个无聊的旅伴吧。

还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作家，好像过去他还参加过全国烹调比赛，邀请我去一位烹调研究家的家里参加特别家宴。但是因为我对他有过一次伤心的记忆，所以没有应邀前往。这位烹调研究家也是著名的珍稀古籍收藏家，我和他在购买古书这件事上——用航空术语表达的话——差一点相撞。

那还是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研究员的时候，当时我热衷于维利阿姆·布莱克，因为该校有几位研究布莱克的专家，我才选择去那里。我又去其他大学讲演，两三笔酬金一积攒下来，就跑旧书店，不仅去伯克利的旧书店，还去旧金山山坡上那家著名的旧书店。过不多久，书店老板允许我进入最里面的房间挑书。

有一天，我发现布莱克预言诗集《杰尔撒冷》彩色复刻版，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版本，于是心急火燎地乘坐“BART”地铁回到伯克利，从银行取出用做生活费的全部储蓄，带着几分豁出去的悲壮心情，急匆匆赶回书店。我离开书店回去取钱时曾告诉老板当天就回来，可是回来一看，书已经没了。那个上年纪的老板说：我告诉那位××先生说，你好像在日本颇有名气，而且相中这本书，一定要买。他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就连同莎士比亚的对开本一起买走了，因为他出的价钱比你高得多！

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心里留下一道伤痕。多年以后，因为我也参加策划钢琴家江户京子主办的音乐讲解系列演奏会，作为答谢，送给我一本她的住在伦敦的外甥购到的特里安版的《杰尔撒冷》，我的伤痕才得以愈合。现在写的是以前的事……

我把这件事告诉这位美食家的作家，说自己心里有过去这段伤心事，再好吃的东西也难以下咽。可是他满不在乎地说，要是想看书的话，吃过饭向他提出来想拜阅一下，不就行了？这样的书有好几本！但是，我还是断然谢绝，使他大为扫兴。这不仅因为我长年的宿怨，而且脑子里突然掠过一个有失体统的场面：我不小心把调料汁洒在摊开在膝盖的书本上。其实，如果我接受邀请，饭后在书房里品尝名贵的白兰地或者别的什么的，大概也会让我观赏摆放在精致的书桌上这些书籍的。想到这里，心里又觉得另有一种遗憾……



2

所以，我既没有应邀参加过佳肴盛宴，也没有自己特地去什么著名的餐馆大快朵颐。去国外旅行更是如此，不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从来与那些新版的旅游便览上带★标记的高级餐馆无缘。差不多十年之前，我去外国主要还是在大学讲演或者参加文学节的学术研讨会，

虽然有一定的酬谢，但这些地方一般都有好书店，结果往往解囊于此。妻子大概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没有劝我办一张国际通用的银行卡，于是那些受到实惠的节约型旅行者和学生欢迎的餐馆也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最近这五年，我倒是多次和妻子带着光出国旅行，但也是选择适合自己习惯的餐馆，气氛优雅，心情舒适，而且物美价廉，妻子对我选择场馆的能力也另眼相看。

其实，我应邀去那些豪华的西餐馆或者高级日餐馆时，总觉得不自在，尤其文学奖评选会都选择在高级日餐馆举行，说实在的，没有一家我喜欢，早晨在床上就琢磨着有什么法子不去。从事文学的人——我们这些从事纯文学的人——与企业家、政治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不同，所以我对出版社、报社把文学奖评选会安排在第一流的日餐馆举行觉得不可理解。而且，我在家里喝酒自己倒，所以觉得没有必要让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性给自己倒酒，而自己还要给她们回敬倒酒时，就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冒出那句话：

你这是要干什么！

不过，我的确也曾参加过盛宴，心情也十分愉快，菜肴，应该说是真正的珍馐，令人赏心悦目，而且这种给我留下幸福印象的宴会接连举行数日。我觉得恐怕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想记录于此。这就是去年（1994 年）十二月我在严冬罕见无雪的斯德哥尔摩经历的事情。

无论是颁奖仪式结束以后的盛大晚宴，还是第二天皇室主办的规模略小一点的晚宴，菜肴自然都是时馐，



木通



三宝柑



从南欧寄来的兔子小摆设



奶油蛋糕

朴实无华。对于我和妻子来说，味道合口，量也恰到好处。第一天的晚宴上，国王的妹妹坐在我身旁。大概因为她曾在美国的大学学习过的缘故，一口开放性的英语，那语调似乎很符合她的性格。获奖者必须在皇宫的大宴会厅上——时而吹奏喇叭，时而合唱队通过，能够举行各种活动的大宴会厅——简短致辞。她教给我在这种场合保证致辞获得满意效果的方法——首先，大声说一句，接着沉默，然后再大声叫喊！

我告诉她：我在墨西哥大宴会厅按照这种方法演说过，但是，在我大声说一句我来自日本，然后停下来——皇妹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要等待会场完全安静下来，听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于是我的演讲就算结束，下一个人上台致辞。皇妹听后，拊掌大笑，我却回想起在墨西哥大厅致辞的尴尬场面，心情黯淡，脸色忧郁，结果被记者拍摄下来，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在皇室举行的晚宴上，我的左边是国王叔叔的夫人。她原本是英国人，一副典型的英国上流妇女矜持冷傲的派头，以格外辛辣的幽默语调说道：

“这一阵子瑞典的经济不景气，皇室不富裕哟。我想，今天晚宴的驼鹿这道菜是国王自己掏腰包的吧，至少是这一桌的钱。但愿子弹铅沙子别硌了牙齿！”

坐在我右边的是王妃，她如此风仪娟雅，秀外慧中，似乎令我觉得生来从未见过。听说她在圣保罗长大，是一位葡萄牙语专家，是在世界体育运动会上担任翻译时与国王认识的。我对她说：

“……我的祖父制定了一项规划，打算把老家的森林山村的全部村民移居南美，所以让他们学习葡萄牙语，不过是巴西调的葡萄牙语。后来因为战争，这项计划没能实现。我小时候到正房外面的当年的教室去玩，教室已经破旧荒废，桌子上还残留着用刀子刻的日语注音的葡萄牙语，是当年考试作弊用的。我和妹妹大声朗读这些葡萄牙语，都说自己过去曾经移民过巴西。”

王妃问：“是什么样的葡萄牙语？”

我把记忆中的巴西调葡萄牙语说出来，王妃一一译成英语。

“本·迪亚！（您好！）克默·耶斯塔？（您好吗？）奥布里嘎特·木因特·本·伊·奥·赛诺尔？（谢谢。我很好。您呢？）奥·赛诺尔·耶斯塔·德恩特？（您哪儿不舒服？）奥·赛诺尔·肯普列恩特？（您明白吗？）那恩·赛诺尔·那恩·肯普列恩特！（不，我不明白！）”

接着，王妃笑着说：“您的葡萄牙语的确是巴西调，不过说得很正确。您和妹妹为什么没有移民圣保罗？”她的表情显出不无遗憾的样子。

这时，那位国王叔叔的夫人插嘴说：“留在日本，用日语写作，拿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早就有这个意图吧？因为用葡萄牙语写作，竞争对手很多！”

接着，话题转到我的小说，她们说报纸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是难懂。国王叔叔的夫人问道：“听说王妃看过，您看得懂吗？”

王妃用极其漂亮的葡萄牙语回答说：“那恩·赛诺尔·那恩·肯普列恩特！（我看不懂！）”

包括这种晚宴在内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去——我已多次写过，从小就十分珍爱的《尼尔斯骑

鹅历险记》的作者拉格洛芙的出生地摩尔巴卡旅行的时候，受到热情款待，饭菜十分可口，甘美沁心。尤其是鱼，令人赞叹。我想，我的女儿不久也要结婚生子，如果他们一家人到这里来，就她和她即将结识的年轻丈夫的经济水平而言，大概会毫不畏怯地走进这里的餐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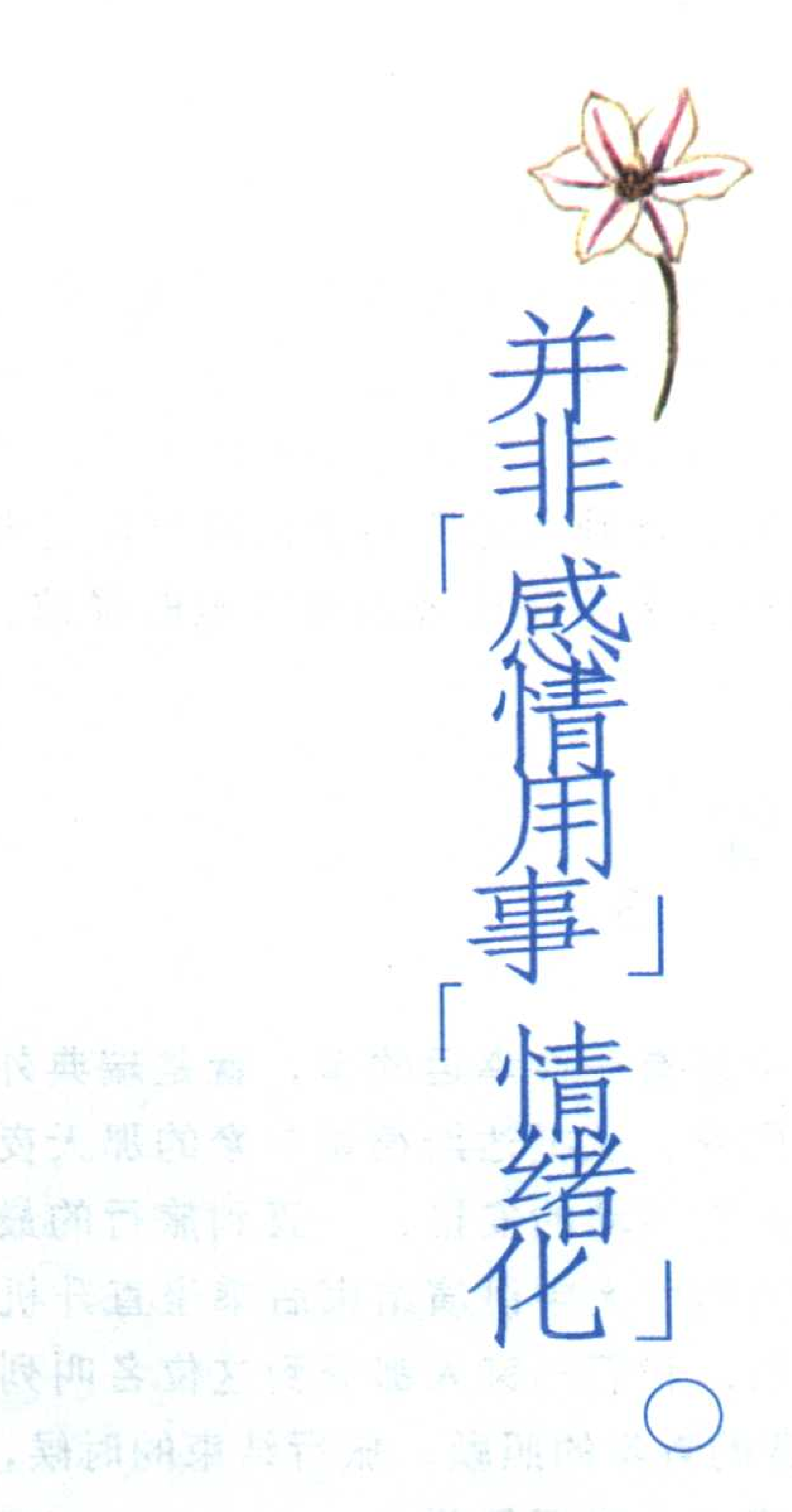
3

我在瑞典的旅行中还有一件幸运的事，就是瑞典外交部派来的随从十分优秀。从抵达斯德哥尔摩的那天夜晚开始，颁奖仪式的所有活动的安排，一直到旅行的最后一项活动到西海岸的两所大学讲演结束后乘坐直升机飞往哥本哈根分手道别，我们一家人都受到这位名叫列纽斯的性格刚毅而理智的青年的照顾。旅行结束的时候，他问我对瑞典有什么感想。我回答说：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瑞典菜。在餐馆里吃套餐，量不多不少，吃完饭后，甚至觉得精力充沛，这在最近一直没有过。在你们的国家，不论宴会还是在餐馆吃的便餐，饭菜都很可口，好像专门为我们准备似的。再看看周围的客人，似乎也都这样。宴会也好，在外面就餐也好，好久没有这么悠闲自在的了。”

我在斯德哥尔摩演说时也陪同身边的这位瑞典外交官露出优雅的微笑，说：“这可以说是愉悦的进餐吗？”

我知道decent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是高雅的、文雅的，与当时的场合、当时的气氛十分融洽。所以“愉悦的用餐”，最基本的首先应该是家庭团聚的宁静充实气氛的进餐。



并非「感情用事」「情绪化」〇



1

今年（1995 年）夏天，因为是战后五十年的缘故，许多外国记者来我国采访，因此不少记者也要求采访我。但是我的寝室兼书房的二楼房间里，书籍堆积如山，实在不便接待客人。

与做学问的朋友相比，我的书不算很多，写小说需要的资料，一旦小说脱稿，这些资料就处理掉，所以那些翻译我的作品的译者向我查询时，弄得我很为难。另外，根据我每两三年

改变读书主题的习惯，必须井井有条地整理书籍，但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做到例如我在旅行时，家里人能把某本书的某几页复印后给我寄去。

为了读书方便，经过建筑师宽容的许可，甚至把起居室的墙壁拆掉做成书架。

岳母住院之前住在客厅，现在客厅空着，本来应该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但是据住在附近的大冈升平说："你是以家庭为核心，所以故意把客厅建在冰冷的角落里，这样不让客人呆的时间太长吧！"——这样看来，岳母住在客厅的时候，也不是很舒适。现在那里还堆放着许多她喜欢的东西，显示她的特殊情趣，剩下的空间也只够放一台传真机。

于是，只好利用起居室兼餐厅这个我们家最大的空间接待来采访的记者。但每次为了准备采访，妻子都要打扫卫生。看着她总是辛苦劳累的样子，弄得我也坐立不安。而且光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作曲，来了客人也不理不睬，结果惹得不了解情况的记者满心不高兴，也不下一两个。但是，我们家的首要原则是保证光的自由，所以即使因此使对方心情不快，我也不以为憾。

那年夏天本来就很忙，加上由于法国恢复核试验，我决定取消参加在法国南部举行的耶克桑·普罗旺斯艺术节"书展"的决定——尽管妻子和光从未去过法国南方——这件事使我忙上加忙。至于我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我的观点以及别人对我的批评，我已在几篇文章中详细叙述过，这里只述其要点（详见岩波新书《发自日

本的“我”的信函》)。

首先我想说，能够得到书展主办者阿尼·特里耶女士和耶克桑·普罗旺斯市有关部门所给予的可以说是显示出衷心友谊的理解，连同某种罪恶感——由于我决定不参加，使这次活动流产——一起铭刻心中。

由于这个决定，我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指责我最多的是“感情用事”、“情绪化”。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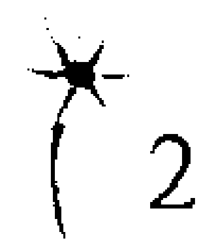
我在近四十年的作家生涯里——啊，我居然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不知有多少次与要求我在工作或者什么运动中予以合作的人发生冲突。

例如，在我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的那位广岛原子弹轰炸患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博士退休的时候，岩波书店的《世界》——我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广岛札记》——编辑部、当地的《中国新闻》报社，还有NHK广岛分局都要求对我和重藤先生进行长篇采访。

我选择一家先前没有报道过重藤先生的全国性电视台接受采访，其他两家予以谢绝。于是开始积极认真的准备，但是就在采访日期临近的时候，突然接到说是来东京磋商采访具体事宜的广岛广播分局负责人的电话，他说总局指示他们在当地找人采访，所以只好取消对您的采访计划。我表示同意，但大概也发了一通牢骚，表示不满。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对那些大电视台、大报社怎么抗议都无济于事的道理，于是现在几乎不再抗议。三四天以后，我受到那个负责人——大概现在已经登上NHK要职了吧——的来信。这封信的内容我是不会忘记

的：因为您已经表现得歇斯底里，所以本想前去解释，无奈没有时间……

后来，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与 NHK 没有来往，直至通过新的工作关系结识了 NHK 的新朋友。我在这种工作或者活动中被要求合作时，如果无法理解对方的态度，从来不以虚伪无聊的语言缓冲情绪，从而暂时圆满地维持双方的关系。



2

我在处理人际关系——都与工作相关——时，从不采取并非发自内心的柔和的感情缓冲方式。这原本就是我的生活习惯。所以在这么多年里，大概有不少人对我的态度感到不快。我也只好——如果借用渡边一夫先生经常使用的话来表达的话——没有法子。

就是说，我一直想从实际生活的角度——与“情绪性”完全不同的层次——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反而在人生中引起许多没完没了的感情纠葛。于是，我在晚年想通过阅读斯宾诺莎来充实自己，大概就是为了在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与世界的关系时希望通往尽量减少感情要素的人生方向。

然而，我通过今年夏天决定不参加耶克桑·普罗旺斯书展这件事，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感情用事”、“情绪性”的含义。

3

对于我不参加耶克桑·普罗旺斯书展的决定，法国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反应是著名作家克劳德·西蒙指责我“不懂礼貌”的批评。我认为他的批评可以说是“感情用事”的反驳。对于西蒙的这篇文章，书展主办者特里耶女士公开提出了反批评。她说自己收到的我表示不参加书展的信函绝非不懂礼貌，西蒙先生没有看过这封信，他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仅仅在庆祝小泽征尔先生六十岁生日音乐会上向我打过招呼的一面之交的日本驻法国大使M先生，把发表在《世界报》上的有关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他在信中说自己认识的法国社会精英们大都同意西蒙先生的观点。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与特里耶女士的意见一致。我是一个小说家，生活在与不论本国还是外国的所谓社会精英们不同的圈子里。除了好朋友之外，还没有受到其他有着“大使”头衔的人这样的突然来信。

在这样的种种反应之中，我给老朋友西蒙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同时发表在《朝日新闻》和《世界报》上。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西蒙先生：您把日本市民、尤其我对希拉克总统决定恢复核试验所表现出的感情和行为视为反法活动。我对此的批评是：这是法国这个大国习惯于荣誉的精神作出的过激反应。然而，您认为日本由于地理距离太远作出了有悖于事实的解释，我对您的这种认识更感到深沉的悲哀。

对于我取消参加在法国南部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的决定，您在文章中指责我“十分不礼貌地显示对我国的敌意”。我承认自己行为的不礼貌，并为此感到羞耻。

但是，对于耶克桑·普罗旺斯书展主办者的宽宏大量，我看到了我的法国文学研究的恩师终生主张的法国人文主义的传统至今犹存的现实。

国内对这篇文章的批判，有的甚至认为不是“情绪性”的，而是“感伤”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尊敬克劳德·西蒙这位作家。但不知何故，这位西蒙先生如此头脑顽固，竟不承认日本是现代世界中的一员。这种理智退化的行为，使我不得不悲哀地接受的事实。从前面所叙述的采访事件可以知道，我国的新闻媒体对批评他们的人毫无同情理解之心，只是一味想方设法压制对方，却还要装做高雅的姿态，为对方感到悲伤。本人自不待言，即使旁观者也只能感到恶心。但是，我虽然对西蒙的批评感到悲哀，却不想被人说成“感伤”。

西蒙先生看了我的信以后，没有采取直接给我回信的方式，而是给《读卖新闻》寄去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对日本艺术家的期望是浮世绘与书法、禅的思想的“惊叹、眩惑、陶醉”。这与日本人对法国的尊敬只是理解为印象派绘画、时装与葡萄酒等美味佳肴——当然也有不少日本的知识界精英不以为然——不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为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而努力改变核武器现状的日本人、法国人，对于这种以本国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对方国家的人们的做法，怎么能不对作为改造世界的合作者的对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感到悲哀呢？

西蒙先生在他的反批判文章中说："大江先生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懂礼貌。"同一时期，我正和德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君特·格拉斯通信。我在信中说："这种理解的'谦虚'，包含着虚伪狡黠、装腔作势、厚颜无耻、恶心呕吐的语感，要是我能准确地译成德语，那该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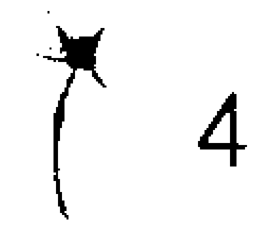
如果看到我的这段文字，不就会明白我绝没有"谦虚地承认"的意思吗？我看着《读卖新闻》上刊载的西蒙先生的反驳文章，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他对我的回信怎么会这么理解呢？

于是我这样推论：我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文文章，由我的老朋友——通过一位现在已故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世界报》资深特约记者——但不是文学研究家——P 先生译成法语。我的原文是"我承认自己行为的不礼貌，并为此感到羞耻。"

译成法语是：Je reconnais humblement que mon attitude était <grossiére>。

的确，"humblement"这个副词在同声传译这种时间急迫的场合，大概很容易按固定含义译成"谦虚"。但是，我的这篇文章比西蒙先生的再批判文章仅仅早一两个星期发表在《朝日新闻》上，原文是"并为此感到羞耻"。这应该与那种毫无羞耻之感，只是口是心非地使用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冷漠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

但是，这位年轻的法国文学翻译者，把从日文译成法语的信函中的有关批判部分的文字译回日文，没有与不久前发表在日本大报上的日文原文核对，就随意译成法语，并发表在发行量更大的报纸上。



4

日本人对核武器持有什么样的观点？经历过广岛、长崎灾难的日本人如何认识世界核武器的现状？在向外国人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我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总是搬出“国民感情”，说是“惟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国民感情”。

我认为这些话应该适可而止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成立了一个比较松散、但规模很大的活动团体“被团协”。我多年与这个团体的人们交往。我有时感受到他们深藏于内心的基于广岛、长崎的记忆所产生的深重而强烈的感情。而且他们逐渐不以“感情”、不用“情绪性”的语言呼吁废除核武器，而是以世界共通的普遍性理智的语言表明核武器不可能与人类共同生存的立场。

对于我和西蒙先生的论争，国内的政治学家尤其对我提出批评，希望我不要“感情用事”，应该站在冷静分析国际政治的基础上发表意见。以前我就不断听到现实派的政治学家诸如此类的见解。我认为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世界的核武器状况。在发言的时候，有意识地不去模仿军事研究家们对核武器和国际形势所进行的那种技术性的论述方法。

我倒希望指导我国大学和新闻媒体的国际政治学者们通过冷静的国际关系的分析，给我们谈谈核武器现状对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究竟是“好”还是“坏”。其实，“没有核武器就无法维护当今世界的和平”的观点已经成为他们的“感情”信仰，只是为了使之正当化，才希望不以虚伪的理性语言进行表述。

这些专家学者们仅仅对屈从于外国军事政策的我国现行方针事后讨好，又对此立刻碰壁走投无路，缺乏解决对策的想像力，他们究竟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发愿、发心

1

我在纽约接受采访的时候，对埃里·威塞尔说：基督教在日本绝不是一个大宗教。这些内容没有写进公开发表的谈话记录里，接下去的意思是，其他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但他立刻说：日本有神道吧。神道，的确，天皇家族举办的各种活动都是按照神道的规矩；每次新内阁诞生时，大臣们都要去伊势神宫参拜。晚年的野上弥生子——这位女士的晚年实在很长，而且一直保

持着创造力和批判的态度，对前一年当上文部大臣的那位曾长期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学者——大概他们也有私交吧——不禁叹息道：“竟然连N也在正月去伊势参拜了！”

我这样回答威塞尔：“……神道虽然是我国的宗教之一，但把日本拖进那场悲惨战争的战前以及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制和神道——天皇被称为‘现人神’。因此，领导战后的日本走向民主化道路的美国占领军极力主张把政治体制从神道中分离出来。”

我还对他说：“那么，现在日本最深入人心的宗教是什么呢？是佛教。”因为我国大部分家庭的葬礼都按照佛教的方式举行。另外，从日本文化这个角度来看，佛教语言已深入细致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我们往往没有准确地意识到罢了。不久前我在北海道的小樽参加学术研讨会，一起与会的荣格派心理学家和合隼雄在会上以实例证明，在我国，甚至连天主教的神甫也使用佛教语言布道。他的话引起在场听众的强烈反响。

我是作家，一直有一个习惯，要了解词语的正确含义，一旦发现用词不当，词义有误，就要正本清源。按照这些经验，那些语言本应具有极其严格的含义，但宗教语言在语义模棱两可的使用过程中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从日语的历史来看，最广泛最深入最细致地渗透进我们生活里的无疑是佛教语言。

于是，每当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佛教用语时，总要停下来琢磨一番。这也是我从自己经常犯的错误中吸取苦涩教训后养成的习惯。即使是夏目漱石的作品，对出

自禅宗经典的词语，每次也都细心体会，纠正自己凭空想像的——往往只是从汉字的感觉望文生义——错误理解。尤其是夏目漱石晚年喜欢使用的那些词语，与其说是禅宗用语，不如说是接近禅宗的汉语也许更为妥当。例如《明暗》中表现其思想的“则天去私”，这个词语被广泛解释。《大辞林》是这样解释的：“夏目漱石晚年的思想境界。指舍弃我执，置身于类似达观的和谐世界。《明暗》为其实践作品。”我对这个定义还是要认真琢磨一番。

夏目漱石在稍早于《明暗》之前曾做过题为《我与个人主义》的演讲，从中也可以感觉到，《明暗》的女主人公阿延尽管不断扩张个人的想法、行为、意愿，但还是——或者正因为如此——在整体上仍然与广大世界的法则相一致。这不正是夏目漱石的思想吗？的确可以把这个思想的后半部分解释为达观或者置身于和谐的世界。但是，不能认为这是人生被动的态度，而要理解为积极的人生选择，如果不这样正确评价前半部分的思想含义，不是就无法体会“则天去私”所提倡的鲜活的核心吗？

茶道用语中出自禅宗的委实不少。企业家、政治家以至小说家——如已故的井上靖——都频繁使用。每当碰到这些词语，我大抵都要停下来琢磨一番。

老实说，听到别人讲“一期一会”、“一座建立”这些话语时，我实在扫兴厌烦。按照外行人的思维方式望文生义、即凭空想像的理解，怎么就变得如此庸俗？在类似集中相亲的电视节目里，主持人一本正经地讲着“一期一会”；或者在我家附近刚刚平整完毕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公司贴出“一座建立”的海



藤花和笛子



菜採子制作的玩具熊和松球

报，我不禁感到悲哀：这些原本严肃规范的词语怎么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本来没有机会亲近茶道方面的书籍，由于看到一本研究俳句的书籍上引用的井伊直弼的文章，使我产生一种特殊的情绪。顺便提一下，前面提到的野上弥生子，她的作品《迷路》中塑造出一些与井伊直弼宗族有关的人物形象。井伊直弼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主客皆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告辞之后，客人亦出院子，不高声言谈，默然回首，出门而去。主人犹目送客人，直至不见身影……乃心绪平静回至茶席，此时自小门户进入，独坐炉前，思方才交谈，现无人以语，今日一期一会已毕，思念不复再来，或亦独饮，此乃一会极致之习，此时寂寞，能相语者，惟锅一口，别无他物。

我对送走客人之后主人“独坐思念”的具体感受、思绪以及形体动作都有同感，此后默然坐在谈论茶道的前辈作家、评论家身边的时候，有时也会想起这位在万延元年遭到暗杀的外交首脑所写的文章。



2

每当我看到未曾接触过的新的佛教用语时，都要认

真琢磨一番。其中“发愿”、“发心”这些重要词语一直铭记在心。日语中源于佛教的词语，大抵既具有佛教经典的原意，又被人们以最普通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现在先抄录《岩波佛教辞典》对这两个词语的定义。

发愿 [s:pranidh ā na] 发自内心的愿望。发誓、表明之意。即指单纯的产生心愿、愿望，亦指发誓、誓愿。后者为希望悟道的誓愿，到达净土、普渡众生的誓愿以及其他各种行善积德的誓愿。叙述发愿宗旨的文章称为“发愿文”、“愿文”。净土宗将向往极乐净土世界之心称为“向发愿心”。“定知至心发愿，愿无不得。”(《灵异记》)

发心 亦称“发意”，又详称“发菩提心”、“发道心”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无上正确觉醒之心)。但梵语原著之意多以为“对于正确觉醒所发之心”，汉语为能准确表达原意。又，日语独特含义还指出家、入佛门，以及为达到此目的的遁世隐居，转意为有目的有意识地决心从事某件事。“虽偶有发心修行者，却难以成就。”(《往生要集》)

尤其从“发心”这个词语的解释来看，将梵语原著与汉译以及日语独特的用法进行具体比较，就能发现其间存在着意思难以传递的偏差。这是很有意思的，使我想起学生时代曾阅读过《法华经》译本。那也是汉语译本与日语译本相对照——日语译本是直接从梵语原著重

译过来的——但因为翻译过程中遗漏太多，结果读起来往往不知所云。于是，我非常理解不惜生命万里迢迢前往印度寻求真经的那些学僧的心情，同时也完全可以真切感受到，对当时的日本信徒来说，空海、道元这样的僧人是何等重要啊。

就现在而言，我认为荒井献等人正在从事的从原著翻译《新约圣经》(岩波书店出版)的工作是多么难能可贵，一定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个人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接触神职人员，但我从这些学者身上学到许多深刻重要的东西，今后还将继续受益……



我最早有意识地记住“发愿”这个词语，是通过柳田国男的文章。小时候，因为母亲斥责我“你读书怎么不动脑子，回头就忘？”于是——按照该词的一般意思——发愿、发心，把认为重要书籍中的重要部分抄录下来，用这种方法来记忆。至今还有人批评我的评论文章引文太多，这就是当年的“遗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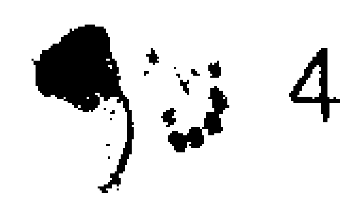
记得第一次把柳田国男的《美丽的村庄》结尾部分抄写在笔记本上，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与开发国土之悠闲步伐相比，人生实在微不足道。一代人的时间里未能完成，何寂寞之有？山清水秀，草木繁盛，太古以来皆然，岂不是我们的朋友

吗？不会使人不幸而终。学问艺术亦复如是，惟重要者发愿。”

这篇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八十年前在樱田门被暗杀的政治家——前已叙述——似乎也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中使用“寂寞”这个词语。我想，他们与我们今天对这个词语的“出门感觉”的理解不同，大概把这个汉语读为jakumaku吧。

柳田国男告诉我们，日本各地的风景原本不是天然之美，而是人工之美，但他又嫌国土开发步伐之悠闲。但是，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切身感受到无序开发的可怕速度。

如何恢复被破坏的“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景才应该是我们今后努力，即发愿的目标吧。重要的是发愿，这个呼吁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尤其真实。

 4

我用一年的时间总算完成了自己发愿、发心的准备，打算以更加周密的自控方式开始付诸实施。这将根本改变我自20多岁开始一切以小说创作为核心而形成的生存习惯。现在，我正考虑以《燃烧的绿树》作为小说的终结。在今后的几年里，想好好阅读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他的著作大多使用拉丁语写作，光从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全欧洲级的哲学家。如果以

后再写小说，也想创造一种与以前全然不同的新体裁。因为我的发愿、发心原本就是希望创作形式上标新立异的小说。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本书应该是我的最后一本新书。我集中精力写了这一系列文章，仍然与妻子创作的水彩画合在一起。先前《康复的家庭》出版后，收到前所未有的大量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都表示欣赏书中的插图。于是，妻子在日常繁忙的家务之余，经常把素描本摊放在餐桌上认真创作。每当此时，我一叫她，她的反应简直如同正忘我地埋头于创作的单身男人，虽然使我觉得有趣，但更令人吃惊。

我没有把创造一个新环境，从明年开始认真阅读斯宾诺莎书籍的新生活的意图与一起前往新泽西州大学的妻子和光以及留在东京的女儿和次子好好商量。在他们看来——以前也曾如此——大概自己的丈夫或者父亲由于内心情绪的激发，正朝着一个新方向发愿、发心，做出身体前倾、准备出发的姿势——也许他们为我感到可怜：啊，快六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子……

另一方面，对于我来说，我清楚地知道，由于永远像孩子一样的光的存在使家庭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状态，希望今后以更加宽松的纽带维系在一起，而且也会这样的。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感觉到写完这部书后将前往普林斯顿。

后记

《康复的家庭》出版以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丈夫和讲谈社出版部不仅仅收到许多夹在书里的征求读者感想的明信片，还有不少人另纸表达自己的读后感。我们对这些充满热情和理解的文章感到由衷的高兴。

其中有的长信讲述自己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勇敢而真诚的生活经历的感受，读后令人感动。有一封年轻夫妇的来信，他们现在正经受着我们三十二年前长子出生时那样的痛苦体验，使我动情。读者们在来信中说，读了《康复的家庭》受到鼓舞。这样的语言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啊！

于是，一年以后，我们决定出版《康复的家庭》的续编。因为有几封读者来信说："画得不好才令人喜欢，就这样画下去。"正是这些感人的鼓励，使我决心仍然画插图。于是，名副其实地夜以继日工作。

作为画中人物的原型，每个人都极具魅力，但是我无法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实在很遗憾，也觉得过意不去。

封面（原书封面——编者注）那幅画是昔日的母亲和我。当时我正在生病，母亲给我讲童话故事。对于在没有电视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大概谁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我也是如此，一有点小病，就可以让母亲给我讲《宫泽贤治全集》里的故事，非常高兴。

母亲念目录，我挑选其中自己喜欢的故事，让她一遍又一遍地念给我听。那个时候，没有电饭煲、吸尘器、洗衣机，母

亲一天忙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父亲长年卧病，需要绝对安静，因此给患点小病的孩子念书讲故事，对于母亲来说，也许正可以借此休息。母亲念书的声调没有抑扬顿挫，单调乏味，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变成风声、鸟语、树叶花草的低声絮语。一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童话里的动物、植物、云彩都来和我游玩。

五十年的岁月转瞬而过，今天，母亲正在住院，她作为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名副其实地以宽松的纽带与大家维系在一起。她已经无法和我们正常会话，但是我每次去医院探视她，她总是微笑地看着我，于是我放下心来，感受到些微的幸福。

大江由佳里

以光为主题的电影《宁静的生活》

荣获日本电影节优秀音乐奖之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宽松的纽带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译
页数＝１８７
ＳＳ号＝１１２７０１９８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５月第１版